

東海大學誕生的故事



梁碧峯 著

1953 年，由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向美國紐約聯合基督長老教會申請，經美國紐約聯合董事會大會同意與「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正式在中華民國臺灣共同創辦者(Co-Founder)一所基督教大學——東海大學，其誕生有它的現實與理想的層面。

-東海大學圖書館-

本書簡介

東海大學(Tunghai University, 縮寫為 THU), 簡稱東大, 是中華民國在臺灣一所具基督教新教(長老教會)背景的綜合大學。

1949年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 因中國共產黨的無神唯物論關係, 不允許宗教辦學。故於兩年內, 相繼在1951年5月前, 所有的教會大學, 被迫停辦或與其他學校合併改組, 其校舍都被沒收, 不再具有教會大學的本質。1951年6月, 當時負責中國大陸基督教大學資金籌措及其他事宜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 簡稱聯董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 迫於時勢, 乃將資金凍結。時任台南神學院院長的黃彰輝牧師眼見這些資金無法利用, 即興起與聯董會磋商在臺灣設立基督教大學之議, 並曾多次向董事長范杜森(Dr. Van Dusen, Henry Pitney, 1897-1975)及總幹事芳衛廉博士¹(Dr. William Purviance Fenn, 1902-1993)談論此事。

到了1952年, 美國聯董會開會時, 提出要在臺灣設立一所基督教大學, 遭到聯合長老教會的代表李伯(Dr. Charles Tudor Leber, 1898-1959)極力反對。他主張:「除非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主動來申請外, 不應由本董事會自動在臺建校」, 此建議獲董事會通過。因此黃牧師回台後, 提議由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決議推動, 1953年5月由黃武東牧師親自到美國紐約向聯合基督長老教會申請, 經聯董會大會同意與美國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UBCCC)」正式共同在中華民國臺灣創辦(Co-Founder)一所基督教大學。1953年6月初, 聯董會派美國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前神學院院長葛蘭翰博士(Dr. Thomas Wesley Graham, 1882-1971)為該會代表, 偕同芳衛廉總幹事來台與國內教育家杭立武博士接觸, 討論籌備建校及籌

¹ 美國聯董會芳衛廉秘書長因傳教士使命, 1932年, 他與夫人回到中國後, 他擔任金陵大學外語系主任, 夫人擔任英語教師。1942年, 他開始服務於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以下簡稱聯董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並擔任聯董會駐中國的特別代表。而後他成為美國紐約聯合董事會在中國大陸的主任。1946年, 他與夫人搬回美國, 並回到美國的總部設在曼哈頓工作, 曾擔任副執行秘書、執行秘書、秘書長。他執行秘書長工作長達有19年, 直到他於1970年退休。

組董事會事宜，並撥款美金 5 萬元作為籌備費用。

積極協助自由中國臺灣的一所新設的基督教大學成立創校籌辦委員會，由聯合董事會(UBCCC)，臺灣長老教會總會，及臺灣地方人士三方面各派代表三人組成。10 月正式成立東海大學董事會，決定校址座落於台中市西屯區大肚山山麓，校園面積廣達 133.95 公頃，是中華民國第一所在臺灣設立且現仍存的非改制升格而成立的私立大學。1954 年 2 月，東海大學的校園設計是由美國紐約聯合董事會正式委託名建築師貝聿銘先生負責。1955 年 11 月 2 日，美國聯董會芳衛廉秘書長積極推動一所基督教人文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終於正式開辦在臺灣台中新成立的東海大學。



目 錄

前言	6
壹、美國紐約的聯合董事會教育機構設立宗旨	10
一、聯合董事會成立的使命與願景	11
二、聯合董事會在那些地區服務？	12
三、聯合董事會如何協助？	14
四、聯合董事會之援助來自何處？	14
貳、聯合董事會芳衛廉秘書長	15
一、芳衛廉的個人簡歷	15
二、服務於美國聯合董事會的任務	16
三、具豐富辦大學的經驗	18
四、創辦東海大學的特色	21
五、孕育東海大學正式開辦	23
參、東海大學籌辦董事與創辦董事	28
一、東海大學草創期的董事	28
二、東海大學籌辦董事與創辦董事個人小檔案	34
三、東海大學籌辦董事與創辦董事(台灣長老教會)個人小檔案	59
肆、籌設東海大學重要大事紀	74
一、黃武東牧師的貢獻	76
二、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奠基破土典禮	82
三、筆路藍縷的校地經過	83
四、籌辦期的代理校長	85
五、孕育本校首任的歷程	90
伍、後記	100
一、什麼是美援	100
二、美援運用	101
三、東海大學美援建築傑作	103

四、本校董事的演化	106
五、反共題材介入首任校長之爭	109
陸、主要參考資料	111

東海大學誕生的故事

梁碧峯[†]

前言

1950 年代，美國「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之所以會在台灣創辦東海大學，有它的現實與理想的層面。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因中國共產黨的無神唯物論關係，不允許宗教辦學，故在 1950 年 12 月，新中國的政務院在第 65 次政務會議通過決定：《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1951 年 1 月 11 日，新中國的教育部又根據政務院的決定作了具體部署，並召開了一些會議，強調新中國不允許外國人在我們國家內辦學校的方針。故於兩年內，相繼在 1951 年 5 月前，所有的教會大學，被迫停辦或與其他學校合併改組，其校舍都被沒收，不再具有教會大學的本質。當時在中國大陸官方資料的教會大學，包括有(括註創校年份、創校團體)如下：

南京：金陵大學(1888 年，美以美會)；金陵女子大學(1915 年，美北長老會、美以美會、監理會、美北浸禮會、基督會)

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 年，美國聖公會)；震旦大學(1903 年，耶穌會法蘭西省)；滬江大學(1911 年，美南浸信會、美北浸禮會)

蘇州：東吳大學(1900 年，美國監理會)

杭州：之江大學(1897 年，美南長老會、美北長老會)

北京：協和醫學院(1906 年，倫敦會等)；燕京大學(1919 年，美以美會、美國公理會、美北長老會、倫敦會等)；北平輔仁大學(1925 年，本篤會)

天津：天津工商學院(1920 年，法國耶穌會)

濟南：齊魯大學(1904 年，美北長老會、英國浸禮會等)

武漢：華中大學(1906 年，美國聖公會、雅禮會、復初會、英國循道會、倫敦會)

長沙：湘雅醫學院(1914 年，湖南育群學會、雅禮會)

福州：福建協和大學(1916 年，美以美會、美國公理會、美國歸正會、英國聖公會)；華南女子大學(1916 年美以美會)

廣州：嶺南大學(1888 年，美北長老會等)

[†] 東海大學化學系退休教授

成都：華西協和大學(1910年，美以美會、公誼會、英美會、浸禮會、聖公會)

美正教董事會教會大學在中國(UBCCC)和支持中國高等教育組織之間舉行的首次聯合會議開始於1918年。1920年孕育，於1922年創立，1923年書院校董會由13所大學正式主辦。1949年後正教尚存教會學校，於2年後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管，1952年正教的13所大學全被拆分重編。1953年後在台復校，有：基督教衛理公會東吳大學與天主教輔仁大學。

美國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UBCCC)，由創辦1931年到1949年，這個基督教的「聯合董事會」已經與中國大陸13所知名的長老教會高校建立了聯繫。該機構與中國大陸的聯繫於1951年起中斷了30年，但是1951年後它還為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提供支援。因此，美國基督新教會於65年前在大陸的基督教教育事業13所大學宣告終止了30年，到1980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可讓教會部分工作恢復。1949年前，美國紐約基督新教會曾對中國大陸的教育發展有過極大的貢獻。以高等教育而言，過去曾在中國大陸先後創辦了13所頗負盛名的基督教大學。它們是：

華北：燕京大學(北平)、齊魯大學(濟南)

華東：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南京)、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上海)、東吳大學(蘇州)、之江大學(杭州)

華中：華中大學(武昌)

華西：華西協合大學(成都)

華南：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福州)、嶺南大學(廣州)

其中校齡最早的是聖約翰大學，創校於1865年。最充實的，則要算可與清華、北大在北京鼎足而三的燕京大學了。這13所基督新教會大學，對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都有特殊的貢獻。迨中國大陸沉淪，這些大學全被迫停辦，教會的教育事業遂陷於停頓。當時對恢復的期待甚深，但因韓戰爆發而落空，之後，該會也面臨存廢之抉擇。1951年5月的年會上，新任的執行秘書長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提出了一場關鍵性的演講：「視野，無限」(Horizon, Unlimited)，引起了新的展望，取得與會者的共識：「將更進一步把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想伸展到中國大陸以外的亞洲地區」。接著，該會因關切面的擴大，而於四年後(1955年5月)更名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UBCHEA)延續至今(以下簡稱「聯合董事會(UB)」)。

為響應自由中國台灣的國內外基督教領袖之熱心奔走及籌劃，聯合董事會於 1955 年協助東海大學在自由中國土地上台灣的台中創校。當今，東海大學除了是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之一成員外，另積極參與海內外高等教育聯盟組織：目前為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亞洲基督宗教大學聯盟(ACUCA)及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ICHET)等國際組織成員。

(一) UMAP 是 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的簡稱，全名亞太大學交流會。本會成立於 1993 年，是由亞太地區官方與非官方(尤指各大專院校之聯合組織)高等教育組織代表所自發組成的協會，以每個國家及地區一席為原則。UMAP 的目標為藉著加強亞太地區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合作以及各大學彼此間學生與教職員的交流，以期能達到亞太地區不同國家與不同地方之間文化、經濟社會制度的相互了解。

(二) 亞洲基督宗教大學協會(英語：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Asia)，簡稱 ACUCA，是一個亞洲地區的基督宗教大學與學院機構，致力於教育領域的基督教信仰服務事業，現由 57 個成員學校所構成：香港 3 所，印度 2 所，印尼 12 所，日本 10 所，韓國 9 所，菲律賓 9 所，臺灣 9 所，泰國 4 所³。本校為隸屬該聯盟之會員學校。現在 2015 年是由 57 個成員學校所構成，最少是印度 2 所，最多是印尼 12 所，而臺灣有 9 所。2012 年至 2014 年間，由輔仁大學

³ 亞洲基督宗教大學協會 (ACUCA)：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 香港浸會大學 · 嶺南大學；印度：基督大學 · 多克夫人學院；印尼：萬隆天主教大學 · 貝特拉基督教大學 · 沙塔亞瓦札那基督教大學 · 印尼基督教大學 · 主來臨基督教大學 · 杜塔瓦卡納基督教大學 · 聖那塔達瑪大學 · 蘇吉甲普拉那塔天主教大學 · 希望之光大學 · 克里達瓦卡納基督教大學 · 阿瑪加雅大學 · HKBP 諾門森大學；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 · 關西學院大學 · 明治學院大學 · 南山大學 · 同志社大學 · 青山學院大學 · 桃山學院大學 · 櫻美林大學 · 東北學院大學 · 聖學院大學；韓國：梨花女子大學 · 西江大學 · 崇實大學 · 延世大學 · 啟明大學 · 韓南大學 · 全州大學 · 韓東國際大學 · 牧園大學；菲律賓：馬尼拉雅典耀大學 · 中部菲律賓大學 · 德拉薩大學 · 菲律賓基督教大學 · 西利曼大學 · 亞洲三一大學 · 非拉莫基督教學院 · 米萊姆學院 · 菲律賓聖保羅大學；台灣：輔仁大學 · 東吳大學 · 靜宜大學 · 東海大學 · 中原大學 · 聖約翰科技大學 · 長榮大學 · 文藻外語大學 · 真理大學；泰國：西北大學 · 易三倉大學 · 泰國基督教大學 · 亞太國際大學（原：使命學院）。

校長江漢聲醫學博士(Dr. Vincent Han-Sun Chiang)擔任 ACUCA 理事長。2015 年至 2016 年間，由印尼萬隆天主教大學(Parahyangan Catholic University)校長擔任 ACUCA 理事長。

(三)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FICHET)，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以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技職教育協會等三個高等教育組織作為基礎，在教育部補助及各會員校捐款下，於 2005 年完成設立與登記，並於 2006 年 1 月開始正式運作。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之設立宗旨為代表我國參與國際高等教育學術活動，藉由結合各會員校院力量，促進經驗交流、資源共享，推動與各國程度相當之高等教育組織的合作交流，並期能擴大我國在國際學術界的活動舞台。

壹、美國紐約的聯合董事會教育機構設立宗旨

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聯合董事會(UBCHEA)，是一個維護亞洲基督教教會利益的亞洲地區非贏利的高等教育管理機構，與亞洲各國各地區的基督教教會大學保持著密切聯繫，以促進這些大學之間的資訊溝通，為他們在學術上的交流創造條件，支援教會大學的發展，並在經費上給予一定的支援。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或簡稱聯合董事會，是一個自主的機構，在 100 位董事中，有半數是代表北美各教會海外宣教部，另外半數是一般的代表。它是經美國紐約州大學董事會特許備案的一個教育機構。其徽標(logo)如下：



1922 年 10 月 1 日，中國的三所基督教大學：金陵大學、燕京大學與齊魯大學，在美國紐約成立了一個聯合辦公室。其所開一個單間辦公室，新租戶的門牌位於紐約市第五大道 150 號。中國聯盟大學的中央辦公室是由三個受託大學成立，單純以協調他們在北美的活動，如採購物資和資金的籌集與運用。而後，聯合董事會之前身--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成立於 1932 年，到了 1945 年，才合併為一個單一機構，肩負起協助亞洲其他基督教大學之責任後，到 1949 年，這個「聯合董事會」已經與中國 13 所知名的高校建立了聯繫。該機構與中國的聯繫於 1951 年中斷了，但是它還為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提供支持。直到 1956 年，才正式更改為現在的名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BCHEA)，其聯合董事會的宗旨亦經修正為下列內容：「聯合董事會之基本宗旨是為促進基督教高等教育，特別是在東方及東南亞各國，發展急需之教育事業及學府；支持正當合理之教育計劃；推行有效之教育方針；在重質不重量之原則下，務必使基督教高等教育在該地區，成為人民及教會生活中一股真正有效之力量。」

直至 1980 年，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BCHEA)應邀恢復了在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作。此後，它為中國的多所大學的研究項目、

人員培訓和教師發展提供撥款，尤其關注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師範學院。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還支持召開多次學術會議，並資助一些西方學者、專家到中國來做訪問學者。

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的許多撥款旨在支持宗教學領域，但是又不局限於此。提供助研、助教教學金的學科領域十分廣泛，包括會計學、心理學、語言學……等，特別是西藏大學和其他一些中國大陸西部院校的很多員工，亦被資助到更先進的各大學進修研究生課程。目前，已有幾個撥款支持英語教育項目，還支持南京師範大學進行社會工作者的培訓。現在的撥款項目也開始通過支持員工領導力和發展的項目，來支持中國大陸西部高等師範院校的發展。

截止到 2003 年 6 月 30 日，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ACUCA)用於撥款和管理費的總支出約為 8 百萬美元。其中約 6 百萬美元來自該機構的本金。其他資金來自私人捐款、私人基金會的撥款和美國政府的撥款。2015 年，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過去幾年一直贊助亞洲基督宗教大學協會，該會目前希望能與台灣亞洲基督宗教大學協會之會員學校，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係。Dr. Cynthia Yuen 主要負責東北亞地區的助學金與各項計畫，於 2015 年 4 月 17 日舉辦活動，並與夏龍副主席(Dr. Glenn Shive)來臺參訪 ACUCA 會員學校，希望討論未來的各種合作計畫。

一、聯合董事會成立的使命與願景

1. 聯合董事會的使命

亞洲聯合董事會基督教高等教育工作目的是支持在亞洲的基督教存在的大學及學院。

2. 聯合董事會的願景

聯合董事會的工作中心是在對基督教的信仰、高等教育和亞洲。聯合董事會工作目的是長期一直提倡全人教育在傳統的人文學科，基督教價值觀的背景。

在亞洲國家具有基督教的大學與學院，聯合董事會與這些機構合作，以加強他們的基督徒認同。在基督教的大學與學院不存在目前的國家，聯合董事會強調的是反映了基督教服務承諾項目和方案。

聯合董事會強調其工作有兩個重點：1.聯合董事會支持對教師，管理人員，及受託人的專業培訓。2.聯合董事會支持高等教育的亞洲機構之間的聯繫和網絡。

聯合董事會專注於廣泛的工作，既是贈款決策和方案的組織，綜合性方案，以亞洲的挑戰和應對多樣性。聯合董事會和與其共同目標的其他組織，如教派，學術機構，基金會協同工作。聯合董事會資助其計劃地通過並尋求捐款來自個人，教派，教堂，基金會，亞洲機構的校友，並通過聯合董事會各種捐贈收入。

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BCHEA)大事記如下：

1922 年，中國的三所基督教大學在美國紐約成立了一個聯合辦公室；

1949 年，與中國 13 所知名的大學建立了聯繫；

1951 年，與中國的聯繫中斷，但是還為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提供支援，包括香港、菲律賓、韓國、日本、台灣；

1953 年，積極籌辦自由中國台灣的一所新設的基督教大學；

1955 年，正式開辦在台灣台中新成立的東海大學；

1970 年之後，為泰國，印尼，印度和其他一些國家的的工作；

1973 年，東海大學積極謀求擴展，以求自足自給的辦學；

1980 年，應邀恢復了在中國大陸的工作；

2010 年，本土知識行動計畫啟動，專案實施順利，有效的加強了當地社區和大學的有機聯繫；

2013 年，在香港舉行組織成立 90 周年慶祝晚宴，90 位代表列席了慶典，既有捐贈者，也有董事會成員和其他機構的合作夥伴；

2015 年，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過去幾年一直贊助亞洲基督宗教大學協會(ACUCA)，該會目前希望能與台灣亞洲基督宗教大學協會之會員學校，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係。

二、聯合董事會在那些地區服務？

1950 年之後為支持教會大學在基本建設，圖書館藏書，學生獎學金和其他重要的教育功能，包括贊助到訪的美國教師和工作人員的形式。聯合董事會主要透過具有國家和地區性影響力之教會有關團體，在下述各亞洲國家從事教育工作：

1.在香港：為應付難民之需要，聯合董事會在 1951 年協助創辦崇基學院，直至 1963 年成為香港政府支助之中文大學三個學院之一，在 1973 年，聯合董事會仍繼續對崇基學院加以特別補助，以協助達成其基督教教育之目標。

2.在臺灣：為響應國內外基督教領袖之熱心奔走及籌劃，聯合董事會於 1955 年協助東海大學在臺中創校。東海大學乃是中國大陸上 13 所基督教大學結束後，自由中國台灣唯一繼承者，聯合董事會除籌款建校外，並補助經常費，到 1973 年後東海大學就在謀求擴展，以求自足自給的辦學。當時尚存有特別補助金，主要為協助教員研究計劃、圖書館擴充、公共設施計劃實施等，聯合董事會也同時協助前上海東吳法學院校友，於 1951 年在臺北復校之東吳大學。

3.在菲律賓：自 1957 年起，聯合董事會以事業資金及經常費補助菲律賓西利曼大學(Silliman University)，使其六個學院和四個專科部在質的方面更加充實，並且使其農業和社區發展工作更加普及。另外，對菲律賓基督教大學之輔導計劃、師資訓練以及教會間之協調工作亦給予補助。

4.在韓國：漢城延世大學是由賽佛倫斯聯合醫學院(Severance Union Medical College)和朝鮮基督教大學(Chosun Christian University)於 1957 年合併而成，聯合董事會除補助延世大學外，也協助其具有 600 張病院之現代化醫藥中心，延世在 1973 年有 10 所學院，5 所研究所，並且大部已能自給自足。在 1973 年延世所仰仗於聯合董事會，只有籌募主要建築費和特別工作計劃補助費。此外，對於與其他基督教大學間之合作亦多有成就。

5.在日本：在 1973 年，聯合董事會每年供給 15 至 20 個來自香港之中國學生，在日本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讀書之全部獎學金，並且也補助從事亞洲研究的學術講座，教授交換計劃，和贊助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主持下的亞洲領導人才發展計劃。

6. 1970 年代之後，在印尼、印度以及其他遠東及東南亞等地區：聯合董事會乃資助下列之工作項目，包括：建築設備費之補助、經常費之補助、師資訓練、各國基督教團體領袖人才之培植，各種有關基督教大學校長會議，專才研習會、旅行演講之舉辦，專家、顧問、教授之交換計劃之補助等。

聯合董事會在 1969 年所成立亞洲高等教育委員會，包括：8 位亞洲籍、7 位美國籍之委員，由一位傑出之印度教育家擔任執行秘書，領導工作，設辦公處於香港，為期 3 年，專門研究如何改革及促進基督教高等教育。

三、聯合董事會如何協助？

聯合董事會除了協助亞洲各地區上述各項工作，在美國紐約總部的任務包括：

1. 安排並支助亞洲教授來美或到其他國家進修。

2. 物色西籍優資教授赴亞洲作短期或長期任教。

3. 贈送獎學金給亞洲各大學清寒優秀學生。

4. 利用新聞報導，出版刊物以及演講，向美國國內地方人士介紹，有關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發展及需要。

5. 促進美國及亞洲大學及教育機構之合作。

6. 協助亞洲大學或教育機構之採購，運輸及旅行上之安排。

7. 輔助亞洲大學畢業生，在美之校友活動及在亞洲之教育資助。

四、聯合董事會之援助來自何處？

爲了維持它的工作計劃和服務項目，聯合董事會依靠三種財源：(1)教會贈款，(2)基金利息收入，(3)私人、公司、團體以及基金會之捐助，其他如紀念獎學金捐贈以及遺產捐贈亦所歡迎。所有對聯合董事會之捐贈均可免除所得稅。

貳、聯合董事會芳衛廉秘書長

1942 年，芳衛廉博士成為在中國的美國聯合董事會的董事。1947 年，回到了美國設在紐約曼哈頓的總部，擔任副執行秘書，後來成為執行秘書，並於 1951 年升為總書記，即稱為秘書長，擔任秘書長職務直到 1970 年退休。

一、芳衛廉的個人簡歷

1902 年，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urviance Fenn, 1902-1993)生於在紐約的新羅謝爾(New Rochelle, N.Y.)，他的父親，芳泰瑞牧師(Rev. Courtenay Hughes Fenn, 1866-1927)也是一位長老教會的傳教士，曾編了一本 5000 字的中英辭典。他的哥哥芳亨利(Henry Courtenay Fenn, 1894-1978)是美國漢學家的建築師和耶魯大學的中國語言專家。1993 年 4 月 21 日，芳衛廉博士卒於賓夕法尼亞州退休社區的都里斯鎮(Doylestown)，享年 91 歲。他誕生在美國，成長在中國，是一位長老教會傳教士的兒子，本身也是繼承父親的傳教士工作。幼年時在中國渡過，長大後再回到美國，進入漢密爾頓學院唸書，畢業獲得大學的學士學位，而後進入紐約大學，並獲得英國文學的碩士學位，1923 年他開始在 Tungshien 的北美學校擔任英語教師，而後在貝利亞學院擔任教學工作。繼而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完成研究所學業，獲得博士學位。因傳教士使命，1932 年，他與夫人回到中國後，他擔任金陵大學外語系主任，夫人擔任英語教師。1942 年，他開始服務於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以下簡稱聯董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並擔任聯董會駐中國的特別代表。而後他成為美國紐約聯合董事會在中国大陸的主任。1946 年，他與夫人搬回美國，並回到美國的總部設在曼哈頓工作，曾擔任副執行秘書、執行秘書、秘書長。他執行秘書長工作長達有 19 年，直到他於 1970 年退休。



芳衛廉博士



芳衛廉博士已經結婚 35 年的前妻弗朗西斯·科克斯(Frances Cocks)，也是

一名教師，已在 1964 年去世。他的第二任妻子普梨西拉·霍爾頓·昵夫(Priscilla Holton Neff)，也死了。他有兩個女兒，在聖地亞哥的莎拉·芬恩盧斯(Sarah Fenn Luth)和在普羅維登斯·羅得島的瑪麗芬恩黑澤汀(Mary Fenn Hazeltine)；共有 7 孫子；8 個曾孫和三個繼子：查爾斯(Charles)，約翰(John)和薩姆夫(Sam Neff)。

二、服務於美國聯合董事會的任務

1937 年中國爆發中日戰爭，到了 1942 年，由於中日戰爭交戰熾烈，國都南京已淪陷，大部分由聯董會所資助的大學，隨著中央政府遷移到大陸內地。這時他所任教的金陵大學已搬遷到四川成都，在往後的三年中，他扮演一位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在中國很重要的主導者與連繫者，提供中國各基督教大學所需要與資源，以維持分散在大陸內地各處的聯董會所興辦的大學於不輟。

根據他給美國聯董會的報告：他曾遍訪福建、杭州、華南、嶺南及沅澧等大學，共花三個月的旅行，距離好像從美國橫渡太平洋到中國一樣的遙遠。他曾經搭乘飛機 3 小時、坐 3 天的火車、3 天的小船及 3 個星期的汽車...。光在重慶市，從滬江大學分部到東吳大學分部，也需要 2 天的路程。在四川成都他興建「中國西部聯盟」之家以招待連繫金陵女大、金陵大學、齊魯大學及燕京大學等幾所大學。但杭州大學、聖約翰大學及校本部在淪陷地區的滬江大學及東吳大學等，始終無法聯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擔任聯董會在中國大陸地區的秘書、主任。1947 年，芳衛廉博士回到了美國的總部設在曼哈頓擔任副執行秘書，直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美國聯董會被迫關閉上海的辦公室。2 年後，到 1951 年初，因中共的無神論關係，造成聯董會須完全撤出中國大陸。這時他已被任命為聯董會的執行秘書，而後擔任重責秘書長之職。芳衛廉博士以積極的作為與無比的勇氣，將聯董會帶進一個服務的新紀元。由聯董會所支持的香港崇基學院開始發展，並立即持續不斷的參與及執行，成為一個聯董會重要的使命。

1952 年 2 月初，他受邀到臺灣訪問，回到美國後，4 月，他開始有了為臺灣設立一所新基督教大學的構想，並積極推動。終於促成東海大學的誕生，此時聯董會承擔最大與最艱鉅的計劃：聯董會決定用原來十三所大學的經費在台灣成立一所大學，這所大學就是設立在台中的東海大學。甚至於，當時

的衛理公會還拒絕了，台北東吳大學法學院所提恢復固有關係的請求，理由是衛理公會，已經同意聯董會在台灣設立一所基督教的東海大學，並已將捐款撥與聯董會，因此無力再支持東吳大學，更何況東吳大學復校並未事先與衛理公會磋商。在芳衛廉的領導下，將近六百萬美元的經費投注到東海大學的開辦，也幾乎耗竭當時聯董會所有的準備金。

接著，聯董會強而有力的贊助日本的國際基督教大學、菲律賓的西律門大學、韓國的延世大學、印尼的撒達亞基督教大學等亞洲各大學的設立，這些大學有部份還是靠聯董會的資助來維持生存。這時芳衛廉博士面對一個困惑的決定，必須將聯董會過去所限定在中國推廣的高等教育工作，帶到分歧而複雜性的亞洲多國性的投入。

從 1957 年到 1960 年間，美國紐約聯董會出現財務的危機，使他的領導面臨最嚴重的挑戰，當時隨著聯董會收入的銳減及準備金幾乎耗盡時，聯董會曾過了一段裁減一半經常費的日子。面臨這種壓力，其他的領導人都幾乎失敗了，但終被芳衛廉博士所克服，邀請了美國《時報周刊》創辦人亨利·魯斯加入，並擔任極為重要的財務董事，千鈞一髮才挽回了財務崩潰的危機。結果不僅使聯董會更有效的及更強有力的恢復財務體系，而且建立了聯董會的收入來源管道，才使聯董會能夠在以後多年中，提供亞洲十幾所基督教大學急迫需要的贊助費用。

因此，他所領導美國紐約長老教會，贊助的學院和大學所組成的亞洲基督教聯盟長達有 20 餘年。當時，該委員會整個計劃在東亞、東南亞國家：包括韓國，日本，台灣，香港，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以及在中國大陸，泰國，印度和巴基斯坦才能順利的推動高等教育，美國聯董會芳衛廉博士扮演著在中國基金計劃的橋樑，以及對美國各方面的貢獻，在這方面是別人所無法相比擬的。尤其最後的 19 年擔任該會的秘書長職務，極為盡心盡力。他永無止境的奉獻全力來嘉惠成千上萬的中國、香港、日本、韓國、臺灣及菲律賓的學子們，實在是一件難能可貴的義行。古人以「太上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論來判斷個人是否成功？秘書長芳衛廉博士一生以協助亞洲國家建立高等教育機構及培育無數的高等教育人才為己志，並全心全力去完成它。他為動亂的社會，重建社會倫理、道德規範及學術專業所付出的心血與精神，的確是非常值得大家的感佩。

三、具豐富辦大學的經驗

百年來，美國紐約基督長老教會在高等教育貢獻上，過去曾先後在中國大陸創辦了 13 所頗負盛名的基督教大學。直到 1949 年大陸淪陷後，各所大學院校盡遭中共合併或改變，因中共無神論而被迫停辦，校舍均遭沒收合併重組，到 1951 年中所有教會所辦的教育事業被迫中止。

在臺灣的教育界與熱心教育之教會人士，於 1950 年時基於基督教大學事實的需要，聯名向成立於 1932 年，負責襄助過去 13 所基督教大學的美國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 1955 年 5 月改名「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建請一本過去培植中國青年學子的精神，期盼於臺灣當地創辦一所理想大學，藉以延續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並傳承淪陷於中國大陸 13 所教會大學之優良傳統，可惜未能順利如願。

1952 年 2 月，芳衛廉博士受紐約中國基督大學聯合董事會之邀，來台瞭解並建構一所大學的新校計畫。但由於美援台灣的條件限制，只能接受台灣當地所提出的辦學計畫，當學子完成學業後，應可回自己家鄉幫助經濟發展及提升鄉村生活水平。因此，他來台與國內教育人士及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領袖們討論設校條件，以便提出重新建構一所新基督教大學計畫，返美後，於 4 月 2 日，芳衛廉即向美國紐約聯合董事會提出「我所欲見，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錄」，建議的重點是要讓美國紐約長老教會在台所設立基督教大學的構想予以支持。其詳情如下：

「我建議聯合董事會，對於台灣基督教團體，欲在台灣設立一所基督教大學的構想給予支持，我認為這所大學不應只是大陸任何一所大學的翻版，台灣所需要的是不一樣的大學，既然是從無中生有，我們大可有機會創立一所不同形式的大學。我瞭解後心想因襲過去大陸傳統大學的念頭很強，但如果我們不能成功抵制這個想法，我們注定會失敗。所以下面是我心目中一所理想大學所應具備下列的十四特色：

1. 這所大學應依籌備委員會上所述的：『造就具有特殊視野與終生奉獻精神的人，希望他們中的大多數將來已服務教會及國家為職志。』雖然我們應以最好的教育設備培育每一位學生的領導才能，但是我們不只以培育領導人才為唯一的目的，我們同時也希望造就一些『僕人』。

2.這所大學應與其所屬的環境密切聯繫。雖然長久以來這些環境一直維持農業的形態，但是我們並不打算把這所大學建成一所農業大學，也不打算訓練這方面的畢業生，或造就一大批回農村工作的人。但畢業生不論將來在都市或在鄉村工作，他們應該不要忘記整個台灣至少有 80% 以上農村人口的利益。以最廣泛而又最富有意義的話來說，這所大學應以服務台灣島上的居民為目的。

3.這所大學的課程設計難以專業性貫穿整個課程，但不應以技術性的專業為取向。大學教育不應只是某些工作或職位的訓練班，而是訓練出可以馬上適應社會、服務人群的人才，它以不限制一個學生未來的發展為目的。

4.這所大學使學生生活在充滿各種觀念激勵的氣氛中，許多課程可以為適應台灣社會需要而設計，但所有課程都應涉及基本的以及充滿挑戰的觀念。科學的課程要以文化為背景。而人文、社會學科的課程應賦予實質的意義，不可自限於象牙塔中，應由校外真實範疇提供的活動中達到此一目的，課程所應著重的是通才教育。

5.這所大學不是白領階級的養成所。不論男女同學都要訓練勞動的習慣，有朝一日他們出了社會了才不會怕污物沾身。勞動意味著學校用最少的服務人員，師生過著最儉樸的生活，勞動同時意味著對校外社區提供實際的社區服務，我認為貝利亞(Berea)和安提克(Antioch)兩所學院的獨特理論可以部分在台灣採行。

6.民主的觀念在行政上以及師生關係間，都應有實際的表現，全體教職員都應投入。這意指學生儘管有成熟度的限制，但仍可決定他們自己的活動並在教育上參與行政與學術事務的討論。也意指教員有責任參與學校的基本決策，此為教育過程中學校逐步成長的要素。

7.這所大學應避免各系自己閉門造車，教員追求的是真理而非自築高牆。學校應幫助學生瞭解狹隘本科系中更廣闊的關連性與其涵義，學校同時應鼓勵教師從事集體研究而非只埋首於個人計畫之研究。

8.這所大學將是一所不超過五、六百人的小型大學，因為人數太多會危及基督教理想氣氛的發展與維持。雖然學校應維持學術上的高水準，但入學資格除了學業成績外，也應在學生性格與志向上予以充分的瞭解。學費應從學生平均財力中核定，合於資格而無力繳交學費者不應摒除門外。

9.為了配合學校的目標與資源，科別的設置應有限制，不是應有盡有而是有選擇性的幾個科目不斷予以加強。適合設置的科目包括社會科學(理論與實

際並重)、教育(理論盡可能少、實際內容盡可能多)、英語(實用與瞭解西方文化並重)、基礎科學(既不是不實際的純科學，也不是僅以職業為導向的應用科學)，另外全體學生應修哲學與宗教課程。

10.這所大學的校舍樸實，但並不是一無特色，是實用而不虛飾。此一校舍不僅由目前的條件所決定，且希望有一天這所大學能得到本地的支持。此校舍應與周圍景觀及所屬的環境相配合。

11.教員必需專任，因為只有全心奉獻教學與研究工作，才能充分以其理想與理念貢獻學校，長遠來看，這正是一所大學成形的基本要素。每一位教職員都可以獲得較佳的生活待遇，這並非意味著高薪，而是指較公立學校待遇為優。薪資的給付也應顧及家庭的大小，譬如只有一個孩子的主任薪資與兒女成群的雇員薪資差別不大。

12.這所大學的教職員應是基督教徒。我知道要求教師學術與基督教資格並列並不容易，可是過去在大陸的基督教大學十分強調這個條件的重要性。

13.這所大學雖具有國際性，但強調國際性並不表示抹煞其台灣的特性。國際性的合作在開始的階段有其重要性，西方人士的參與也在歡迎之列，不過我們需要的是一所真正為台灣人辦的基督教大學，所以西方人士與中國大陸人士應為從屬地位。

14.這所大學一開始即與教會保持連繫，因聯董會代表教會，所以應與其合作無間。為了防止因用人不當而使學校管理脫軌，教會組織對學校的事務應有最高的決定權。這所大學不只是基督教大學，而且是與基督教會相互連繫的大學，它不以狹隘的意義為教會服務，應支持並強化對台灣教會的貢獻。

總而言之，我希望申明我的信念是一所有以上的十四條，或其他要項共同成為台灣某些人，以及某些團體的想法時才有意義，如果有任何與聯董會的目標不相符合的計畫，以及加上共同合作的人無法全心全意地參與其事，會使聯董會參與的意願都會大大降低，因為這種合作並非明智之舉。最後，我們應認清楚，聯董會面臨的最基本、也是最首要的任務就是教育。」

隔年即參考過去在大陸 13 所教會大學的創辦情形，決定在台中大肚山創辦成立東海大學，並非完全延續大陸基督教辦學傳統。這所大學不只是基督教大學，而且是與基督教長老教會相連繫的大學，它不以狹隘的意義只作教會服務，應廣泛全力的支持並強化對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貢獻。

四、創辦東海大學的特色

早在 1951 年 6 月，曾任燕京大學會計長的蔡一諤先生和魏德光博士(兩人後來都擔任東海創校董事)就向 UBCCC 爭取補助台灣高等教育。同年 9 月，東吳大學校友首先向該會爭取在台復校；金陵、燕京大學校友也建議以「聯合流亡大學」(a joint institution-in-exile)的名義在台復校。但 UBCCC 下設的「亞洲服務臨時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 on Services in Asia)在 1952 年 4 月初經過討論，再度維持一年前既定的立場：認為不宜支持以任何一所，過去在大陸的教會大學名義在台設立「流亡大學」(a university in exile)。而且在美國聯合長老教會代表李伯博士(Dr. Charles Leber)的堅持下，必須由台灣本地長老會主動提出申請，方可在台灣設校。1952 年 9 月李伯博士美國聯合長老教會，以亞洲事工負責人來訪問台灣，曾與黃彰輝談及在台灣創設基督教大學。

依芳衛廉心目中一所理想大學所應具備的特色中，以第一點與第二點所敘述字句最為精確，為了符合美國聯合長老教會代表李伯博士的堅持，因此他主張，東海大學不應該是任何一所在大陸的教會大學翻版。他說：「這是一個開始，我們有機會去創立一個不同型態的大學。」所謂不同的形態，包括：「這所大學應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

他所強調：這一所學校不是在製造白領階級的大學，學生對其生活環境應有不斷的自覺，以避免陷入象牙塔，流為士大夫，另外，東海大學應落實民主觀念，學生需具備生活思想。在課程設計方面，不須以技術性導向，而應著眼於寬闊格局，避免嚴格的分科，配合當地國家與社會的需要，搭配純樸而不會矯飾的校舍。

芳衛廉始終認為，台灣需要的是一所不一樣的大學，既然是從無中生有，大可有機會創立一所不同形式的人文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他建議，東海大學初期的規模，以小規模大學型態，重視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學生人數大約在 500 至 600 人。師生全體住校，教職員必須全職，並提供最佳生活條件，且應是為基督教育。他非常清楚，部分籌備學校委員，承襲傳統大學的念頭很強，但他堅持，如果不能成功地抵制這種想法，這所大學注定會失敗。

依芳衛廉心目中一所理想大學所應具備的特色中，以第四點敘述字句最為

精確：「這所大學使學生生活在充滿各種觀念激勵的氣氛中，許多課程可以為適應台灣社會需要而設計，但所有課程都應涉及基本的以及充滿挑戰的觀念。科學的課程要以文化為背景。而人文、社會學科的課程應賦予實質的意義，不可自限於象牙塔中，應由校外真實範疇提供的活動中達到此一目的，課程所應著重的是通才教育。」他認為，創校之初就應依照已規畫要實施通才教育，東海便自許應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是一個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的土壤，而非製造白領階級或象牙塔士大夫的大學。因此，通才教育的核心理念是著重學理的闡揚、技術的傳授及思想的啟發。

通才教育是當時(1950年代)美國高等教育的潮流，深受哈佛大學通才教育理論的影響。聯合董事會芳衛廉秘書長事先徵得曾校長的同意，1956年3月，聯董會芳秘書長，就邀請菲律賓基督教會西利曼大學已退休的校長賈爾信博士(Dr. Arthur L. Carson)⁴，來校規劃擬定通才教育大綱與實施方案，同年9月，特別聘請美國紐約史基摩爾學院(Skidmore College)教育系主任朱有光博士(前大陸嶺南大學文學院院長)，來校指導擬訂東海大學通才教育有關課程，在一個月之內就把大家的意見綜合起來，編成了東海大學通才教育的藍本。內容恰和備忘錄中的「課程內容不限於和謀職直接有關的技術性題材，而應比較廣泛，不謀而合」，同時朱博士也把通才教育的課程和專才教育的課程銜接為一個體系，是為東海兩者得兼的「通、專」教育。

當時，通才教育分成自然領域、人文領域、社會領域等三門共同必修領域，自1956年秋開始推行，一、二年級學生對各領域兼修的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普遍實施，所有學生必須修習國文、英文、歷史、音樂、宗教。因校園學生日增，專業教育漸興而失去了這些制度傳統，但東海大學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底蘊仍在，校訓「Truth attained through faith expressed by deeds.」(藉由信心而獲得真理，並以實際行為來彰顯之)指明我們是將信仰與知識、行動透過全人展現的教育機構。

另外，依他心目中一所理想大學所應具備的特色中，以第五點敘述字句

⁴ 阿瑟·L·卡森 (Arthur L. Carson, 1895 - 1985) 是美國傳教士、教育家，其中文姓名是賈爾信。賈爾信出生於1895年5月29日，在賓夕法尼亞州的泰厄內斯塔。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和康奈爾大學求學，並完成了博士學位，而後賈爾信博士擔任長老教會的傳教士。從1921年1939年，賈爾信被派到中國山東省的地方，從事農業調查及研究工作。從1939年到1953年在菲律賓杜馬格特市(Dumaguete City)的擔任西利曼大學(Silliman University)校長。

最為精確，他認為，「這所大學不是白領階級的養成所，不論男女同學都要訓練『勞作』的習慣，有朝一日他們出了社會才不怕污物沾身。」「這個『勞作』，是意味著學校用最少的服務人員、師生過著最儉樸的生活，『勞作』同時意味著對校外社區提供實際的社區服務，我認為美國貝利亞(Berea)和安提克(Antioch)兩所學院的獨特『勞作理論』，可以部份(工讀制度)在台灣採行」。

這些建議，促成了東海大學在民國 42 年(1953)11 月 10 日，召開在建校籌備階段的第二次董事會議中，通過了東海大學「設置的目的與方針」中，明訂「勞作制度」(Labor system)為大學基本教育方式之一，這是國內在高等教育中首創的一種教育制度。事實上，芳衛廉早年曾在美國肯塔基州的貝利亞學院任教，認為該校的「工讀勞作」(Work for study)可在東海實行。另外他說，過去在中國大陸的大學，包括基督教大學在內，所造就的是動腦不動手的「士大夫」，而東海大學要造就的是手腦並用的人才。因此，東海大學在國內在高等教育中首創的一種教育制度，即是基本勞作(Fundamental labor)制度，而且所有入學新生的必修課程之一，視同一門學業的課程。

因此學校在還沒開學之前，他就安排曾校長與吳德耀博士，到貝利亞學院去瞭解該校的「勞作制度」。事實上，貝利亞地區當地居民相當窮困，其工讀勞作的動機全起於經濟，學生勞作是有報酬的，學生可用所得來補賞，做繳交學、雜費、膳食、生活費等。但是臺灣的狀況並不相同、環境也不相同，經過研究商討，決定不是全部採用，而把東海的勞作當為一種教育，也就所謂為勞作教育(Labor for Education)，培養將來出社會是一位有用人才。

「勞作教育」已成了東海大學一項特殊傳統，只要是東海新進的學生，不分男女、不分家庭背景及社會地位，都必須要做兩年義務性的基本勞作(Basic labor)，包括清潔宿舍、整理校園環境、洗碗掃地、洗廁所等 20 多項工作。

五、孕育東海大學正式開辦

黃彰輝牧師是個相當有遠見的教育工作者，認為台灣需要有一所以基督教信仰所建立的大學教育機構，來栽培國家社會的菁英、造福當地社會。因此，在他努力之下，爭取到「美國基督教大學聯合基金會」董事們的同意，由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向該基金會，提出申請在台灣設置基督教大學，並且為了讓該校不是單屬於長老教會所創辦，在董事會中南部基督教長老教會僅派三名代表，其餘董事名額則由其它宗教派系推出來共同組成，這就是東海

大學創辦的由來。早在東海大學重新在台灣尋求建立發展之初，陳明清先生與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等，代表台灣南部基督教長老教會參與籌設工作。

當初，某些中國大陸基督教長老教會人士，認為台灣只不過是大陸的一個邊陲延續，而東海大學在台灣的發展，自然成為大陸基督教大學的「復校」，而聯合董事會本身也毫無台灣本土辦學經驗，但陳明清先生等教會人士心目中，卻有一所理想的基督教大學的教育藍圖。因此東海大學的籌設，絕對不是大陸基督教長老教會來台另起爐灶，也不是大陸邊陲的延續；他們視之為貨真價實的台灣基督教大學教育之籌設，而且需具有台灣鄉土特色的風格。陳明清先生參與東海大學建校的籌備，之後也代表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出任董事會，這正是他重視基督教大學教育的一項明證。可惜最終因以本土為主的教育理念與其他主事者不合，以致他退出董事會。想必這樣的結局多少帶給他壯志未酬的遺憾。

大概可以勾勒出，在東海的創校初期，其中南部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人，就有黃彰輝、黃武東、彌迪理、陳明清、蔡培火。原來台灣的先輩真正要創立的，是屬於台灣的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大學，而不是為了中國淪陷而「復校」。而基督教長老教會大學的理念，只是單單這樣嗎？最後他們向聯董會呼籲，建校將面臨的最基本、也是最首要的任務乃是要設立一所完整的大學教育。1953年6月初，聯董會派美國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前神學院院長葛蘭翰博士(Dr. Thomas W. Graham)為該會代表，偕同芳衛廉來臺與國內教育家杭立武博士接觸，討論籌備建校及籌組董事會事宜，並撥款美金五萬元作為籌備費用。6月中旬，正式成立基督教大學籌備處，推舉杭立武博士為籌備處主任及首任董事長。

聯合董事會同意在台設大學的消息傳出去，全台各地，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均紛紛爭取未來的大學在各地方設校，其中台中表示願意提供大肚山(後改名大度山)山麓八十多甲山坡地。經過多方考量後，籌備委員會選定在台灣中部的台中市西屯區大肚山建校，也因大度山是在大海之東，籌備處主任杭立武博士本想以「海東大學」為校名，當年8月11日籌備處會議中，雖有委員建議校名有玉山、海東、協和、聖保羅……等，為了廣泛徵求更多的建議，會中決定發出約50份邀請函給教育文化界人士，包括第三學院的建議。但經數月的思考，並和幾位史學家商酌，最後接受名史學家羅家倫博士的提議，採用8月14日台灣大學凌純聲教授(1957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回函建議校名為「東海大學」而定之。

東海大學就是隨著芳衛廉博士所提供的補賞金進行購買校地，多年的醞釀與台灣方面杭立武董事長、台南神學院黃彰輝院長、副院長彌迪理牧師(Rev. Harry Daniel Beeby)和台灣長老會蔡培火長老等創校董事的奔波協調，完成購地建校。芳秘書長本決定每年由聯董會提撥 7 萬 5 千美金，約 8 年，計 60 萬美金。但在 1954 年 1 月 12 日的 4 次東海大學董事會中，表示若有需要，可提升至 10 萬美金，而總金額可提升至 75 萬美金。

東海大學的校園空間是由貝聿銘先生負責，1954 年 4 月，邀請陳其寬、張肇康先生共同參與。初步設計都在美國紐約進行。1954 年 8 月，全部草案決定後，於 11 月寄回台灣，獲東海大學籌備處通過並付之執行建造，先由美國范哲明建築工程師、後增香港楊介眉建築師共同負責執行，並委託台灣本地林澍民建築師繪製施工圖，招標興工，營造工程由大陸工程公司負責。1955 年 3 月，對本地林澍民建築師⁵繪製施工圖反應不佳，而後告知貝聿銘先生，寄望能加以改進。原本貝先生向學校建議，可以聘請他的哈佛同學在台北開業的王大閔建築師當顧問，可是學校董事會經開會結果不予同意。於是，貝聿銘先生只好將其手下兩名我國建築師，派駐東海大學工地，做好督導工作。1956 年 8 月以後，先由張肇康(1956,8)、繼由陳其寬(1957,9)兩位建築師由美來台，負責監督後續工程的進行。特別的校園空間設計，使得東海的校園整個建築享譽國際。尤其是，路思義教堂的建造，更被視為是現代建築的經典案例。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在東海大學早期樹木尚未繁密之前，校園內任何一處地方都可看到教堂，這是東海大學的精神堡壘。芳衛廉秘書長再三強調，只有以上的 14 條或其他要項，共同成為臺灣某些人及某些團體的想法時才有意義，如果有任何與聯董會的目標不相符的計劃，加上共同合作的人無法全心全意地參與其事，聯董會參與的意願都會大降低，因為這種合作並非明智之舉。

1955 年 10 月 31 日，第一屆東海大學學生正式入學，計註冊入學者共 195 人；11 月 1 日，辦理選課手續；2 日上午 11 時，在臨時大禮堂--倉庫(現已拆除)舉行創校的始業式開學典禮。因為當時只完成部分的男、女生宿舍及學生

⁵ 林斯銘(Lin Sze Ming)建築師，字澍民，福建福州人。民前 14 年(1898)生，1916 年畢業於清華園學校，原係清朝政府以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建立的留美預備學校，當時的清華學堂選拔品學兼優的年輕人，入學學習預備課程，再派赴美國留學，獲明尼蘇達大學學士學位及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碩士學位。曾任中央大學教授，從事建築設計。

餐廳，所以學生上課、實驗、聚會……等，都在男生宿舍區進行。至於 1955 年 3 月後大陸工程營造公司所承包的文學院、行政大樓、圖書館一期、理學院……等工程，都正在施工進行中。另外，男、女生宿舍及學生餐廳，體育館，運動場，學生活動中心，教職員工宿舍，…也陸續發包、施工。



開學典禮由本校首任校牧穆藹仁牧師主持，建築物奉獻儀式則由本校董事長杭立武博士主持，繼由曾約農校長發表簡短演講，第一屆中文系學生蕭欣義代表全體學生致詞答謝；西屯區區民並致贈本校「有教無類」匾額一方。典禮完畢即行正式上課，教室、圖書館、實驗室均暫借男生宿舍--東海大學正式誕生，並定是日為校慶日。

勞作教育也在這天開始實施，蕭查理博士(Dr. Charles N. Shutt, 1897-1973)⁶拿著雞毛撻子和掃帚向同學們講解勞動的意義，隨即分組勞作；曾校長被分在第十三組，蕭查禮博士發給他一枝雞毛撻子。

會計長畢律斯女士(Miss Elsie M. Priest)⁷致聯董會的函件中，詳細地描述這個值得紀念的一天。這一天，陽光普照，並不冷，反而有點熱。午後，有名的風開始刮起，使天空中蒙上一片黃色的塵埃。每個人都辛勤地工作，使倉庫還看得過去；講壇是用松木所作成的，但已著上了灰色，擺上一束乳黃色的劍蘭。由於認為這是學校的聚會，所以沒有家長，也沒有旗幟。這一天的開端是早上七點鐘的早餐，七點四十五分舉行升旗典禮，然後學生進入倉庫練

⁶ 本校勞作制度的開創與推行，特別是由美國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會秘書長芳衛廉博士邀請美國肯塔基(Kentucky)州的貝利亞學院(Berea College)已退休的勞作室主任蕭查禮博士來到本校擔任學生勞作室顧問，其首要任務即為把本校建立成一個具有完整勞作制度的基督教大學。

⁷ 畢律斯女士，奉獻教育，終生未婚。民國 1921 年來華，服務於金陵大學；1951 年返美。1955 年 2 月，應聯董會之聘約三年會計長，來台協助創建東海大學。

習始業典禮中要唱的詩歌。典禮在十一時整開始，簡單、隆重，而且富有宗教氣氛。

在拍攝一張大照片後，全體共進午餐，師生都吃的十分簡樸，因為曾校長要讓來賓知道東海人是怎麼生活。畢律斯女士說：「整體的印象是，我們已在一個非常高的水準上開學了，一切都那麼隆重。我感覺到學生們會有更深刻的印象，他們以真誠的心靈齊頌聖歌，並且溶入其中。」曾校長在致聯董會的函件中亦感性地說道：「這真是美好的一天，風刮著，這使我在內心中稱呼我們的校園為森林神(Zephyrs)。但是來賓及學生並不在意。事實上，臨時禮堂太過擁擠，所以我們更歡迎風的吹拂。」

1955年11月14日，《時代週刊》(Time)，以「拓荒者」為題，專題報導本校的開學，並特別強調本校所進行的是「十分前進的革新」的教育計畫。並引述曾校長的一句話：「開創將是我們的格言(Pioneering will be our watch word)。」東海大學就這樣開始了開創性的教育事業。

許多老東海人認為，如果當年沒有聯董會秘書長芳衛廉博士所提出如此深刻、具有一針見血的實質建議，則今日的東海，可能僅是一所傳統基督教大學而已。

參、東海大學籌辦董事與創辦董事

1953 年本校的創辦既經省政府教育廳教二字第 53153 號批准立案。當年 6 月美國聯合董事會特派美國奧柏林學院前神學院院長葛蘭翰博士(Dr. Thomas W. Graham)為美國聯董會代表，偕同該會執行秘書芳衛廉博士抵達臺北，立即與國內剛卸任教育部長(1949)的杭立武博士接觸，積極討論籌備建校及籌組董事會事宜，並撥款美金五萬元作為籌備費用。



葛蘭翰博士



首任董事長杭立武先生

一、東海大學草創期的董事

1953 年 6 月中旬正式在國內成立基督教大學籌備處，設委員 9 人，原則上以 33 制產生，由剛從教育部長卸任的杭立武先生擔任籌備處主任，而葛蘭翰博士為籌備委員。嗣即擴大組織，加聘美籍牧師魏德光(Rev. Arne Sovik)、美籍狄寶賽夫人(Mrs. Constance S. de Beausset)、黃彰輝、英籍牧師安慕理(Rev. Boris Anderson)、加籍牧師明有德博士(Dr. Hugh MacMillan)、蔡一諤、誠恩慈及蔡培火等為籌備委員。其實，這所基督教大學籌備委員會的成立較為特殊，在籌備過程中，就協調出由三組人馬組成：外國人士(聯董會代表)、教會人士(主要以長老教會為代表)、官方人士(具有基督徒背景的黨政代表)，其中，又以前任教育部部長杭立武為籌備組主任。這樣的安排恐怕與中華民國以來「收回教育權」的結果有關，畢竟這是一個具有「外國勢力」的教育機構，當然更與當時的政治和外交氛圍有關。雖然過程確實有些阻力，甚至可能胎死腹中，最後還得請到了宋美齡說情才獲准成立，並把剛成立的籌備處設於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七巷二號，由徐公起(徐可燦)教授擔任執行秘書，隨即展開籌備工作，並決定先行籌設文、理兩學院。

籌備工作首要之任務，厥為選擇校地。當籌建大學消息公布後，各界期望均極為殷切，臺灣北、中、南各縣市紛紛志願提供建校用地。杭氏為此曾

會同美國聯合董事會代表葛蘭翰及若干籌備委員，數次前往各地接洽並作實地勘查。幾經奔波與考慮國內現況，最後決定接受臺中市政府之邀請，並於 1953 年 6 月 27 日，由杭氏宣布在臺中市西屯區大肚山上建校。臺中市政府表示願意撥地 143 甲作為建校用地，並一再表示所需校地可以完全贈送，該校(東海)不必負擔任何費用。這筆 143 甲的土地中，市有地 50 餘甲，由臺中市政府於收回放領地後，致贈本校(東海)，國有地 80 餘甲，臺中市政府於收回放領地後，租賃本校(東海)使用，並允諾豁免租金，以示優待(但事後本校不但須付出巨額補償費及租金，且出鉅資購買國有地)。惟此議尚須由臺中市政府報經省政府核准，當時地政處認為面積過大，且有農地在內，有意核減，經杭氏與省政府俞鴻鈞主席及浦薛鳳(浦遜生博士)秘書長兩度商洽，杭氏表示將來可設農學院或至少設置農場，方獲臺灣省政府同意。



東海大學籌備委員名單(1953)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業	籍貫	學經歷
杭立武	男	49	政	安徽	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台灣基督教大學籌備處主任
葛蘭翰	男	74	牧師	美國	美國 Macalester College 神學博士 奧柏林學院前神學院院長
蔡一諤	男	54	政	湖南	美國耶魯大學文學士 省府農復會會計長
黃彰輝	男	39	牧師	台灣	英國劍橋大學西敏斯德神學院畢業 台南神學院院長
誠恩慈	女	43	教師	河北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體育系畢業 籌辦金陵女子中學建校委員會
安慕理	男	34	牧師	英國	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 台南神學院教新約
明有德	男	59	牧師	加拿大	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的博士學位；台

					北聖經書院院長及基督教青年會副 理事長
蔡培火	男	65	政	台灣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 行政院政務委員
狄寶賽 夫人	女	33	社服	美國	美國賓州 Bryn-Mawr 學院文學士 台北國際婦女會會長
魏德光	男	34	牧師	美國	美國耶魯大學博士 泛美信義會國外佈道部總幹事

臺中市地處臺灣中部地區，素有文化城之名，交通便利，氣候宜人。大肚山地勢稍高，但坡度並不陡峻。俯望臺中市景，歷歷在目。山光雲彩，景色宜人。創校於此，十分適宜。校地決定後，即為校名之擬定。1953年8月11日籌備處開會，曾考慮以海東(董作賓、杭立武、黃朝琴、徐佛觀)、玉山(鄭通和、高信、許延俊、李濟、謝冠生)、協和(毛子水)、台中協和(雷震)、聖保羅(蔣夢齡)、成功(程天放)、玉海(張其昀)、夷州(朱家驊)、東寧(陳雪屏)……等名稱，會後決定再致函國內教育文化界人士擴大徵求意見。而後台大教授凌純聲於8月14日回函建議用東海為校名。當杭氏邀請在臺中故宮博物院清點文物之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台大教授凌純聲二氏查勘校址。杭氏見該地適在海之東側，傾向用海東兩字，但羅氏謂不如採用台灣大學凌純聲教授所建議的「東海」，並請凌氏再作一番研究。後來凌氏函告適宜。因此，杭氏遂據以提出籌備會議決通過。

校地、校名既定，籌備處乃向教育部呈請設立大學。經教育部核准後，於1953年10月2日依法成立董事會，設董事15人，原則上以35制產生，即由南、北各長老教會合推選董事5人(牧師)，曾經從事教育工作者5人，外籍人士5人，共15人組成。董事會成立後，隨即一致推選杭立武博士為首任董事長，蔡一諤、蔡培火、彌迪理(Rev. Harry Daniel Beeby，英籍)為常務董事。為推展各項工作，分設提名、建築、財務、校址、圖書設備等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由魏德光(Rev. Arne Sovik，瑞典籍，召集人)、高天成、誠恩慈組成。建築委員會由杭立武(召集人)、葛蘭翰、蔡一諤、蔡培火、彌迪理、狄寶賽夫人組成。財務委員會由黃武東(召集人)、蔡一諤、蔡培火、張靜愚、明有德組成。校址委員會由陳明清(召集人)、蔡培火、張靜愚組成。圖書設備委員會由安慕理(召集人)、曾寶蓀、狄寶賽夫人、高天成、黃彰輝組成。另聘毛子水、屈萬里、孔德成為顧問。並於1953年10月14日向教育部呈請立案，呈文謂：「自今夏聘請籌備委員會開始籌備以來，經數月之努力，已在臺中勘定校址，由臺中市政府撥地143甲，現正設計建築，預定明秋開學。茲籌備委員會已告

結束，並聘定校董成立董事會。」1953年11月13日教育廳正式核准立案。

東海董事會鑒於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將於1953年11月8日間訪華，由狄寶賽經理(1950-1957年間負責美援建設台灣)特別敦請其於11月11日蒞臨臺中大肚山校地，為此一新設置的基督教大學舉行奠基破土典禮，以象徵中美兩國間之合作。該項典禮於是日上午10時15分於校門口附近隆重舉行，到場有教育部程天放部長、美國駐華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 1898-1991)⁸、中部五縣市首長、總統府、外交部官員及各界人士共有一千餘人參加。

東海大學董事名單(1953-1954)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業	籍貫	學經歷
杭立武	男	50	政	安徽	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私立東海大學首任董事長
蔡培火	男	65	政	台灣	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 行政院政務委員
蔡一諤	男	55	政	湖南	美國耶魯大學文學士 省府農復會會計長
張靜愚	男	57	政	山東	英國利物浦工學院機械工程科畢業 經濟部次長
曾寶蓀	女	59	教師	湖南	英國倫敦大學理科學士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高天成	男	50	醫師	台灣	日本東京帝大醫學院醫學博士 臺大醫學院院長
黃彰輝	男	40	牧師	台灣	英國劍橋大學西敏斯特神學院畢業 台南神學院院長
黃武東	男	45	牧師	台灣	台南神學院畢業 台灣長老教會總幹事
陳明清	男	51	牧師	台灣	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畢業 長榮中學董事長、開業律師
誠恩慈	女	44	教師	河北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體育系畢業 金陵女子中學建校委員會及召集人
安慕理	男	35	牧師	英國	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 台南神學院教新約
明有德	男	60	牧師	加拿大	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的博士學位；台北 聖經書院院長及基督教青年會副理事長

⁸ 藍欽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土木工程系。美國外交官。1927年後的20多年間，他被派駐東歐地區。1949年，任美國駐廣州總領事。後任美國駐香港總領事。1950年任美國駐臺灣大使館臨時代辦暨公使，1953年總統艾森豪任命其赴臺北擔任美國駐臺灣大使，直至1957年離任。藍欽於1991年因前列腺癌於緬因州肯納邦克波特逝世。

魏德光	男	35	牧師	美國	美國耶魯大學博士 泛美信義會國外佈道部總幹事
狄寶賽 夫人	女	33	社服	美國	美國賓州 Bryn-Mawr 學院文學士 台北國際婦女會會長
彌迪理	男	33	牧師	英國	英國劍橋 Westminster 神學院博士 台南神學院副院長

物色校長人選為董事會最需要慎重決定的一個問題。因董事會懷於創業維艱，希望為大學選任一位在學術上既極具造詣，在行政上亦頗富經驗之士膺此重任，為學校未來的發展樹立楷模。於 1954 年 1 月 12 日第 4 次董事會議上，提及有關校長人選，有：Dr. S. C. Li (Michigan Univ.) 東方語文部主任；陳錫恩博士(Dr. Theodore Chen, S.C.U.) 亞洲語文部主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無意願)；基督教聖公會主教朱友漁博士；杭立武等五位。因此，董事會除 2 次開會討論可能人選外，並接受各方推薦，然遲遲無法決定。

1954 年 2 月，陳錫恩博士受聯董會芳衛廉秘書長邀請，向南加州大學(U.S.C.)告假一學期，由美國來到台灣台北。這是陳錫恩夫婦第一次到台灣台北，陳錫恩夫婦住在台北的中山北路二條通，陳博士每天走去中山北路辦公，當時台北辦公處有吳德耀博士，還有英漢書記。東海大學籌備初期，紐約中國基督教基金委員會派葛蘭翰牧師任代表，葛蘭翰博士到台月餘後，因故回美，中國基督教基金委員會復派陳錫恩繼續籌備，學校地點也已選定在台中大肚山，然而因一部份土地屬於私有，需多方交涉。甚至於到陳錫恩博士離台時都尚未完全收回。

當時，台灣社會大眾都希望東海大學能即日開學。在 1954 年 5 月 8 日第 7 次董事會議上，議決聘請美國南加州大學的陳錫恩博士(Dr. Theodore Chen)擔任代理校長，直到 8 月 16 日第 13 次董事會議，校長提名委員會所建議的名單，除陳錫恩外，還有梁少初、董顯光、浦薛鳳及韓慶濂等。經討論後，才正式提議聘請陳博士擔任校長。可是因教育主管當局(教育部)認為陳錫恩博士為美方代表，且具有雙重國籍，建議最好另行物色，而陳博士亦竭力謙辭，此議遂予擱置。



陳錫恩博士



前任校長曾約儀先生

10月15日又提名董顯光博士，董氏因政府將另有任務，亦未能成事實。10月28日，穆爾夫人來臺時，對校長人選遲遲未決，表示極大關切。

12月20日的第18次董事會議，提名委員會建議聘請曾約農先生擔任校長。經過董事會的多方瞭解，終於在1955年3月26日第20次董事會議中，一致通過選聘曾約農先生為校長，並推請杭董事長及魏德光董事代表致聘。

東海大學董事名單(1955)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業	籍貫	學經歷
杭立武	男	52	政	安徽	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基督教大學籌備處主任
蔡培火	男	67	政	台灣	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 行政院政務委員
蔡一諤	男	57	政	湖南	美國耶魯大學文學士 省府農復會會計長
張靜愚	男	59	政	山東	英國利物浦工學院機械工程科畢業 經濟部次長
曾寶蓀	女	61	教師	湖南	英國倫敦大學理科學士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林宗義	男	35	醫師	台灣	日本東京大學醫學博士 台大醫學院神經精神科教授兼主任
黃彰輝	男	42	牧師	台灣	英國劍橋大學西敏斯特神學院畢業 台南神學院院長
黃武東	男	47	牧師	台灣	台南神學院畢業 台灣長老教會總幹事
陳明清	男	53	牧師	台灣	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畢業 長榮中學董事長、開業律師
誠恩慈	女	46	教師	河北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體育系畢業 金陵女子中學董事
穆藹仁	男	34	牧師	美國	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關係碩士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牧師
明有德	男	62	牧師	加拿大	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的博士學位；台北 聖經書院院長及基督教青年會副理事長
魏德光	男	37	牧師	美國	美國耶魯大學博士 泛美信義會國外佈道部總幹事
狄寶賽夫人	女	35	社服	美國	賓夕佛尼亞 Bryn-Mawr 學院文學士 台北國際婦女會會長
彌迪理	男	35	牧師	英國	英國劍橋 Westminster 神學院博士 台南神學院副院長

二、東海大學籌辦董事與創辦董事個人小檔案

1. 杭立武董事長個人簡歷

杭立武(1903-1991)先生於 1903 年 1 月 26 日生於安徽滁縣(今滁州)，祖籍浙江杭州。

孩童時期，他的啟蒙教育是在父親開設的學館中接受的。1913 年，他進入滁縣的一所教會學校，不久又考入南京金陵大學附屬中學，1919 年畢業後直升金陵大學(1952 年合併於南京大學)文學院，1924 年畢業於金陵大學，次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安徽省公費留學名額，赴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深造，期間受拉斯基教授(Harold Joseph Laski)鼓勵，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擔任名譽研究員，獲碩士學位後返英倫繼續學習，1929 年獲倫敦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旋即回國，1930 年被聘為國立中央大學(1949 年更名為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曾兼任系主任。經楊杏佛教授推薦，又受聘為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1931 年 4 月，中英庚款會於南京成立，經楊杏佛、梅光迪教授推薦，杭氏任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杭氏旋於 1933 年在南京創辦中國第一個帶國際性的文化交流組織--中英文化協會，此後中法、中比、中瑞、中美等文化協會亦相繼成立。1932 年創立中國政治學會並兼任總幹事，直至 1953 年第四屆年會時才卸任。

抗戰爆發後，杭氏除擔任蔣介石與英國駐華大使及邱吉爾首相駐華私人代表魏亞特(Gen. Sir. Curton do Wiart)的聯絡員外，還受命護送珍藏於南京朝天宮的中央、故宮兩博物院的中國歷代文物至四川。抗戰期間，他還任國民參政會參議員、美國聯合援華會會長。1944 年 12 月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1946 年轉任政務次長，1948 年開始負責運送國寶到臺灣。1949 年任教育部部長。

1949 年後到台灣，曾籌建臺灣故宮博物院。國民黨敗退臺灣後不久，美國紐約教會聯合會決定在臺灣設立一所教會大學，於 1951 年 6 月派美國奧柏林學院前神學院院長葛蘭翰博士(Dr. Thomas W. Graham)為代表，偕同該會執行秘書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抵達臺北，與時任教育部長的杭立武商討，正式成立「基督教大學籌備處」，杭氏是東海大學創辦人之一。特別是 1953 年，他曾擔任東海籌備處主任。葛蘭翰、蔡一諤、蔡培火、黃彰輝、誠恩慈、狄寶賽夫人(美國)、安慕理(英國)、明有德博士(加拿大)及魏德光(美國)等為委員，徐可燦為執行委員，展開工作。最終學校校名經考試院羅家倫副院長提議，決

定採用台灣大學凌純聲教授的推薦定名為「東海大學」，作為與大陸十三所教會大學之校名有所區別。學校於 1955 年正式開學，杭氏為首任董事會的董事長。

另經杭氏的努力，還成立了行政專科學校(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前身)。1956 年起，歷任中華民國駐泰國、寮國、菲律賓及希臘諸國大使等要職，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首席代表。1965 年發起成立「亞洲與世界社」(AWI)。其間改組「港澳之友會」為「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協助港澳同胞繼續擁有自由權益；同時積極維護爭取臺灣原住民權益。1972 年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1979 年創立「中國人權協會」。續任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亞洲人民反共聯盟秘書長等職務。1980 年被推為學會名譽理事長。1991 年 2 月 26 日逝世。

東海大學的《校刊》為慶祝本校董事會成立 30 週年及 28 週年校慶，特別訪問了這位在學術界、外交界德高望重的長者。當時訪問情形如下：

30 年前的大度山上，風沙漫天，草木不長，放眼一片荒涼。在地貧土瘠的黃土曠野上，一群熱衷大學教育工作的海內外人士，正全力地投注他們的心血，奉獻他們的精神和勞力，在自由中國創立當時唯一的一所私立大學，於是，「東海」便在國內外人士的祝福和殷切期望中順利誕生了。

在東海籌備創校的艱辛過程中，出力最多、影響最大的人物，當推首任董事長杭立武博士。1953 年 6 月當美國聯合董事會研議在臺灣建校時，即派聯董會特別代表葛蘭翰博士及該會執行秘書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抵達台北，與杭立武博士接觸，討論籌備建校及籌組董事會事宜。當年 6 月中旬正式成立基督教大學籌備處，杭氏被推舉擔任籌備處主任，東海大學也就在「羣路藍縷，備極艱辛」的過程裡，由提議中理想的型態到計畫模型，最後在眾人殷望期待之下，終於 1955 年 11 月 2 日在大度山上舉行了第一屆創校始業典禮。

杭立武博士在台北「中國人權協會」辦公室裡接受訪問時，回憶 30 年前創辦時期的經歷，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為了選擇校地，杭氏曾親自南下分赴台南、高雄等地接洽並作實地勘察，有一次路經嘉義附近時，座車曾遭 10 輪軍車猛撞，機件和車身幾乎全毀，所幸僅腰部受傷，當時同行者尚有美籍人士彌迪理夫人(Dr. Mrs Daniel Beeby)，而 Mrs. Beeby 適為護士，及時救援，方無大礙。事後杭氏心理常存有「感謝心」和「安慰感」，並認為這是為東海奉獻效力的一個特殊紀念。

當初為了擬定本校校名也是煞費周章，杭氏表示為此曾請教過幾十位先生以徵求校名，有一天在校址附近徘徊，因地處大度山巔，可西眺梧棲海濱，

忽然想到臺灣是在大海之東，想以「海東」兩字為名，經過幾個月的思考，並和幾位文史學家商酌，不若以「東海」兩字為佳，因此「東海」便成為現用名稱，誠可見創校之初籌備處對任何有關事件的決定，不敢有絲毫疏忽。

杭立武博士表示，東海創辦之初即有一個共同的遠景，就是要建立一個需有創造性的新學府，實現崇高的教育理想，期對中華民國的高等教育有偉大的貢獻。特別是在辦學的理想目標上，要為全校師生建立一個學術園地，注意學生在研究上、品德上的成就，並能夠自由誠懇地去尋求真理，以及真理和人生各種實際環境的關係，使每一學生瞭解每一種科學對整个人生和真理的影響，加強其信仰的力量，使其一生能為真理作見證。目前東海八千人的局面，已完全改變了當年八百人小型大學的理想環境，劇烈且明顯的轉型變化，而產生諸多調適的困難與認同的危機。對此，杭博士以語重心長的態度表示，在現實環境浪潮衝擊下，東海應如何再調高教授待遇，延聘更多傑出師資留任東海，而不在各地兼課，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提昇校園內學術風氣，對現階段東海環境而言，無疑地是最重要的根本工作。若能對學術環境作具體的改善，東海仍是大有可為的。

杭立武先生雖自 1956 年即離開東海，奉命出使國外，但幾乎每年均會回東海一次，杭先生愉快的形容「回東海就等於回家一樣」。在他心目中對東海的成長就如同父母關愛子女般的心情，不時地詢問記者有關宿舍生活的情形，校園環境的變化，師生動態等等，他也對東海歷屆畢業校友在國內外傑出的表現感到欣慰。

由於杭先生曾歷任教育、文化、外交、社團各方面要職，今年雖已屆 82 高齡，仍積極地從事於國民外交，保障人權，和救濟難民等工作。一心一意地為國家社會服務，而不計個人功過，這些為人處世的態度正是吾輩之表率。

杭先生早年進入南京金陵大學政治學系攻讀，20 歲即前往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進修，三年後獲得碩士學位。而後，進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擔任名譽研究員。返國後曾任中央大學政治系主任，中研院社研所名譽研究員，1930 年轉任中英庚款會總幹事，長達 13 年之久，直到 1944 年出任教育部次長，才改任該會董事。在中英庚款董事會 13 年任內，舉辦了留英公費生考試 7 次，每年考選最優秀學生若干名赴英深造。本校前校長謝明山博士、法學院院長伍啓元博士等也是中英庚款同學。

杭先生曾向記者表示，自 40 幾年前在南京籌組「難民區」營救戰禍中的受難災民後，即對「難民」發生濃厚「興趣」，尤其近年來人權協會鑑於中南

半島戰爭之後，難民流離失所，亟待救濟，與聯合有關團體組織了「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分批派人前往泰境，救濟逃離共黨魔掌的高棉難民，杭氏並數度親赴泰邊難民區慰問，給予他們各種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援。

杭立武先生對臺灣最大的貢獻，莫過於兩度主持中華國寶古物之搬遷。在烽火遍野、兵荒馬亂之中，將大批精選古物安全運抵臺灣，使目前珍藏在故宮博物院中之 60 萬件中華文物，不論質與量舉世均公認為全球第一，也使中華民族 5,000 年來重要的文化遺產得以完整保留。因此，中共對此批文物未能得手憤怒至極，提到杭立武先生，就會咬牙切齒稱他為「戰犯」。

在與杭先生幾近兩小時的訪問裡，記者好奇的請教他，何以如此高齡能擔負衆多大任，他表示只要飲食起居定時，生活有規律，自可精神充沛，體力旺盛，雖然事務繁忙，也足堪勝任。他一生抱持為國家社會服務的宗旨，正如胡適之先生所說：「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收成。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穫。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不會白費。」

2. 蔡培火董事個人簡歷

蔡培火(1889-1983)，1889 年 6 月 20 日生，字峰山，臺灣省雲林縣北港人，祖籍福建泉州。

13 歲時(1902 年，明治 35 年)，因為接觸基督教的關係，學會羅馬拼音，從此自修台灣白話文、日文與漢文。1906 年進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就讀，1910 年畢業後任阿公店公學校訓導，兩年後於台南市第二公學校任教。1914 年(大正 3 年)加入台灣同化會，1915 年同化會遭解散，蔡培火也被迫離開教職，之後他在親友與林獻堂的資助下前往日本留學，並考上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理科二部(物理化學科)。而後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1919 年在日本東京留學時和台籍學生蔡惠如等人，成立聲應會。1920 年畢業，是台灣就讀專科學校第一人，之後擔任《台灣民報》編輯兼發行人，組織「新民會」。1922 年 10 月，蔡培火和林獻堂、蔣渭水、林幼春等發起並成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啟蒙文化團--「臺灣文化協會」。由蔡培火任發行人，出版第一份言論刊物--《臺灣青年》，對日本殖民統治進行抗爭。1923 年(大正 12 年)赴東京請願，成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後返台參加議會設置運動，當年 12 月 16 日早晨，蔡培火與林幼春由於反對日本政府而被捕。加入台灣文化協會，協助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著有《獄中十律》，可與文天祥<正氣歌>相媲美。其中之一為有名的《臺灣自治歌》。1924 年 7 月，蔡培火在新竹台中賑災

義捐音樂會中演唱自己作詞作曲的《賑災慰問歌》，引起強烈反響。之後曾因違反《治安警察法》遭逮捕，與蔣渭水一同被判刑四個月，此事是為治警事件。1927年(昭和2年)文化協會分裂，蔡培火因不滿協會有同志搞階級鬥爭，加上與連溫卿主張不合，所以脫離文化協會，並與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共同建立了臺灣歷史上第一個合法的政黨--「臺灣民眾黨」。但之後因蔣渭水大力支持工農運動，蔡氏即對蔣氏產生不滿，1929年在台南舉辦「羅馬式台灣白話字第一回研究會」，共舉辦三期，蔡培火是第一位企圖將教會白話字推廣到社會各層面的有心人。之後日本當局以「恐有影響於日語的普及，有礙教育方針」為由，加以禁止。1930年(昭和5年)8月蔡培火又因不滿黨內同志主張社會主義和工農運動，於是聯合楊肇嘉等人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2月遭台灣民眾黨開除黨籍。

當年，蔡培火和王受祿、韓石泉創立新生堂財團，嗣後仍堅持抗爭，被捕三次，抗戰勝利後，加入國民黨，代表臺灣同胞赴南京參加日本投降典禮，旋任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蔡氏前往東京以避開總督府，1942年由東京轉至上海。1945年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後，隔年回台。1948年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1950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凡15年。後受聘總統府國策顧問，並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1953年擔任東海大學籌辦董事，而後正式擔任董事。1974年4月19日，在蔡培火的創導下，成立中華血液基金會。1978年10月7日，由蔡培火、蔡登山和柯賢堯等20人在臺北市發起創建「柯、蔡兩姓聯宗的世界性聯誼社團」。1983年1月4日病逝。高齡95歲。



狄寶賽與蔡培火在東海大學創校開學典禮合影

蔡培火著有《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臺灣》、《告日本國民》、《亞東之子如斯想》等，並與人合著《臺灣民族運動史》。這本書記載了從 1914 到 1945 年間發生在臺灣一系列的民族運動，全書分為 10 個章節，對於臺灣議會設置運動、治警事件始末、臺灣文化協會、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農民運動等有詳細描述，有重要的價值。

蔡氏一生著作頗豐。1969 年，他編印了《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約收三萬五千詞，1126 頁。這一本中型國台對照辭典，本可以填補當時學界忽視台語之病，但是採用自己修訂的基本式音標，時人難以接受，更重要的是因為當時幾乎完全沒有台語教育，因此該辭典並未引起應有的注意。

其實，他早在白話文運動之前 8 年，便已開始提倡羅馬字運動；1914 年臺灣同化會成立時，蔡氏即向該會建議推行，可惜該會幹部反對，未能實現。等到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便於 1923 年 10 月議決將普及羅馬字、編纂發行羅馬字圖書列為該會新設事業之一。1925 年蔡氏用白話字寫成《十項管見》，其中《新臺灣與羅馬字的關係》一篇，最為重要，他認為，透過此一簡便易學的工具，一般人將非常容易吸收新思想新文化，以提高臺灣文化的水準。換言之，蔡氏之提倡羅馬字，是想將布教的工具轉化為教育的工具，因此當時頗多人贊成，但反對者還是占大多數，這一方面是日本當局的阻礙，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從事文化運動的人士較傾向普及漢文，尤其是中國白話文，認為羅馬字是外國文字，只適合教會使用與文盲學習，以致無法獲得社會普遍的認同。

蔡培火應是少數能活到戰後，且比較沒有受到打壓的政治人物，這點即不同於早逝的蔣渭水、蔡惠如，也不同於差點身陷囹圄的林獻堂，蔡氏於 1945 年日本宣布投降後立即加入中國國民黨，次年蔡氏回到台灣，而後參與行憲後的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1948 年當選。1950 年被行政院長陳誠聘為政務委員，1952 年擔任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兼台灣省分會會長。1974 年蔡氏從紅十字會中撥出新台幣 20 萬元創辦中華民國捐血運動協會，自任會長。先後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成立四個捐血中心。

在彭明敏《逃亡》一書中，曾對蔡氏有下列描述：蔡培火是一位極端虛榮、偽善，阿諛權勢的機會主義者。他被任命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後，得意忘形，在教會公開場合，怕別人不知道他地位的崇高，刻意說明：「我這政務委員就等於是日本的大臣，你們知不知道」。

3.張靜愚董事個人簡歷

張靜愚，山東省高唐縣人，歷任公職：南京政府航空署副處長、空軍官校第一任校長(1928年10月~1929年7月)，空軍司令，司令部航空署中將署長，河南省建設廳長、財政部全國稅務署署長、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經濟部次長。

張靜愚(1896-1984)是位基督徒，1924年追隨孫中山、蔣中正，擔任黃埔軍校蔣校長英文秘書、外語文總教官、北伐時任航空司令、河南省建設廳長、對日抗戰時財政部全國稅務署長；與尹任先、胡宣明等人合力創辦基督教聖光學校。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台，任立法委員、經濟部政務次長、台灣鋁業公司董事長。1955年張氏與賈嘉美牧師(Rev. James Graham)、鈕永建、吳鴻森、徐崇德等成立中原理工學院，後1956年與韓時俊等人成立國際基甸會中華民國分會(The Gideons International of R.O.C.)。

茲將張靜愚個人生平與學、經歷簡列如下：

生平：出生 1895 年大清山東；逝世 1984 年中華民國臺灣。

學歷：1903 年入縣立高等小學堂讀書。1910 年考入省立濟南農業學堂。歐戰時在清華學校應招赴歐，大戰停止，仍以公費續留英國。英國利物浦工學院機械工程科畢業。

經歷：1924 年結業回國，先任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旋調黃埔軍校，任校長蔣中正的英文秘書。此間，曾以黃埔軍校教導團第二團國民黨代表的身份參與東征。1925 年，任廣東航空局業務處長。以後改組為航空司令部，張氏接任司令。以後持續在航空署、航空委員會，一直到現在台灣的空軍總司令部任要職。1925 年 3 月，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7 月，張靜愚為黨代表。1926 年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航空局長，後改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航空處處長兼海軍處國民黨代表。1926 年 7 月，航空局改組為航空處，司令部。張氏仍以黨代表出任航空副處長。1927 年 1 月張氏以廣東航空處黨代表代理處長。1928 年張氏以南京政府航空署副處長身份隨任國民政府北伐軍航空隊司令，參與北伐。1929 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航空署中將署長(相當於空軍總司令)。北伐後，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外語教官。1932 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總政治訓練處長。不久，改任河南省建設廳長。1940 年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部全國稅務署署長。1946 年出任制憲國大代表。1948 年任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1950 年到台灣，任經濟部次長，台灣鋁業公司和機械公司董事長等職。1953 年組織創辦了中原工學院，後升格為中原大學。1962

年組織「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並任首屆理事長。1971年退休。1984年6月27日過世，享年89歲。

4. 曾寶蓀董事個人簡歷

在中國近代女子辦學興教的歷史中，有一位女性的名字不該忘記，那就是曾寶蓀(1893-1978)。她不僅創辦了一所全新的中西合璧的女子學校--藝芳女校，且終其一生獻身教育事業。她家學淵源，曾祖父即是理學名儒曾國藩。

曾寶蓀，1893年生，4歲發蒙，在家中私塾讀書到14歲。

曾寶蓀的祖父精通算學，祖母郭太夫人，即「藝芳老人」，也有很高的文化學養，她不喜八股文章，不願孫輩去考秀才，卻要他們學外國文字。曾寶蓀喜歡看小說、雜書，她曾有一本小說集傳世。父親曾點了翰林，是維新派人士，沒有給她纏足，也沒有替她從小定親。14歲那年，她到了上海，先後進入女子教會學校--晏摩、務本女校讀書。後又考入杭州省立女師讀書。1910年，她改入英國聖公會所辦的一所教會學校--馮氏高等女校學習。

對曾寶蓀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有三個：祖母、父親和英國人巴璐義女士，而最終促成她事業的卻是馮氏女校的校長英國人巴璐義女士。曾寶蓀與巴校長的交情開始於她的一次反叛行為，因為她對學校的許多做法表示憤怒，就自辦了一張報紙，專講學校不平之事，巴璐義校長看了不僅未有開除之意和懲罰之心，還和她促膝交談，從此兩人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1912年，巴璐義女士有回國一年的假期，巴校長非常欣賞曾氏的學識和人品，決定帶她到英國留學深造。於是寫信徵求曾寶蓀父親和祖母的意見，父親完全同意，但祖母要求在巴師(曾寶蓀這樣稱呼她)回國之時將孫女一同帶回，方才答應。

1912年4月初，她們從中國出發。到英國後，為升大學，她於1912年9月，進入英國有名的黑山高級女子中學學習英文，並選修生物學和化學，將來準備學醫，科學救國。1913年9月，她以優異成績考入倫敦大學的西田書院。在西田書院，她選的是理科，課程有生物學、化學和數學。

當曾氏不負恩師厚望，考上倫敦大學西田書院時，巴師的歸期已屆，曾氏該怎麼辦？到底是放棄學業回國？還是不守當初對祖母的承諾而獨自留在英國？但如果巴師不回中國再為教會服務5年，她將失去退休金。經過一夜的痛

苦抉擇，巴師決定繼續留在英國，陪伴曾氏完成學業。曾寶蓀問說：「那你豈不是為了我犧牲了自己的退休金麼？」這位愛才的女士卻說：「上帝會安排的。」

1916 年，曾氏以優異成績獲倫敦大學理科學士，成了中國女子中的第一個理科學士(是中國女子所得的第一個理科學位)，這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還是第一遭。畢業後的她，在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繼續讀研究科目。為了將來辦學準備計，1917 年，她又在倫教學了一年師範科，並與巴師在英國籌措資金，籌畫回國辦學事宜。1917 年 10 月 30 日，她們得到西田書院校長和各界人士的捐款資助，決定帶著基金回國辦學。

回到中國的曾寶蓀，決定與巴師在湖南長沙辦一所全新的女子學校，既不同於外國人的教會女校，也不同於中國人辦的女子學校，而是將中西最好的教育相容並蓄，辦一所自己理想中的學校。1918 年 9 月，藝芳學校正式開辦，一辦就是 32 年。曾氏任校長兼英語和生物學教員，巴師作英文教員，她的弟弟曾約農任教務主任兼英、算及理化教師，又請了一些國文、體育、音樂和手工教員。

藝芳學校是一個既民主又嚴肅的學校，擁有初中高中六年一貫制度。學校管理採取民主制，學校大小事由學友會成員投票決議，所有學生和教員都是學友會成員。學校所有帳目公開，任何學生都可以查帳。學校從不開除學生，不記過，不當堂訓斥學生，有什麼問題私下談話解決。

曾氏一生未婚，但她並不寂寞，她把自己的愛心獻給了每一個學生和教育事業。她不僅是藝芳學校的校長，還兼任省立第二女子中學校長、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她常常被邀請演講，曾在 12 個省市演講，時間長達半年。她曾四次出席國際會議，包括在日本和中國召開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由於她對教育事業的貢獻，受到眾多人民的尊敬。

1949 年，她離開大陸到了香港。1951 年受宋美齡邀請到了臺灣，這時她的年事已高，並且身患疾病，沒有再做具體工作。1978 年，以 85 歲的高齡在臺灣去世。

5. 蔡一諤董事個人簡歷

蔡一諤(1899-1991)是東海大學創辦時的代理總務長。1899 年生於湖南。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獲得文學士，曾任東南大學教授，燕京大學總務長，農

復會會計長，東海大學總務長、董事及董事長。

早在 1951 年 6 月，曾任燕京大學會計長的蔡一諤先生和魏德光博士(兩人後來都擔任東海創校之董事)就向 UBCCC 爭取補助台灣高等教育。同年 9 月，東吳大學校友首先向該會爭取在台復校；金陵、燕京大學校友也建議以「聯合流亡大學」(a joint institution-in-exile)的名義在台復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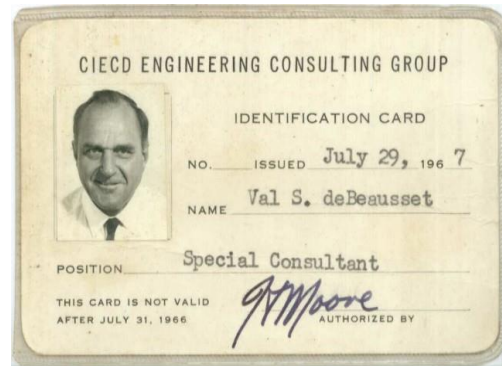
1950 年，自由中國臺灣省熱心教育之基督教教會人士，洽商美國基督教亞洲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請於自由中國設立大學一所，藉以延續基督教在華之教育事工。經中美雙方研究商談，乃於 1953 年 6 月開始籌畫，由杭立武為籌備處主任，蔡一諤及聯合董事會駐臺代表葛蘭翰為委員，一面勘查校址，一面籌畫立案等事宜，並由聯合董事會撥款，作為初期建校之需。是年 10 月成立董事會，推選杭立武為首任董事長。董事們接受臺中市政府及議會之邀請，以臺中市西屯區大度山為校園，地廣 143 甲，並定校名為「東海大學」。

6. 誠恩慈董事個人簡歷

陳啟東夫人誠恩慈女士，1910 年生於河北。畢業於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體育系，而後擔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體育系副教授並兼系主任。

政府播遷來臺，台灣的金陵女大校友，感念母校培育之恩，希望在台復校，由於當時設立大學有諸多條件限制，故轉而籌辦中學。1954 年 3 月，由委員 15 人組成建校委員會，公推誠恩慈(1910-???)校友為召集人，當時會務以籌措基金、尋覓建校用地為主，而後又陸續舉辦園遊會、義賣會、音樂會等，女大校友四處奔走籌措，因校友們熱忱募捐，當時杭立武先生(夫人杭陳越梅為該校校友)及熱心社會人士協助，購置臺北縣三重市(今新北市三重區)的「以德新村」之址。校地取得後，乃於 1956 年 3 月 27 日正式成立私立金陵女子中學董事會，敦請金陵女大校友會會長賴孫德芳女士為首任董事長，積極進行建校事宜。是年 11 月 5 日，奉准立案開學，首任校長為徐秀英女士，首屆招生僅設高一、國一各一班，學生共 54 人，傳承金陵女大「厚生」校訓，沿襲以紫色為校色，並以每年 11 月的第一個週六為校慶紀念日，發揚母校教育理想。

7. 狄寶賽先生與其夫人簡歷



(1)狄寶賽先生個人簡歷

狄寶賽(Valery Sergei de Beausset, 1915-2009)先生，1915年2月3日出生於俄皇統治的聖彼得堡軍人家庭，是塞爾·尼古拉和安娜·佩特洛娃·德·德波塞的兒子。俄國大革命時，母親安娜帶兄弟兩人逃至黑海，經羅馬尼亞，1920年抵達美國。俄裔的他崇拜俄國結構學大師 Timoshenko(土木建築人的經典力學著作--Theory of the structure 的作者)，而把他家的小狗暱稱為 Timmy。1934年進入哈弗福德(Haverford)學院學習，1938年自化學工程學士畢業後，再進入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研究所攻讀工程學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1944-1946年)他擔任隊長與美海軍陸戰隊儲備(U.S. Marine Corps Reserve)。

1944年6月3日，他與密歇根州格羅斯島的康斯坦茨·李·斯坦頓(康妮)結婚。從1946-1948年，他在印度特拉凡哥爾工作，為洲際集團建立化肥廠。自1948年至1958年，他是 J.G. White 工程公司的工程部主任，全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而工作。當上海被中國共產黨佔據，他的工作團隊隨著蔣介石搬到台灣，到台灣後，他的夫人與女兒也加入團隊。1957年他受中國的國民黨(台灣)政府蔣介石總統明令表揚並授贈景星勳章。1967-1974期間，狄氏是一位發展的顧問，包括：墨西哥，玻利維亞，薩爾瓦多，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哥斯達黎加等，還有中美洲銀行經濟發展顧問的總裁。從1979-1988年，他是國際開發署的宏都拉斯政府對農村發展的顧問。

他在1988年退休後，居於格羅斯島。他當年在中華民國工作的紀錄所保留的紀錄片與文件檔案，在2007年全是由台灣台北的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保存。狄氏在2009年10月18日死於密歇根州的家裡。

他及其妻子康斯坦斯(康妮)，共有4個女兒：英迪拉，李太，瓦萊麗和 Denise；一個兒子：亞歷山大。共有7孫子和一個曾孫。

(2)狄寶賽文庫(1000)-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資源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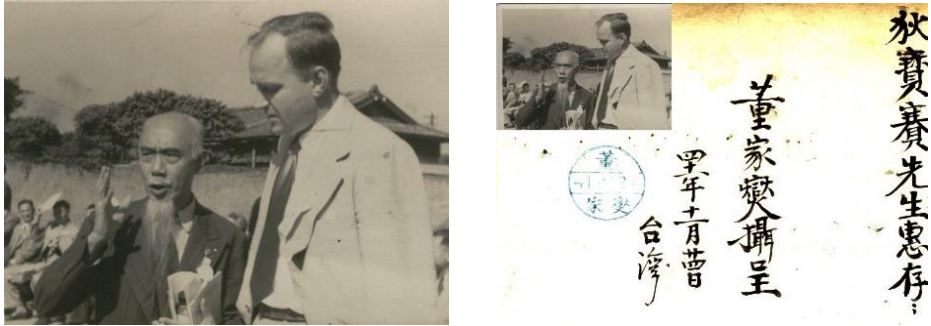
在 1950-1957 年間，J. G. White 公司在臺灣的企劃經理是狄寶賽(Valery Sergei de Beausset)先生。其實，狄氏在美援臺灣時期，對美援在臺灣之經費運用與各種建設計畫案之規劃，是極具影響力的人物。狄氏 1950 年代擔任 J. G. White Corporation 之高級工程師與指導顧問，而美援臺灣諸多建設工程均由該公司所承包負責，因此，狄氏與美援臺灣之建設，關係與影響力俱極深厚，尤其與前故蔣經國、嚴家淦、吳國禎、陳誠、李國鼎等人，皆因美援臺灣運作方面的研商之必要，曾多方共事接觸。台灣大學圖書館所徵集之「狄寶賽文庫」，包含影帶、照片、日記、檔案手稿原件等資料；計 1,342 件，各件所含頁數不等。臺灣大學圖書館計畫將狄寶賽文庫中的日記、手稿、以及檔案原件等都加以數位化，並挑選日記全文建檔。完成後可讓見證中美合作的史料重現，亦可使國人回顧臺灣在美元支援下的建設脈絡，並提供學者珍貴的美援臺灣建設歷史研究之第一手資料。

因此，該館所珍藏的「文庫」內容，主要是狄氏在臺灣工作期間，所留下的工作與生活記錄，美援建設的歷史文書檔案、個人日記、狄寶賽夫人所撰寫的臺灣見聞散文稿等。除提供美援臺灣重要建設之內容、規劃等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外，也紀錄著臺灣早年的風土民情與山川樣貌，可謂是美援臺灣時期的見證性史料。

以下的相關資料，與狄寶賽太太(名為康妮)有關。而狄寶賽先生也與台中的東海大學在台灣創立有著密切關係。

狄寶賽與蔡培火兩人的歷史性聚會，應該是與東海大學之創辦有關？在 1949 年到 1957 年期間，狄寶賽因掌控了美援台灣時期國內的許多重大建設，當然也會包括許多大學校園建設。雖然，東海是經過美國聯董會支援，應也不例外。狄氏及其夫人與中央政府官員的關係極為密切，尤其是總統府的蔣介石家世，由下面的部分資料或可得其端倪。後來東海大學開辦時，因狄氏

負責當時國家重大建設--中橫公路的忙碌無暇顧及，就由他的夫人康妮替代加入東海籌辦委員及東海早期的董事，參加了有關東海之建設會議，以及各種委員會兼董事會之秘書。



狄寶賽與蔡培火的寫真

芳衛廉博士於 1952 年 1 月來台，設立大學的計畫才開始成形。1953 年 6 月成立東海大學籌備處，杭立武任籌備處主任，葛蘭翰、蔡一諤、蔡培火、黃彰輝、誠恩慈、狄寶賽夫人、安慕理、明有德與魏德光等為籌備委員。6 月 27 日，選在大肚山上建校，校名經定為「東海大學」。10 月 2 日董事會成立，杭立武任董事長，設董事 15 人，包括狄寶賽夫人、安慕理、明有德、葛蘭翰、彌迪理、蔡培火、蔡一諤、張靜愚、曾寶蓀、高天成、黃彰輝、黃武東、陳明清、誠恩慈、魏德光。



11月8日尼克森訪台時，已由狄氏夫婦邀請，並安排在11日上午10點15分，在台中東海大學校園內(校門口附近)，主持東海的破土典禮。

先前，狄氏曾說：「在1948年曾來台數次，為了替蔣介石(KMT)政權尋找最後基地。現在終於找到了，其相對應動作快、成果佳。」詳情如下：

A.1948年因國共戰亂，將故宮博物院南遷文物、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文物、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圖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文物、外交部檔案等，開始運往臺灣，成立「中央文物聯合保管處」。12月27日，第一批文物772箱(包括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320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212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20箱、中央圖書館60箱、外交部重要檔案60箱)已由中鼎艦運抵基隆港⁹。然後運至霧峰吳家花園附近，也就是車籠埔附近建立臨時館安置。

B.1946年聯勤兵工廠，接收青島及濟南日軍廠房及裝備。1948年，濟南撤廠，設備機具搶運至青島。11月，自青島舉廠遷至台灣。12月，在台復工，廠址位於台北市三張犁。

C.故宮藏品之運抵台灣與聯勤兵工廠遷至三張犁，與狄氏說法，互相印證，蔣中正在1948年就計畫逃亡台灣，顯然這是美國默許的動作。

D.受美國政府委託，而擘畫戰後第一個四年經建計劃的台灣經濟總舵手--狄寶賽先生，1949年來台時才34歲，1951年撰寫重要又實際執行的國家經建計劃書時，也才36歲。

狄氏曾任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J.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企劃經理長達八年(1950-1957)，該公司則肩負美援臺灣建設規劃督導之責。

懷特工程公司在1890年由James Gilbert White所創立，初名J.G. White & Company, Inc.，是活躍於紐約的一家工程公司。恰好19世紀最後10年的集中式發電所、街道電燈及城市鐵路誕生，工程與技術急速發展，懷特公司因而竄出成為工程界明星。1913年改名The J.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1959年出版《70 Years of Achievement》慶祝公司成立70周年，但很諷刺的是，1962年8月1日起，在台灣的業務，改由美援工程顧問團(CUSA Engineering Consulting Group)承接。次年9月1日，因美援會改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美援

⁹ 詳見維基百科。鄭欣淼，《天府永藏：兩岸故宮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39頁。

工程顧問團再度被迫改名為經合會工程顧問團(CIECD Engineering Consulting Group)，資料顯示，1967年8月22日，該單位仍在台灣承攬工程顧問業務。

狄氏曾踏遍、勘查整個台灣的窮鄉僻壤，包括：建造電力系統，通訊系統，橋樑，公路，水泥廠，肥料廠，紡織廠，塑化廠……等。中華民國由大陸撤退到台灣後，草創期的台灣各重要國家基礎工業和民營大企業，在開創時期幾乎無役不與，不只計畫設計而已，也常到第一線查看，並和美國特聘前來的各相關專長顧問，進行現場問題的實際研判，指導技術和督導進度，真正是台灣戰後經濟奇蹟最大的幕後功臣。這些受惠的單位和企業，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均曾提及或洋洋自得的意外露餡，恰如台聚--第一家外資企業，1965年美國國民製酒及化學公司以1500萬美元成立，其前常務董事沈祖馨，曾在台肥廠任職廠長，參與台肥六廠的籌建工程，回憶道：「曾經在美國顧問公司懷德公司的指導下，完成了我國第一部肥料工廠的計劃書。」這計劃書是狄氏參與其中，因他自稱是以肥料廠建置專家經歷，來台灣的懷特顧問工程師。台肥六廠創立於1951年5月，1952年5月開始籌備，1953年3月正式撥款進行。大多數受美援贊助的本土企業主，似乎集體患了選擇性失憶症，幾乎都忘了懷德(特)公司的存在。

雖然「Money is power.」，但對於土木工程建築物的實現更是如此。若沒有美援經費與先進材料和技術，台灣中部東西橫貫公路的開闢，將永遠只是束之高閣的紙上作業。而有錢卻被不稱職的人士濫用，目前隨處放眼可見，終究只是會做消化一堆預算的處置：如剛鋪設不久的大馬路，隨即就會再進行柏油路面的開挖；剛鋪好的人行道，換了執政團隊就再重鋪一次；或如那些惡名昭彰蚊子館的大工程和建築物，或者農林水利單位，在荒山野地建築那些自認為不易被人察覺的無數水泥長城溝渠等。

美國政府有錢又有智慧找對的人--狄寶賽先生代表的團隊來執行預算，奠定日後接受援助的對象有自立自足的能力，加上後來越戰龐大戰爭需求，以及駐台美軍大量消費的推波助瀾，幾乎被美國政府視為「準州政府」格局的台灣，其經濟終能卓立於世，維護美國原先規劃的戰略地位利益。

可能有些東海建築人還不知道東海創校時，有一位美女在幕後幫忙，她正是狄寶賽夫人·康妮(Mrs. V. S. de Beausset)！東海的校園一直是印象中台灣美麗有特色的大學校園。到現在，仍不可能和一些大學校園一樣變得那麼

擁擠與醜陋。其實，東海創校時，就有一些好理念，像勞作制度，到現在仍在實施的教育工作。正如現在的俗語：要活就要「動」--鼓勵學生學習者勞動，自己動手做。建築人如不進工地當大工頭歷練，所畫出來的圖，又怎能順利如意的蓋得出來嗎？



狄寶賽夫婦與蔣經國做橫貫公路最後一次巡視¹⁰

懷特工程公司及其經理狄寶賽先生，才是真正推動台灣經濟奇蹟的重大力量之一，就是這一群真正低調實幹又默默耕耘，貢獻台灣經濟的幕後英雄們。狄氏已於 2009 年去世，雖已以 94 歲高齡蒙主恩寵，但他年輕時(從 33 歲開始來台，到 42 歲離台)和夫人及其團隊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諸多腳印，也將永遠受這裡有識的人們感恩、景仰與懷念！

(3)狄寶賽夫人

狄寶賽夫人康妮(1920-2012)與東海大學之創辦關係極為密切，在此不得不談談這一位重要人物。

1920 年 8 月 10 日，她出生和長大在 Grosse 島。1937 年她畢業於在底特律的利吉特學校(Liggett School)，而後她進入賓州布林莫爾(Bryn Mawr)學院，她主修生物學。1941 年從布林莫爾學院畢業，獲得了科學學士學位。她個人的希望，是能參加調查研究考察世界鮮為人知的角落。為了實現這一目標，1943 年她通過測驗且獲得了飛行員執照，並在 Wood's Hole 海洋生物實

¹⁰ 對此圖合理的解釋，是蔣經國先生就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簡稱退輔會)副主任委員期間，為了負責安排照顧榮譽國民之生活，自己先與狄寶賽夫婦探勘中橫公路興建工作，以便參酌決定由退役軍人負責相關興建工程事宜。後來曾被某種政治力量刻意扭曲，而被集體掩蓋住了歷史真相。可看見 1955 年狄寶賽先生夫婦視查東西橫貫公路時的寫真，一旁就是當時任職退輔會的蔣經國先生，而低頭盯著手上工程施工藍圖看的是狄寶賽先生。要說他不是初期此重大工程的關鍵擘畫與推動者，還會是誰呢？

驗室選取了研究所課程。

1944 年 6 月 4 日，她嫁給了冒險的狄寶賽(瓦列裡·謝爾蓋·德·德波塞)先生，他分享了她同樣的夢想。他們大多數時光都住在遙遠的第三世界國家，過著他們的婚姻生活，他們努力提高那些生活極度貧困的未開發國家的標準。

1945 年，他們搬到南印度的特拉凡哥爾，她在家裡的「未考慮」的孩子也來報到。於 1947 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在印度 **Banglaore**。

1949 年 8 月，他們搬到了台灣。他們住在這裡，直到 1957 年 8 月才離開。而她在台灣最特別的生活，就是她(康妮)幫助並加入東海的籌辦行列，且擔任東海的開辦董事會成員。她還深入探討了台灣內部山地同胞社群生活起居，收集原住民文物和哺乳類動物博物館。此外，她還設計和建造了五個房子。她為《中國郵報》的報紙寫了一個每週的專欄，他也學習中國山水畫，並且在台灣增加了四個孩子。

1959 年，狄氏從康妮的祖母的遺產，購買了格羅斯島(**Grosse Ile**)的立德—斯坦頓(**Rucker-Stanton**)的房子，就住在這裡，直到 1960 年，全家搬到墨西哥的索諾拉(**Sonora**)沙漠。在那裡，康妮負起家庭教育他們的五個孩子，並與她的丈夫一起工作。

1962 年，全家搬到了哥斯達黎加，康妮在那裡成為了在地國家日學校(**The Country Day School**)的副主任和老師。

1967 年，全家搬到特古西加爾巴(宏都拉斯 **Tegucigalpa, Honduras**)，在那裡繼續生活，直到 1989 年，康妮幫助發現薩爾瓦多 **Hogar** 的德奧馬爾 ÿ 埃斯佩蘭薩(**El Hogar de Amor ÿ Esperanza, The Home of Love and Hope**，愛與希望之家)被遺棄的男孩，這成了她最充實的工作和最親密地的重心。她擔任董事會對薩爾瓦多 **Hogar** 的 11 年(擔任主席的那些年共有 9 年)。而在宏都拉斯，康妮還幫助設計和建造在特古西加爾巴的 **Epsicopal** 教堂，以及對烏提拉(**Utila**)島，因為在 1974 年被颶風摧毀了機場般的協助。

1984 年康妮繼承 **Westcroft** 花園，劃分了她在宏都拉斯和格羅斯島項目之間的時間，直到她和她的丈夫最終落戶在斯坦頓—立德家格羅斯島 20 世紀 90 年代。

對她的女兒，李太說：「我的母親總是能夠讓我們住家裡的任何地方，不管它是在沙漠中或在宏都拉斯的山。」以及「無論如何，她總是提醒我們，我們的根是在格羅斯島」。

康妮共有五個孩子，英迪拉·德·德波塞，李太 **McKissack**，瓦萊麗 **Mesedahl**，

丹尼斯·德·德波塞，亞歷山大·德·德波塞，她有七個孫子，兩個偉大的孫子和她的哥哥，沃倫 B·斯坦頓。

2012 年 11 月 20 日，康妮在底特律家中去世，92 歲，2012 年 12 月 2 日下午 3 時，聖詹姆斯聖公會在 Grosse 島教堂的追悼會。



狄寶賽文書檔案(d108)內藏有 31 次董事會會議錄，依據第一次董事會會議錄，1953 年 10 月 2 日下午 2 點 30 分在台中舉行，出席有：Dr. Thomas W. Graham(葛蘭翰)、Dr. L. W. Han(杭立武)、Mr. P. H. Tsai(蔡培火)、Mr. M. C. Chen(陳明清)、Rev. W. T. Hwang(黃武東牧師)、Mr. Stephen Tsai(蔡一諤)、Dr. T. C. Kao(高天成)、Miss. P. S. Tseng(曾寶蓀)、Mrs. C. T. Chen(陳啟東夫人誠恩慈女士)、Mr. C. Y. Chang(張靜愚)、Rev. C. H. Hwang(黃彰輝)、Rev. Boris Anderson(安慕理)、Rev. H. D. Beeby(彌迪理)、Mrs. V. S. de Beausset(狄寶賽夫人康妮女士)、Dr. Hugh MacMillan(明有德)、Dr. Arne Sovik(魏德光)。會議決定 1954 年 9 月開學。通過杭立武為東海大學董事會主席。提名委員會提出報告，經討論後，同意下列任命：榮譽秘書：康妮。中文秘書：Mr. C. Y. Chang。榮譽財務長：Mr. Stephen Tsai。執行委員會：杭立武、Dr. Graham、蔡培火、Beeby 牧師、Mr. Stephen Tsai。設備委員會(Appointments Committee)：Dr. Sovik、主席、Mrs. Chen、高天成。建築委員會：杭立武、主席、Dr. Graham、Mr. Stephen Tsai、康妮、Beeby 牧師。內規(By-law)：決定請執委會。財務：黃武東、主席、Mr. Stephen Tsai、Dr. MacMillan、Mr. C. Y. Chang。校地委員會：Mr. M. C. Chen、主席、蔡培火、Mr. C. Y. Chang。設備及圖書委員會：Rev. Anderson、Miss. Tseng、康妮、高天成、黃彰輝。

在這些會議錄內有一些重要訊息，除第一條來自狄寶賽文書檔案(dB108)外，茲依序抄錄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室所藏之會議錄，有興趣讀者請務必自己找原稿瀏覽，以免有斷章取義之嫌：Dr. Thomas W. Graham 報告委員們二等

火車交通費、旅館、餐費等每天不超過 80 元新台幣，得向聯董事會(United Board)報支。楊介眉建築師與康妮之建議，與紐約方面所想像者頗相接近。貝聿銘與會。本會在紐約開立銀行往來戶，經分函各董事同意，憑康妮董事或蔡一諤董事簽字支付款項，本案正式通過。對將來大陸人士回去以後，校內各主要職位能有人接替，……及時培養有希望之台籍人士，以備將來在校工作，其辦法：(1)派往國外留學，作較長時之研究；(2)國外短期之考察。康妮發言：任何臨時校舍，除非在校地上建築，均非適宜。暫緩交地，其原因為國防部與空軍總部干涉。康妮發言：國防部所提安全問題……實在是不可能。康妮建議加設公共關係委員會：(1)設宴招待記者，…；(2)各處教會對本會不了解，…。談話會或聚餐報導本校情況。陳錫恩博士於 1950 及 1953 年，以南加州大學名義，發表文章兩篇，指稱台灣為反動政府，所以礙難同意擔任東海大學校長。1954 年 8 月 21 日上午因而召開董事談話會，指該文章兩篇並沒有如此嚴重。陳錫恩博士還另有雙重國籍問題，不適合擔任校長一職。蔡一諤董事與莊垂勝君洽談，擬派為校地管理人員。如陳錫恩博士者尚不能邀其同意，則以後此機構對「思想」兩字，想能有相當的自由，恐會極為困難。後附『東海大學社會關係改進意見』。學校基地自尼克森副總統破土以來，幾已一年，未能接收。任期 3 年之 5 位董事，候補人選如下：(1)康妮；(2)黃彰輝；(3)蔡培火；(4)明有德；(5)林宗義(候補高天成)；經一致通過。任期 1 年之董事 Rev. Donald MacInnis(穆藹仁)接安慕理遺缺。康妮以安息會刊物一份送各董事傳閱，…促進公共關係，亦可仿照編印簡單刊物。刊物內容應包括建築計畫、設校目的方針、各董事之簡介、學校章程之簡述、以及世界其他地區有關學生工讀情形。上次會議伊立克博士一節，原文台籍兩字應改為華籍，…國防部要求設置保防人員，對校內員工思想行動，隨時加以注意。康妮連任秘書(名譽英文秘書)。建築委員會：…康妮。公共關係委員會：…康妮(召集人)。公共關係委員會進行編印刊物。康妮：邀請教育界人士及對東海大學創辦有興趣者參加座談。試掘水井事已與台糖農工處簽立合同，…校園花木，農復會亦願協助。康妮近產一女 Denise。大陸工程公司處理柳安木…；康妮建議，請各董事抽出兩、三日時間，舉行靈修會，並願以其郊外別墅，借以充會場之用。內有建築委員會議記錄。舉行靈修會。

狄寶賽文書檔案(dB109)所見的東海大學資料，計有：1955 年 11 月 14 日《Time》刊東海大學始業典禮寫真，寫真上年輕的女學生帶頭昂首，通過尚在建築中的校園，讓人驚訝是攝影師的傑出觀點(女生 43 人、男生 152 人)。

1956年東海大學簡介，內「自由研究的氣氛是道德力量產生的保證」，43張寫真中，有1953年11月11日尼克森副總統主持破土典禮。東海大學校舍總平面圖草案寫真。1954年12月《New Horizons》刊登『東海大學在台中建校經緯』13張精緻寫真，其中首頁的寫真中康妮是在右2¹¹。

1953年，東海大學在台中市西側大肚山上創立。這是「在 Formosa 新創學校」不是「中國流亡學校在 Formosa 復校」（像中日戰爭時期，中國有幾所大學遷到後方，例如：西南聯大這種，在戰爭結束後會搬回）。1955年11月2日東海大學創立，始業典禮留影全校師生大寫真一張。至於 dB109 等文書部份，已在東海大學 50 周年公布部分。

雖然此校（東海大學）是美國基督教在海外傳教的事業之一，但還是與美國政府援助亞洲、冷戰圍堵共匪政策緊密結合的；中共是無神論者，嚴禁各種宗教；所以傳教活動也是美國對抗中共的重要一環。



創建東海大學的狄寶賽夫婦沒戴帽子的是康妮(Connie)

1953年來台灣主持動工典禮的，是當時才40歲的副總統尼克森(1913-1994)；又例如捐錢寄付的人裡面，有美國 TIME, LIFE, Fortune 的媒體大亨，其父親路思義在中國傳教，出生於中國的亨利·魯斯(Henry R. Luce, 1898-1967)，東海教堂就是他寄付的，所以才命名為 Luce memorial Chapel(路思義教堂)。

¹¹ 按，有關聯董事會之所有東海大學文書現藏耶魯大學，在還沒有取得狄寶賽文書前，曾經請 Dr. Adam Schneider 影印其中康妮部分。

尼克森來台灣時是住在蔣介石士林官邸，尼克森是以反共、蔣介石堅定美國友人著稱的。尼克森在 1953-1960 擔任 8 年副總統，1960 年要更上層樓時，敗給年輕的甘迺迪，但這不死鳥，在 1968 年又再度選上總統，並入主白宮，1972 年連任成功後，才因水門案醜聞而下台。

當時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訪問遠東地區，於 1953 年 11 月 8 日到達台灣。由狄寶賽夫婦邀請，於 1953 年 11 月 11 日上午來到台中參加東海大學破土典禮，中午返回台北，當晚接受蔣總統夫婦在官邸的款待。

當年尼克森來台中大肚山主持東海大學動工典禮時，還安排他去參觀大肚山腳下(約在今台中市台灣大道附近，即東海大學與高速公路中港交流道中間)，具代表性的一座三合院農舍(注意：台灣幾乎沒有四合院，絕大部份是三合院)。

這座三合院已被拆了(土地被市地重劃)，原先廳裡還有尼克森來訪三合院農舍的寫真掛在牆上，但後代子孫似乎不當它一回事。

美國副總統的尼克森來台灣訪問，是狄寶賽經理牽的線，因為他原本是東海大學創校委員負責建築那部分，但因工作太忙碌，就由狄寶賽夫人康妮代替，動土這件事當然是大事，相信當時的美國或台灣的雜誌或報紙會有報導與寫真。

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偕夫人，於 11 日上午 7 時 30 分，由省府乘專用飛機，8 時 35 分抵達台中，在台中各界熱烈歡迎之下。停留 2 小時 20 分，參觀台中市郊西屯區農會、衛生所，訪問農家陳坤松。10 時 5 分到達東海大學校址門口，並參加東海大學校舍破土典禮，並發表演說，全文如下：

主席，各位來賓：

我認為我在此次東南亞之行中，能參加東海大學校舍的破土典禮，確是一個莫大的光榮。當我坐在這裡，聽剛才幾位先生發表關於此一典禮的演說時，若干思想乃縈迴於我腦際，我相信你們也許會有同樣的思想。我們很難想像在多年以前，像今天 11 月 11 日這樣的一天，我們曾在一個亦像這樣和平的國度中，慶祝一個世界衝突的結束；而現在世界上卻又進行著另一個衝突，我們都知道此一衝突正在進行，尤其是聯合起來設立此一大學的各個社團，知道此一事實，因為不然的話，他們將仍能在中國大陸上工作，此一正在進行的衝突，決定許多基本事情。其將決定我們所生長的世界是否將是一個和平的世界，抑或一個戰爭的世界。是否是一個自由的世界，抑或奴役的世界？是否是一個為無神唯物主義者所統治的世界抑或一個為「對神有基本

信念」的男女所統治的世界？

我很榮幸能在此時，看到業已建立的軍事裝備與軍事力量，我很榮幸能看到，經濟建設的進步，農業的發展，以及處理衛生問題的進步。同時我有難得的機會，當我在此期間與若干政府首長，討論他們所遭遇的政治問題。所有我們提到的這些活動，對於我們正在從事的奮鬥都十分重要。--軍事力量，經濟力量，以及將適當利用自由世界軍事及經濟力量的政治決定，但是我們卻可能在所有這些方面擁有力量，而仍然在我們所從事的鬥爭中失敗。因為，加以最終的分析，今日世界所正在進行的大鬥爭，乃是為了人類心靈、意志與靈魂的鬥爭。這就是何以今天的典禮如此有意義，如此重要，因為這正是自由世界過去，所未能贏得的鬥爭與戰爭，而是我們將來必須贏得的鬥爭與戰爭。

領導青年學生，邁向自由之路，旨在適應未來世界。

我們潛在敵人所正在做的事情，說明了衝突這一方面的重要性。我們要認清我們問題的嚴重性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我們握有權位中的若干人，將對於世界的未來有若干影響。然而最終的分析，世界的未來將由我們在這些聽眾中，所見到的年輕人讀中學和讀大學的年輕人，以及準備在後此年代中讀中學和大學的年輕人所決定。這正是何以新青年領袖應指導其進入正軌，不入歧途一事，是十分重要；也正是何以他們所將作的選擇十分重要。如果他們能在像這樣的學校內受教育，他們將成為獻身於愛護他們的同胞、自由，以及致力於保持自由之途徑的人士；由於他們將能貢獻的此種領導，那將會是我們所願意生活其中的一種世界。

所以我們明瞭這個大學的重要性，它非但是適應這一國家的此一區域，非但適應於我們將生活其中的永久的未來世界。

現在我且一談其對中國及中國前途的影響，由於過去三年來此間所有的進步，我們在台灣見到了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建立。但由於此間所做的，及此間其他教育機關所做的，我們見到此島將不僅是自由中國。同時是自由世界的一個軍事和經濟力量的堡壘。而且它將是一個文化力量，精神力量的堡壘，和作為一切自由民族及願意得到自由的人民的榜樣。所以我現在再複述，我在開始時所說的以作結束，即在我們夫婦這次周遊世界的旅程中，我不相信我所從事的任何一項工作，會較這一件事更有意義或是更為重要。我向那些來此獻身創立

一個新的大學術機關的人士祝賀。這個學術機關將造就許多學生，而這些學生將成為領導者。自由世界的領導者，最後這些領導者將建立一個世界，使我們能與我們的鄰國及一切民族，非但在我們這個時代，而且在未來的時代中，和平而友好地生活其中。

典禮完成後，於 10 時 55 分，仍乘同一班飛機返回台北，於 12 時 30 分抵達。

11 日早晨，台中有些微雨，寒風，家家懸旗歡迎到這位友邦嘉賓。台中市長楊基先夫婦，議長徐灶生夫婦暨全體議員、彰化縣長陳錫卿夫婦，台中議長李晨鐘，南投縣長李國楨夫婦等中部各界首長，都曾到機場歡迎。

尼克森副總統除參觀農場外，於訪問農家時，並與農民陳坤松全家 13 人合拍照片一張。並以毛筆在陳坤松所特備的一方淡紅綢子上簽名留念。至 9 時 30 分，逕往東海大學參加破土典禮儀式。

根據記載，首先是尼克森副總統夫婦登上主席台，繼由東海董事蔡一諤先作簡單報告，後由教育部程天放部長，美國駐華大使藍欽等發言完畢，尼克森副總統即揮動鋤頭在預定建立學校大門的地點處舉行破土，儀式即告完滿結束。



東海大學在 Formosa 設校，表面上看是美國基督教在海外的傳道事業，事實上有何種象徵意義。

A. 蔣介石與宋美齡夫婦是基督教徒(他們可能是亞洲第一個信基督的國家領導人)，而宋美齡一家人正好是美國基督教。因此東海在台灣創立，於台灣的各种行政作業程序(選地、買地、設校許可)中，多是靠宋美齡一句話就搞定了。

B. 東海設校時，原本董事會已在美國就地找有名望的建築師，甚至考慮哈佛大學 Walter Gropius(1883-1969)！但最後是由 Gropius 介紹他的學生--年輕剛開業，出生於中國的貝聿銘建築師負責。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貽，曾是中國

銀行董事長及中央銀行總裁(1947)，是孔祥熙的部屬；而孔祥熙是宋美齡姐夫，這樣一牽扯大家就該知道裡面的裙帶關係了。貝聿銘 1953 年底來台中大肚山看基地時，也曾有拜會宋美齡的行程。1954 年 2 月底來台與美國芝加哥郝綏(Hussey, Harry)建築師共同評審參加東海校園設計規劃 22 人之應徵資料，結果無一人合格。

C.由於東海創校與蔣宋家族的密切關係，所以東海創校初期董事會成員中，大多由蔣宋人馬擔任，並有「單純」的宗教(基督教長老教會)人士，而康妮應該是較傾向屬於美方的代表。

結論是，東海在台灣的創立，不能僅視為單純美國宗教海外傳教事業；這是美援的重要一環！尼克森副總統來台灣主持東海大學的動土，並不是順道插花行程，而是賦與東海在台建校高度的蔣美外交上的政治意義。

8. 穆藹仁牧師個人經歷

穆藹仁(1920-2005)牧師，1920 年出生於美國，1940 年的穆藹仁年滿 19 歲，是美國大學在校生，受其老師影響，年輕的穆藹仁決定隨教務長到福建順昌縣教書。在順昌洋口鎮度過一年的生活，讓穆藹仁對中國留下了深厚的情感。

1945 年，穆藹仁第二次來到中國。作為美國援華空軍飛虎隊的一名中尉，他被派遣到廈門。他利用自己粗通日語的特長，在汕頭審訊了兩名日軍戰俘。1945 年 8 月，抗戰勝利後，穆藹仁退役了，轉入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國際關係碩士學位，他毫不猶豫地將研究方向投向了中國。

1947 年在福州舉行衛理公會來華宣教百週年紀念大會，極一時之盛。當年衛理公會在中國已有宣教士五百餘人、會友十餘萬人，多所學校、神學院、醫院，及其他慈善機構，為中國境內相當重要之基督教宗派。

1947 年 9 月，剛拿到碩士學位的穆藹仁又迫不及待地重返福建繼續任教。而這一次，他不僅帶來了妻子，次子穆彼得也在福州誕生了。也許是父親的耳濡目染，穆彼得回國後對中國始終充滿嚮往。當年穆彼得在哈佛大學念書時，被譽為「中國通」，而妻子艾倫也在哈佛選修漢語。

1949 年大陸易幟，大陸十六個省的衛理公會會友，隨著政府播遷來台，分居全台各地。1952 年初，黃安素會督(Ralph A. Ward)偕同芮理察會督(Richard C. Raines)暨富品德博士(Peace Hayes)來台訪問，探討該會在台展開宣教工作之可行性，返美後即向差會積極建議爭取來台宣教。

1953 年元月，由黃安素會督、聶樹德牧師(Edward K. Knettlar)，陳維屏

牧師在台北中國之友社，舉行開拓工作招待茶會，是為衛理公會在台之始。隨後陸續來的宣教士有穆藹仁牧師、裴敬恩醫生、樂威廉牧師等人。是年，台北衛理堂正式成立，並分別在台中、台南等地設立家庭聚會。

1953 年 9 月，穆藹仁牧師(Rev. Donald E. MacInnis)全家也抵台，在台中開拓教會和幼稚園的工作，1954 年 1 月，台中以十二位由大陸來台之該會會友為基本會友，開始聚會，6 月購地建造教堂。

1954 年冬，他擔任剛成立的東海大學的董事及首任校牧。當時范哲明(Paul Waint)工程師應聘由美國紐約來臺，擔任東海大學第一期建校工作，由當時任本校董事的穆藹仁牧師陪同測量校地。

1955 年 11 月 2 日，創校典禮前的創校升旗典禮，由第一任兼任校牧穆藹仁牧師主持始業儀式。

1956 年經位於美國敏尼阿波立司(Minneapolis)之總議會，承認並批准在香港成立第一屆香港台灣臨時年議會，黃安素為首任會督，並派聶樹德牧師為台灣區教區長。因衛理公會在台的改變，使穆藹仁牧師於 1957 年暑假離開了東海大學。而後穆藹仁牧師擔任衛理公會北教區長。

9. 葛蘭翰牧師個人經歷

葛蘭翰牧師(Rev. T. W. Graham)，擁有神學博士學位，他曾是俄亥俄州奧伯林學院神學研究院院長，先後曾獲得多倫多、渥太華等多所大學榮譽學位。

在 1899 年，葛蘭翰博士畢業於渥太華大學學院，他獲得學士學位。1903 年，獲得多倫多的大學碩士學位。而後從蘇格蘭格拉斯哥自由教會學院與從美國麥卡萊斯特學院畢業，在 1910 年他獲得了他的神學碩士學位。

葛蘭翰博士 1904 年來到英國這個國家，他馬上就進入神的工作。1908 年被任命進入長老部，在 1912 年至 1920 年間，他是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聖安德魯教堂的非國教派的牧師講道。他越來越感興趣神威學科的教學，在 1921 年他放棄了田園的位置而進入教學，並成為講道學者，在歐柏林研究院擔任教授。葛蘭翰博士在很艱難的神學教育中，取得的空前成功，而後 1923 年在奧伯林研究院，他被授予擔任神學院院長。

葛蘭翰的整個職業生涯中，皆可在各種青年運動興趣中自得其樂。他在這個領域最突出的工作，一直是在行政職務上，在不同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組織，曾發揮了突出的一部分，幫助高中學校 YMCA 的增長中心。在二次大戰時，葛蘭翰博士擔任的美國陸軍基督教青年會，在明尼蘇達州斯內林堡奧

及在法國巴黎擔任秘書。

1931年作為一個大學的佈道者，這是他第三次在康奈爾大學講道。1948年他在奧伯林學院神學研究院的院長職位退休。

三、東海大學籌辦董事與創辦董事(台灣長老教會)個人小檔案

1. 黃彰輝牧師個人經歷

黃彰輝(1914-1988)牧師，於1914年8月出生於日本統治下的彰化，因出生地取名「彰輝」，父親黃俟命及祖父黃誌誠(舊乳名黃能傑)都是牧師。隨著父親黃俟命的工作在鹽水港和台南成長，1922年4月，進入台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就讀小學。1927年受洗於台南東門教會，該年4月公學校未畢業即進入「長老教會中學」(長中)就讀，由於在殖民地政策下，黃彰輝無法報考高等學校。1930年到日本青山學院中等學部就讀。在日本見證了基督徒不畏日本軍國主義的壓迫，譴責日本入侵滿洲，培養了身為基督徒的自由主義。

1931年黃彰輝考入台北高等學校，報考文哲科。1934年畢業，進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就讀，並確立了往神學發展。1937年畢業，然而在返台的船上卻因與弟弟黃明輝用台灣話交談，而使弟弟受到日籍教官處罰，雖然在黃彰輝道歉下平息，但也加深黃彰輝對自己台灣人意識受辱而「不甘願」，感到「在自己國度內也做次等國民」。同年前往英國。1938年8月，黃彰輝獲得滿雄才牧師(Rev. W. E. Montgomery，曾任台南神學院校長)推薦，獲得宣教會400英鎊補助赴英留學，在劍橋大學的西敏斯特學院(Westminster College)研讀神學3年，期間曾住在蘭大衛醫生家中。

1941年6月黃彰輝自西敏斯特學院畢業，9月獲南倫敦(South London)中會任命教師。然而隨著同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對英國宣戰後，拿日本護照的黃彰輝因此陷入失去行動自由，1941年12月10日，黃彰輝獲信函告知他成為「敵國的外國人」，最後在英格蘭長老教會協助之下，於1942年2月獲得通行許可證，解除其敵國人民行動限制。之後黃氏在英格蘭長老教會海宣會工作。7月於SOAS(亞非語言研習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學習中國官話，並且自1943年起開始在SOAS教授日本語與福建話。也在此時認識後來成為他妻子的Winifred Sounder(蘇慰爾)。

1945年日本投降，戰爭結束，黃彰輝也開始申請返台，卻因為英國仍處於復原期而無法成行。1946年，黃彰輝寫信給駐倫敦中華民國領事館請求中

華民國護照。於 1947 年返台。1948 年出任台南神學院院長，成為首任台灣人院長，1953 年並與黃武東牧師參與東海大學的籌設。

1949 年，黃牧師接掌台南神學院，他使大戰期間原被日本政府關閉而荒廢多年的台南神學院，在不出 20 年時間，就成為東南亞地區首屈一指的神學教育機構，並使當時在台灣的信義會、衛理公會、聖公會等三個教派將各自所屬的神學院併入台南神學院，同時擁有許多來自亞洲各地的留學生，且院內有來自上述三個宗派的神學家參與教學的工作，大家一起合作推展「教會合一」運動。

1957 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選出黃彰輝為議長，黃武東為總幹事。自 1950 年代末期起，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就開始以懷疑的眼光視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台灣人意識和情感」的重鎮，在這敏感的時刻，長老教會所歸屬的普世教協主張應該讓中國加入聯合國，確信只有當帶有強烈不可確定性的中國加入國際組織時，國際社會才有可能加以規範這個霸權國家，因此，長老教會遭受到國民黨政權前所未有的壓力，要求它在 1970 年退出普世教協。

1965 年黃彰輝辭去了台南神學院院長，並離開台灣到英格蘭，擔任總部位於倫敦的「世界神學教育基金會」總幹事。1972 年 3 月 19 日，他和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林宗義博士等人以共同發起人名義，邀請歐美各地代表 21 名，於美國發起台灣人民自決運動(Formosans for Self-Determination)，喚起台灣人的自覺意識，並聲援長老教會在台灣所發表的三個信仰聲明，獲得海外台灣人組織的支持，也因此進入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1980 年，他與彭明敏等海外知名人士組織、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為台灣拓展國際關係。直到 1987 年 7 月解嚴後才返台。1988 年 10 月，黃氏病逝於英國倫敦。

黃牧師是個相當有遠見的教育工作者，認為台灣需要有一所以基督教信仰建立的大學教育機構來栽培社會菁英、造福社會。因此，在他努力之下，爭取到「基督教大學聯合基金會」董事們的同意，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向該基金會提出申請在台灣設置基督教大學¹²，並且為了讓該校不是單屬於長老教

¹² 按，早在 1951 年 6 月，曾任燕京大學會計長的蔡一諤先生和魏德光博士(兩人後來都擔任東海創校董事)就向 UBCCC 爭取補助台灣高等教育。同年 9 月，東吳大學校友首先向該會爭取在台復校；金陵、燕京大學校友也建議以「聯合流亡大學」(a joint institution-in-exile)的名義在台復校。但 UBCCC 下設的「亞洲服務臨時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 on Services in Asia)在 1952 年 4 月初經過討論，維持一年前既定的立場：認為不宜支持以任何一所過去在大陸的教會大學名義在台設立「流亡大學」(a university in exile)。9 月 Dr. Charles Leber 美國聯合長老教會亞洲事務負責人訪問台灣，曾與黃彰輝談及在台灣創設基督教大學。而且，在美國聯合長老會代表(Dr. Charles

會所創辦，在董事會中僅派三名代表，其餘董事名額則由它宗派推出共同組成，這就是東海大學創辦的由來。

2. 陳明清牧師個人經歷

陳明清(1903-1964)牧師，1903年10月22日生於關仔嶺，從小就好學上進，從白河國小到長老教會中學(現今長榮中學)；之後負笈東瀛，再從高等學校(青山中學)到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畢業。學成居留日本一段時日，通過裁判官檢定考試，考取執業北海道判官，成為第一位台灣人(也是非日本人)在日本當判官之先例。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前數年(約1941年)，才回到台灣定居。這段學識之旅不只使他成為台灣早期的知識分子菁英，更重要的是，東瀛之旅形塑出陳明清的信仰、人格及知識分子的行事作風。這一些可從他對內村鑑三、矢內原忠雄等日人的嚮往中略窺一、二，可見教育形塑一個人人生觀的重要性。

律師、法官是陳明清先生的專業本行，但他的女兒陳美滿女士(宋泉盛牧師娘)在訪談的回憶中，屢屢感嘆父親的本行幾乎變成一種副業。到底是什麼樣的工作使他「本末倒置」？他如此安排人生工作的優先次序，不眠不休、執著奉獻工作為的又是什麼？無疑是做為一位知識分子對教育、社會、教會的熱忱，驅使他將這些本為「副業」的工作當成義不容辭的使命在做。

1951年起，因本身是台南開業律師，又是長榮中學校友，被選為長榮中學董事，進而受推舉擔任董事長要職，之後又連任三屆董事長(一屆3年)，直到1963年才卸下董事長一職。12年間為教育、社會、學校、教會等不辭辛勞，終積勞成疾，於隔年(1964年)撒手人寰，蒙主恩召，享年61歲。

陳長老是一位推動台灣基督教大專教育的先河。早在東海大學要在台灣尋求建立發展之初，陳長老與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等，代表台灣基督長

Leber)的堅持下，必須由台灣本地長老會主動提出申請，方可在台設校。結果，由台灣長老教會總幹事黃武東(後來擔任創校董事)特地於1953年5月由英赴美向UBCCC提案，建立一個「專為服務台灣居民且永遠根植台灣的教會大學」而得到首肯。當時，1949年前教育部長杭立武先生也曾提議教會大學在台復校(他出身金陵大學，早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後繼往美國深造，獲威斯康辛大學碩士。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美國援華會」會長，對教會大學特別關注)，雖然復校之議未被採納，但從1953年6月就應邀擔任還沒有「東海」校名的籌備會主任；1953年10月2日成立「東海大學董事會」(以下簡稱董事會)後，擔任董事長至1957年出任駐菲律賓大使為止。東海大學就是隨著芳衛廉博士多年的醞釀與台灣方面杭立武董事長、台南神學院黃彰輝院長、副院長彌迪理牧師(Rev. Harry Daniel Beeby)和台灣長老會蔡培火長老等創校董事的奔波協調，購地建校。

老教會參與籌設工作。當初某些大陸人士視台灣只不過是大陸的一個邊陲延續，東海在台灣的發展，自然成為大陸基督教大學的「復校」，而聯合董事會本身也毫無台灣本土經驗，但陳長老等教會人士心目中，卻有理想的基督教大學教育藍圖。因此東海的籌設，絕對不是大陸來台另起爐灶，也不是大陸邊陲的延續；他們視之為貨真價實的基督教大學教育之籌設，而且需具有台灣鄉土特色的風格。如此所述，絕非空穴來風，只要看陳長老擔任長榮中學董事長期間，在創校 70 周年(1885-1955)的一段講詞便可窺見端倪。他說：

將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本校以此為契機，要漸次進展為專科或學院、大學呢？或是仍然以一個中學的姿態維持原狀呢？這正是當 70 周年校慶之際有考究價值的問題……，本校 70 年間以一所中學對社會教育界曾做過相當的貢獻，然而光復後各地普遍設立中學，那麼在今天說來，我們中學的任務早已完成，此後本校更應自然發展為一專科或學院，來為國家、社會、教界貢獻，難道現在不正是良好時機嗎？但這必須是教會大會、學校當局、校友等引為己任的。我確信除此以外就沒有了一件可以作為 70 周年校慶紀念事業的事業了。

這段話適時地反映出陳長老對基督教大學教育之重要，並致力推動實現的睿見的人士之一。陳長老參與東海的籌備，之後也代表長老總會出任東海董事會董事，這正是他重視基督教大學教育的一項明證。可惜最終因以本土為主要的教育理念與其他主事者不合，以致退出董事會。想必這樣的結局多少帶給他壯志未酬的遺憾。

以上，大概可以勾勒出，在東海的創校初期的董事，台灣長老教會的人是就有：黃彰輝、黃武東、彌迪理、陳明清、蔡培火。

原來……台灣的先輩真正要創立的，是屬於台灣自己的教會大學，而不是為了中國淪陷而「復校」。

3. 彌迪理牧師個人經歷

彌迪理(Rev. Harry Daniel Beeby, 1920-2013)牧師，是一位塑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精神、貢獻神學教育的牧師，1920 年 8 月 24 日生，2013 年 3 月 18 日去世。彌迪理牧師夫婦，在台灣 22 年(1950-1972)。

彌牧師曾任台南神學院舊約教授與副院長。因倡議教會發表「國是聲明」而被限期離境，成為黑名單，長達 20 年之久。彌牧師回英國後，更積極協助台灣人權團體與國際特赦組織的聯絡。

彌牧師是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師，原本志願到印度，卻在 1946 年，受派到香港與澳門，1949 年被共產黨逐出澳門，在台灣找到新的宣教使命。黃彰輝牧師邀請他一起為復校後的台南神學院奮鬥，他們成為畢生的好友。

黃彰輝對台灣命運的關懷，對台灣人民與土地的熱愛，深深感染彌牧師，他開始認定自己也是台灣人，與黃彰輝牧師和其他同工一起奮鬥，為長老教會開創一個富先知眼光的時代。

彌牧師在台南神學院教授舊約，但他的影響力不只在課堂上。他那種瀟灑不羈的生活風格，先知般的銳利見解，感性理性兼具的鋒利言辭，影響學生甚廣。

1971 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彌牧師在台南神學院禮拜堂日復一日地帶領大家讀出埃及記，在台灣國難當頭時，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的命運，震撼了師生的心。有時摩西那要求釋放百姓得自由的聲音感動許多人；有時在曠野流浪的以色列百姓的抱怨佔了上風。在舒適生活的誘惑裡，在畏怯退縮與勇敢向前的拉扯間，追隨上帝旨意走向曠野的決心，逐漸顯明了。通過這個與上帝話語摔角的經驗，彌牧師參與並促成〈國是聲明〉發表，並將此聲明傳播至國際。

也因這個勇敢的行動，已在台灣安身立命的彌牧師夫婦遭國民黨政府取消簽證，1972 年被迫離台。台南牧師長老們與台南神學院師生們在太平境教會為他舉辦送行禮拜，唱著聖詩陪他走到火車站。他幽默而酸楚地說：「多謝今日大家來參加我的『出山』。」許多人在車站繼續唱歌，直到火車離站仍不斷揮別。

被迫離開台灣，曾經令他非常痛苦，他稱回到英國為「在英國流亡」。因為他已經覺得自己是台灣人了。他真誠而憤怒地向上帝提出抗議，但上帝已經為他預備了新的使命。Selly Oak 宣教學院是他人生另一個志業，在那裡他繼續培育宣教人才。

回英國後，他發現這個被稱為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已經在全球化裡變質，不但不能為福音服務，根本就是福音的敵人；他開始傾力以福音轉化歐洲文化。

1987 年海外黑名單解除後，彌牧師才得以返台訪問。王貞文有機會聽他老年時的演講，他以熱情有力的信仰告白，關懷台灣教會的發展與走向。1999 年，他還完成了宣教學著作《聖經與宣教》(Canon and Mission)，真的是一位熱力四射的人啊！晚年他忍受長期臥病之苦，如今終於得釋放，安然休息了。

台灣許多人關心他、懷念他，傳述著他的種種故事。就像上帝為以色列興起「列國」來的「義者」，在被迫害的危難日子裡保護了猶太人的生命，彌牧

師對於台灣來說，也是一位「義者」，一位為了台灣的自由付出代價的人。

4. 安慕理牧師個人經歷

在 1948 年，安慕理(1920 -2015)牧師夫婦(Rev. & Mrs. Boris Anderson)正是年輕的時候，從原本在中國福建的廈門古浪嶼改派到台灣來。1948 年的台南神學院才剛從戰後復校，百廢待舉。當時被要求擔任院長的黃彰輝牧師與安慕理牧師原本在英國就是好友，這也是黃牧師向英國差會申請安牧師來台協助神學教育的主要原因。

沒有想到當時的高雄中會，有如半途殺出來的程咬金，因為台灣南部教勢發展甚速，迫切需要宣教師協助，也因此，當高雄中會知道安牧師夫婦受派來台灣之後，就堅持要與台南神學院「均分」安牧師。就這樣，安牧師夫婦除了平時在台南神學院教書之外，禮拜六早上天未亮，就得從台南搭車前往屏東與恆春之間的教會去協助教會事工。

安牧師在台南神學院教新約，牧師娘則是一位詩人，除了教英文外，也同時教希臘文。在台南神學院時代，就曾有學生吳光明私底下要她教莎士比亞詩集。這次她送盧俊義牧師一本她在 1999 年所寫並出版的詩集—*Sad, Mad, Good, Bad*。安牧師吹橫笛，牧師娘則是彈得一手好鋼琴。夫妻兩人經常合奏，那種鏡頭看起來就會令人感到羨慕萬分。但除非是相當親密的友人，否則他們夫妻總是「真人不露相」。已經 80 歲的這對年老夫妻，在他們的社區裡，還繼續在「社區學苑」開希臘文的課，教喜歡古典文學的鄉親讀希臘文學作品。安牧師夫婦在宣教工作上 不但深受台灣教會的喜愛、肯定，也受到他的差會(英國長老教會)的重用。當他們還在台南神學院執教時，就已經發出聘書，要他們回去擔任海外宣教部的主任。

安牧師夫婦對台灣濃厚的愛，乃是他們為「美麗島事件」所做的救援工作。「美麗島事件」發生在 1979 年 12 月 10 日。當時所有媒體都說受傷的只有警察，民眾連一個也沒有，並且說除了林義雄等一票民主運動者被逮捕外，還要繼續逮捕至少 120 人。他們夫婦兩人隨即與「國際特赦組織」聯絡，並且給予更多的幫忙，就是分析該組織從各地發出來的有關台灣消息。安牧師並且從「聯合歸正教會」總會發函給所有與該會有建立關係的教會，請他們關心咱台灣長老教會所遇到的處境。「國際特赦組織」也得到一卷該事件發生時現場暗中錄下來的錄音帶。牧師娘就利用時間將該錄音帶轉譯成英文。後來這卷錄音帶的英文版也出書--*Taiwanese Voice, The Kaohsiung Incident.*」，出

版這本錄音記錄的是英國基督教協會。安牧師還被英國國家廣播電台邀請去說明「美麗島事件」發生時的台灣社會景況。這說明了幾點重要的意義：一是證明安牧師雖然已經離開台灣有了 15 年久，但對台灣的認識還相當清楚。再者：英國女王曾因為聽他在英國國家廣播電台(BBC)說明有關台灣事務後，邀請他們夫婦共同進餐，這說明了英國當局肯定他的論點是客觀的。三是安牧師夫婦雖然離開台灣那樣久了，可是並沒有忘情，用他在「聯合歸正教會」的職位，發函給所有相關教會，並且促成許多教會舉行「家庭日信徒聯合大聚會」時，設定該日為「關懷台灣前途以及為美麗島事件受難者」紀念日，不但關心那些被逮捕者，也關心著這些受難家庭生活的需要。就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當「國際特赦組織」還在思慮是否要將此事件列入關懷救援對象時，因安牧師夫婦的努力，在經過快兩個月後，該組織終於發出「緊急行動」(Urgent Action)紅色通知，世界各地關心台灣的人權組織傾全力展開救援行動，這是促成「美麗島事件」雖是軍法審判，但卻必須公開之下開庭的主要背景。可看出對安牧師夫婦台灣人民生命的愛，是在基督裡永遠無法切割的愛！

5. 魏德光牧師個人經歷

在中國出生，早年曾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宣教的魏德光(Rev. Arne Sovik，1918-2014)博士，2014年9月17日榮歸天家，享壽96歲。

魏德光牧師擔任世界路德教會聯合會的生命和事工的一個主要角色。他出生並成長於中國的挪威籍的美國傳教士，並一直努力使自己成為在中國的一個牧師和傳教士。

魏牧師誕生於河南信陽，在二次大戰期間，使多人流離失所的日本侵略戰爭中，他曾與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一個學生服務機構合而為一，並逃往中國西部。1947年中共接管中國大陸前，他離開大陸。自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後，他來台灣幫助建立了信義教會。他曾主持台北市杭州南路的救恩堂，成立教會並興建早期的教堂，還請先總統題寫救恩堂的匾額。後來任職「泛美信義會國外佈道部總幹事」。多年之後，他長時間擔任世界信義宗聯合國研究部的中國事工，他為當時著名的中國專家，不但能講中國話，又懂中文。退休後居住明尼蘇達州的雙城，並主編《光照神州》季刊，專門報導及鼓勵對中國文字工作的方面，直到86歲才辭去編輯職務。

魏牧師老而彌堅，90歲高齡還自己開車到美加各地訪問，2014年6月他曾寫信給好友殷穎牧師說，原本想開車去加拿大的大峽谷公園，但因健康不

佳而半途折返，當時心悟：「最後的旅行怕要通過大河到新耶路撒冷，我們應會在羔羊寶座前晤面了。」不料一語成讖，3 個月後便真的安息歸回天家。他享壽 96 歲，誕生於河南信陽，應為最後一位離世的在中國出生的宣教士。

6. 黃武東牧師個人經歷

黃武東牧師(1909-1994)，出生在台南州東石郡義竹庄東後寮(現嘉義縣義竹鄉東光村)。生父姓李，生母黃頭(Thyio)。7 日後受同庄的書香世家黃礪抱去養育，接黃後嗣。黃武東出生翌年(1910 年)，日本完成其第一期第二波帝國主義，併吞朝鮮。

1926 年黃牧師從長榮中學畢業後，進入台南神學校(現台南神學院)。在學中，因為對二位老師無禮，受停學 1 學期處罰。在學時期，1928 年謝雪紅在上海組織「台灣共產黨」，而後共產黨在台灣興盛。1929 年東京帝國大學的矢內原忠雄(Yanaibara, Tadao)出版《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批評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政策。1930 年 3 月 19 日，他由台南神學院畢業，同年 3 月 21 日與同由女子神學校畢業的林蘭玉小姐結婚，由校長滿雄才(W. E. Montgomery) 牧師證婚。結婚證書是對抗當時的「國語」，由台語羅馬字寫的。同月底，被派去澎湖瓦碇教會，擔任傳道師二年。同年 10 月，台灣山地對日本最後的武力抵抗--霧社事件發生。

到 1931 年，日本致力經營剝削其二個殖民地：台灣、朝鮮。黃牧師在此種時空中成長。1936 年，皇民化運動相當興旺之時，教會向福建邀請大眾佈道家宋尚節，以台語通譯方式，在台北、台中及台南舉行大型長期轟動台灣的佈道大會。黃武東傳道師也帶斗六的會友，專程來參加佈道大會。同年 8 月，日本當局強迫接收加拿大長老教會所設立的淡水中學及女學院。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向聯軍宣戰。此時日本進入第二期第三波帝國主義。1943 年日本當局強迫長老教會傳教者以神道禮儀方式洗腦：「全台灣基督教傳教師成會」。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現人神」昭和天皇向聯軍宣布投降。因此，在 1944 年 4 月 29 日被迫成立的「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亦自然消失。1947 年 2 月 27-28 日，「新時代」的來臨，不一定是好的字眼。1950 年 1 月他受選做第 10 屆南部大會議長，同年 4 月 13 日就任第一任南大總幹事。對此時起，黃牧師越來越有機會發揮上帝給他的特別恩賜(charisma)：洞察力、組織力、神學上是非的判斷力、應變力、講笑話的文雅是出類拔萃的。

1951 年 3 月 7 日由黃牧師所發起的南北兩大會組織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總會」成立，同時被選做第一屆議長。同年 8 月到英國留學 2 年。在留英期間，同年 9 月 12 日，由黃牧師所推進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受接納加入世界改革宗聯盟(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9 月 14 日，也接納入「普世教會聯盟」(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此時起，台灣教會得以進出國際舞台了。

1953 年他由英國回台後，就參與東海大學創校籌備工作。1954 年開始發起基督教台灣宣教百週年紀念「教會倍加運動」(PKU)，並為此運動發表一篇名論文〈台灣宣教〉(4 萬字)。1955 年他的名著《台灣慣俗與民間傳說》，由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1957 年 2 月，他被選為第一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他是一位少見的會透視將來的「政務官」型的教會及社會的領導人才。

1965 年 6 月由黃牧師所領導的 PKU，在長榮中學大操揚舉行「宣教百週年」大典時，果然獻出所倍加的教會與所倍加的信徒給上帝。1966 年 4 月 PKU 後，由服務 36 年的長老教會退休。7 月，往菲律賓牧會福建話的教會半年。1967 年到 1972 年，任台灣基督教福利會主任。

1973 年 3 月響應故鄉長老教會的〈國是聲明〉，在海外與林宗義教授、黃彰輝牧師等發起「台灣人民自決運動」。1985 年《黃武東回憶錄》由洛杉磯台灣出版社出版。1987 年他與黃彰輝牧師同儕，接受母校台南神學院榮譽神學博士之學位。1990 年《黃武東回憶錄》台灣版，由前衛出版社出版，1990 年第三版。

1994 年 9 月由紐約回台定居，11 月 13 日在安眠中，受主召回。

7. 明有德牧師個人經歷

明有德(Rev. Hugh MacMillan, M.A., Ph.D., 1892-1970)牧師，是加拿大長老教會派來台灣的宣教師，於 1892 年 7 月 24 日出生在溫塔里奧省的布魯士縣。父親約翰及母親瑪莉共同經營小農場，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也熱心服事教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軍隊服務時感受到主恩的呼召，並決心以自己的一生來回應，這也符合在戰前已過世的母親(1913 年)之心願與期待。

明牧師在 1921 年得到多倫多大學的文學士學位，1924 年完成諾克斯學院(Knox College)的神學士學位，1932 年利用回國休假期間，完成多倫多大學的文學碩士學位，更於二次大戰後的 1948 年，得到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的博士學位，可以說是來台宣教師當中學歷最高，也最「好學不倦」的一位。

對台灣教會的貢獻如下：

1924 年 8 月 2 日他與牧師娘道安女士(Donalda MacIntosh)結婚，不久就

於同年 10 月 27 日來到台灣宣教。來台之前，明牧師曾在農場工作，也擔任過小學與農校教員、多倫多大學幹事(1919-1921)、加拿大基督教青年會學生幹事、學生志願海外宣教運動(SVM)及學生基督教徒運動(SCM)的總幹事(1922- 1924)，另也曾利用暑期到過 7 個偏遠地區從事學生宣教工作。

明牧師是具有多方面恩賜的人，在台灣參與過的事工，包括神學教育、中學教育、總會事工、青年事工、醫療傳道等，並實際擔任過台灣神學院院長(1927-1931)、淡水中學校長(1935-1936)、台北聖經書院院長(1953-1955)、總會助理總幹事(1957- 1958)、馬偕醫院董事長(1956-1959)、基督教青年會副理事長(1951-1959)、聖詩委員會委員等職務。他也是歷史家，寫了有關吳威廉牧師的「Builder Abroad, William Gauld of Formosa」，關於青年事工的「Youth in a Younger Church」，以及對台灣宣教之百週年歷史做回顧的「Then Till Now in Formosa」(10 年後增補為「First Century in Formosa」)。明牧師娘道安女士曾任多倫多綜合醫院的護士，來台後也致力於馬偕醫院的醫療宣教工作及女宣道會的事工，後來更參與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的創設，也曾任教於台灣神學院和淡水中學。他們夫婦對台灣教會可以說貢獻良多。明牧師夫婦於 1962 年退休，返回加拿大，但一直繼續關心台灣的宣教工作。

明牧師抵達台灣時(1924)，正逢北部長老教會的重要關鍵時刻：吳威廉牧師剛在前一年(1923)去世，教會頓失重心，而北部教會也即將在隨後的 1 年(1925)中，面臨因為加拿大母會分裂所帶來的重大危機。就北部教會半世紀以來的宣教歷史而言，這也是繼馬偕牧師的開拓時期(1872-1901)及吳威廉牧師的組織時期(1901-1923)之後，另一個「世代交替」的關鍵時刻。就在這時候，兩個與「聯合」有關的運動深深影響了北部的教會。一方面，就與母會的關係而言，加拿大長老教會為了是否與衛理會及公理會聯合一事而分裂為「加拿大聯合教會」及「加拿大長老教會」。而就在大多數的北部教會宣教師都贊成聯合的趨勢下(當時在北部的 25 位宣教士中，只有偕叡廉夫婦反對聯合，同樣地，散布在全世界各地的 655 位加拿大宣教師中，只有 17 位反對聯合)，台灣北部卻在 1926 年 9 月，被裁定歸屬為加拿大長老教會的宣教區。在這種情形下，當時已經表明要隸屬聯合教會的 20 餘位宣教士中，只有明牧師夫婦及戴仁壽醫生夫婦(Dr. George Gushue Taylor)願意留在北部服務。另一方面，就與南部長老教會的關係而言，自從 1914 年的第三回台灣大會議決要推動「南北神學院之聯合」以後，台北神學校的劉忠堅牧師(Rev. Duncan MacLeod)就積極推動這項工作，並於 1925 年親率師生前往台南神學院，聯合上課兩年。可惜

雙方最終無法達成共識，「聯合神學院」於 1927 年宣告成立無望，加上劉牧師轉往南部服務，1927 年重新開辦的「台北神學校」就由明牧師擔任首任校長。

就在上述充滿危機困境的時刻，明牧師擔負起北部教會的領導重任。他所完成的工作，證明他不但是理想的接班者，更是新時代的開創者。這個新時代的精神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北部教會在 1930 年代所產生的「新人運動」，而明牧師毫無疑問地是這個運動的主要指導者。面對傳道局的專權獨裁，他推動「教師」的自由考試制度，以取代原本的推薦制度，為要鼓勵年輕的傳道師盡力成為獨立教會的牧師。他也在 1932 年 7 月和孫雅各牧師(Rev. James Dickson)合作，提倡組織「台灣北部基督長老教會長執聯誼會」，以鼓舞教會的經濟獨立和聘牧，為要實際達成教會的自養、自傳和自治。1936 年起，以明牧師為部長所推動的「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3 年運動」，也延續了這種精神。總之，這個新精神雖遭遇到反對與抵抗，但它卻成為當時北部教會最強大的信仰動力。

明牧師來台灣後，積極進行聖經研究、青年運動、普世思想的推動。從他還在學習台灣話的階段起，就開始推動聖經研究的運動，對象包括中學生、醫學生、傳教者及社會人士等。他使用 Moffatt 博士所翻譯的現代英文聖經，並以討論的方式來進行聖經研究，這在當時是創新之舉，所以引起不小的注目與爭議。但是誠如吳清鎰牧師所言，明牧師忍受困難，持續這樣的工作，好像看著遙遠的目標默默活動，最終卻成為使台灣教會進入新時代的一個原動力。此外，他也開始關心青年學生的傳道工作，創設青年聯合靈修會(暑期學校)於淡水、草山、圓山等地，在不分南北界限的努力下，組織台灣基督教學生青年會，使南北學生同聚一堂。

他自己將青年事工的歷史分為四個階段：一、最初的半世紀(1865-1915)是年輕的宣教師和年輕的本地信徒共同建立教會的時期；二、第一次世界大戰起的 10 年間(1915-1925)在台灣的台北與台南，以及日本的東京與京都都有台灣青年的組織開始形成；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 10 年間則是全島性「基督徒聯盟」(Christian League)的時期，許多由日本留學歸來的年輕醫學生與神學生開始要求，以新的思想及做法來參與並貢獻於教會的事工，由 1932 年 7 月在台南太平境教會舉行的夏令會開始，一連串的青年聚會分別在各地舉行召開，會場中充滿了普世合一運動的信息及精神，一直到 1940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才迫使他們停止活動；四、二次世界大戰後是青年事工的新階段，1948 年夏天在淡水舉行了戰後的首次靈修會，約有 1,300 人參加，從此青年學生成為台灣教會的寶貴資源，不但在次年的 5 月催生了不分南北的「台灣教會青

年團契」(簡 TKC)，更間接以合一的精神，促成了 1951 年總會成立。

明牧師利用各種可能的場合，盡力教導當時在全世界教會間，已經形成普遍氣候的普世合一思想(ecumenical thinking)，這種結合聖經研究與合一思想的運動在青年學生中激起了極大的迴響。明牧師應該是日據末期及戰後初期，台灣教會推動青年事工及教會內宗教教育的中心人物，他也極力關心年輕傳教者的研究與進修，除了在神學院及聖經書院從事神學教育工作外，他在各地開設傳教者的查經班，也推動並指導每年一次的傳教師靈修會。戰後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更是在他協助與指導下建立起來的。他所提倡的聖經研究運動，不禁也讓我們想起台灣教會在 1970 年代初期起，通過大專學生工作所推動的「聖經神學研究班」。

明牧師在台灣總共服務 38 年，充滿熱誠與幹勁，能說流利的台語與日語，因此在各種緊急的情勢中都能發揮所長。當然，他的人生也有原則不明之處，譬如他原本贊成並認同加拿大聯合教會，但他卻從未正式加入該教會，且在 1964 年返回加拿大後，更受選為長老教會的總會議長。又如他待人雖然誠懇親切，在行事之間卻又帶著深厚的「英國味」。不過，最令人感受深刻的是，他的一生雖處在各種「聯合」與「分裂」的情境中，但他卻以年輕的心和開放的態度，將普世合一的精神帶入台灣教會的現實文化中，的確是一個開創新時代的普世主義者。但願這種精神也能成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不斷自我更新與改革的原動力！

8. 高天成醫師個人經歷

高天成(1904-1964)的祖父高長，在英國的長老教會派馬雅各來台行醫傳教時，當他的助手，後來不僅領洗信教，還成為第一位台灣人傳教士，為長老教會開拓許多教會的版圖。高長共有 5 個兒子，長子高金聲是位牧師，即高天成的父親，原為同宗之子高長將他領養。高金聲的 6 個兒子，除 5 子早歿外，大兒子高天成和其餘 4 個兒子都是醫生。

高天成醫師，1904 年 12 月 12 日出生於臺南。出身在長老教會家庭。在 12 歲時他負笈同志社中學就讀，後升入名古屋第八高等中學，中學時獲其叔高再得醫師贊助，留學日本。1928 年(昭和 3 年)畢業於東京帝大醫學部。1930 與林獻堂之女林關關結婚。婚後曾在台南鹽水短暫行醫 2 年，由於這個機會，使得高天成接觸到濱海地區居民最常發生的疾病--「烏腳病」而開始關心此項病例。再赴東大母校研究，出任帝大附屬醫院鹽田外科及黴菌學教室副手，

其後轉入都築外科。1938年(昭和13年)獲得東京帝國大學的醫學(細菌學)博士，為外科醫生之翹楚。同年被派往中國南京任同仁會南京醫院外科主任兼院長，之後再回到日本擔任東京醫院外科醫務長。戰後滯日，擔任東京旅日同鄉會第一屆會長。

1948年回臺後，擔任臺大醫學院教授兼外科主任。1953年起擔任臺大醫院院長，是落實外科「本土化」的醫學先驅者。1964年8月13日過世。

事實上，光復後返台主持台大醫院外科，擔任台灣大學醫學院教授，也是台灣第一位的醫學博士杜聰明(大正11年，即1922年，得京都帝大的醫學博士，曾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台大醫院院長，台大醫學院院長，高雄醫學院院長)讚譽他為「台灣外科醫學之父」。而年歲長他好幾十歲的杜聰明，其實和高天成是有姻親關係的。他們兩人都是霧峰林家的女婿，高是「頂厝」林獻堂的女婿，杜是「下厝」林仲衡的女婿(頂、下之分，係依所居的祖厝地勢高低作分別，「下厝」為長房，「頂厝」為二房)。而林獻堂是林仲衡的堂叔，在「論輩不論歲」的台灣習俗上，高天成即是杜聰明的姨丈了。

高天成的叔叔們非神職人員即醫師，堂弟們也是如此，堂妹們則多往音樂方面發展。如曾經短暫在同中就讀的高俊傑醫師，著名的高俊明牧師，還有音樂界的名家高錦花、高慈美、高雅美等人。家庭信奉基督教，使得他們家族開化較早，得以認識更寬廣的世界，找尋更多的機會，更好的發展，活躍在台灣的其他大家族，也有類似的情況。

高醫師擔任過同志社校友會的第一任會長，在母校的柔道隊一行17人來台灣(1960)巡迴訪問的兩個月期間，與林金殿及校友們鼎力參贊。這些身強力壯的選手歸國之前，為了表示台灣校友熱情招待的謝意，圍繞一起唱完校歌之後，並將高醫師和林金殿的身體抬起來繞場，校友融合的情感交流，以及此行訪問的圓滿成功由此可見。

1964年高醫師死於肺心症，享年61歲。據台灣新聞界耆碩葉榮鐘(日本中央大學畢業)在《台灣人物群像》一書中所述：「高天成為人謙抑隨和，生前在臺大醫院受到全體員工上下一致的愛戴，稱他為『好先生』，贏得了他們的眼淚……」，去逝後還捐出了他自己的大體，供台大醫院做病理解剖研究。在基督教牧師家庭長大的他，會成為真正的「人格者」，豈不是真有這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嗎。

9. 林宗義長老個人經歷

林宗義(Tsung-yi Lin, 1920-2010)醫生，他是首位獲得醫學博士(M. D., Ph. D.)，也是台灣腦神經精神醫學的先鋒和奠基人。

1920年9月19日出生於台南。台北高等學校獲得業士(1939)，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士(1943)、東京大學醫學博士(1953)。其父林茂生(Mo-seng Lin)，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的1947年3月11日，被國民黨特務帶走殺害；母王采馨(Chai-Hwang Wang)。兄林宗正醫學士，妹林詠梅。與林李美貞(Mei-chen Lin)女士結婚多年，有5個子女，11個孫子，1個曾孫。全家都是長老會基督徒。

林長老的父親林茂生博士，是日治時代第一個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台灣人，是台灣史上第一位哲學博士和史上第一位留美博士。他自小受到父親融合東西方文化的身教與言教，擁有跨越海島走向人類世界的國際視野，在他一輩子充滿艱辛坎坷又富傳奇創造的生涯當中，他永遠記得他的父親在他要出國深造時送他的一首詩：「桃源在何許，西峰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就是靠著這樣追尋理想桃花源，孤軍奮戰開拓冒險的精神，林長老在二次大戰後(1946)成為第一位從日本東京大學返回台灣，擔任台大第一位精神科主任的精神醫學開拓者，當時的台灣飽受戰火摧殘，可說是一片廢墟，即使台大醫學院和醫院也是幾乎一無所有，百廢待舉。但是林長老並沒有被一無所有、萬事起頭難的處境所嚇跑，相反的，在台灣精神醫學的黎明階段，他秉持「不靠範本」的精神，勇敢地開拓他的事業。

然而不幸的遭遇和打擊，等著正要起步建立台灣精神醫學的林長老，由於戰後的台灣社會，歷經國民政府統治初期的經濟破敗、失業大增、物價飛漲、政治貪腐、軍紀散亂、法紀蕩然、用人不公、特權橫行……，在1947年台灣人民對陳儀政權失望和憤怒，引爆了台灣近代史上最淒慘的228事件。事件發生後，國民政府在蔣介石派軍來台鎮壓後，大舉逮捕社會領導菁英。林長老的父親林茂生博士當時擔任台大文學院院長，也被軍警逮捕後遇害失蹤，這樣的打擊和挫折，對當時的林長老是多麼沉重和無法接受。

林長老就是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中，忍受內外煎熬，舉步維艱地，展開他一步一腳印的台灣「精神學之路」。他創立了台灣精神醫學教育的模式，也展開了聞名世界的台灣精神疾病的社區調查研究，訓練精神醫療相關的專業團隊人力，重視學校和社區心理衛生工作。

很幸運的是，在戰後台灣還未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美國也提供許多獎學

金鼓勵台灣優秀人才赴美留學，1950年，林長老是首位台灣精神科醫師獲得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的機會，除了東方文化，又增加了西方文化的洗禮，回台後，他又讓台大更多精神科同仁有計畫的赴美，培養更多不同領域的精神醫療人才；1955年他又被 W.H.O. 聘為精神衛生部門的研究主任，負起國際精神醫學研究的指導角色，甚至後來在 1974 年擔任了世界心理衛生聯盟的主席。他可以說是從廢墟台灣建立起精神醫學領域的開拓者，更是台灣人精神科醫師走上世界舞台大放異采的第一人。

當讀林長老《精神醫學之路》--橫跨東西文化之後，就可以感受到他博學多聞和豐富人生經歷，他從一個台灣人接受日本教育，再接觸中華文化，深受痛苦折磨，再學習歐美文化，活躍於國際精神醫學界，對人類的健康和世界心理衛生做出重大貢獻，他對故鄉台灣的精神醫學留下的影響和基礎，迄今仍在。

當林長老跑遍全球服務人類而退休之後，他沒有忘懷自己的祖國台灣，更沒有忘記他的父親林茂生的犧牲和 228 事件的善後處理。他在 1989 年回到台灣，在 3 年之中面會許多受難家屬，最後在 1991 年要求李登輝總統接見家屬，並提出政府和民間共同面對 228 事件的五項具體目標：

第一、228 事件官方報告出爐。

第二、紀念碑與紀念博物館的設置。

第三、對倖存受難者及其家屬公開道歉並賠償。

第四、將每年的 2 月 28 日定為和平紀念日。

第五、設置 228 紀念基金會，重建因 228 遭破壞的台灣文化與教育。

最後李登輝總統同意好好解決 228 事件的善後問題，家屬所提的五項目標也逐一實現。今日雖然台灣社會仍有許多問題存在，但是林長老生前堅持台灣人的尊嚴和自決，追求台灣精神醫療在國際學術上的獨立地位，始終奮鬥不懈，贏得國際友人的敬佩和肯定。如今林長老已經安息主懷，但他留下的風範和精神，將令所有台灣的後輩追思和懷念。

開創台灣精神醫療領域的先驅者林長老，2010 年 7 月 20 日逝世於加拿大溫哥華，並於 7 月 29 日舉行追思禮拜。

肆、籌設東海大學重要大事紀

1950 年，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教育界與熱心教育的教會人士，基於事實需要，紛紛向美國成立於 1931 年，負責襄助過去曾在中國大陸成立的 13 所基督教大學的美國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建議，希望一本過去培植中國青年的精神，在中華民國的臺灣省創辦一所理想的大學，藉以延續基督教在華的教育事業，以及繼承淪陷於中國大陸的 13 所教會大學的優良傳統。

1951 年間，紐約聯合董事會若干人士前來臺灣訪問，時任農復會主任委員的蔣夢麟(1886-1964)博士(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乃在農復會設茶會款待聯合董事會來訪人士，並介紹我國從事教育及教會工作者約 120 人與彼等歡敘。與會人士咸以教會過去在大陸先後設立之 13 所大學，聲譽卓著，目前臺灣政治安定，聯合董事會似應乘機創辦一所新的教會大學，以為大陸 13 所教會大學的延續。來訪的聯合董事會人士對此提議深感興趣，允於返美後提出討論，其結果難能如願。

1952 年 2 月，聯合董事會執行秘書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專誠來台，與我國教育及宗教界的基督長老教會領袖討論設校條件。4 月 2 日，芳衛廉博士向聯合董事會提出「我所欲見設於臺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錄」(Memorandum to the Trustees on the Kind of Christian College I would like to see on Formosa)，建議聯合董事會對於在臺灣設立基督教大學的構想予以支持。他認為這所大學並不是大陸任何一所教會大學的翻版。他說：「這是一個新的開始，我們有機會去創立一個不同形態的大學。」所謂不同的形態，這份備忘錄詳列了 14 點說明，包括：這所大學應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它不是製造白領階級的大學；學生對其生活的環境應有不斷的自覺，以避免陷入象牙塔，流為士大夫；這所大學要有民主觀念的實際表現；學生要生活在思想的氣氛中；課程不是為了技術性的職業，而應著眼於各種範圍；避免嚴格的分科，選擇有限的、但相關的科系；純樸而不虛飾的校舍；它是小型的大學，學生人數不超過五百至六百人；師生全體住校，教職員必需專職，並提供較佳的生活條件，而且應該是基督徒；注重國際性及國際文化的交流，但並不失民族性及中國的特殊需要；與教會保持關聯，但不必由教會加以導引；不在狹隘的領域內為教會服務，但要支持並強化教會。

這份備忘錄最後以「這些，或任何其他說明，只有在成爲臺灣個人或團體的想法的一部分時，才具有意義」一語作爲結論。

聯合董事會的反應極爲熱烈而且深表贊成，初步決定在臺灣設校。同時，根據芳衛廉博士的「備忘錄」，擬訂了「計畫中的基督教大學之方針與目的說明」。該「說明書」表示：「因爲選擇基督作爲信仰，所以我們對於教育性質的看法，就有了極大的不同。在我們看來，宇宙及其一切，都屬於上帝。沒有祂，我們的生命及我們所生活的世界，都不能得到正確的了解。不接受祂，對真理的追求也將受到阻礙。我們相信基督教的信仰是道德勇氣的唯一力量。讓我們去創造最高尚的教育理想，啓示我們去達到目標，建立真正的探討自由，並能在各種壓力下保持這種自由。本著這些信心，我們希望創辦一所寄託於耶穌是真理的大學。更具體地說，這意指著教職員及一部分的學生必需是基督徒，課程中要有基督教的教育和活動，但這並不意指教師的講臺是宣教的場所。在課堂上，使徒馬可，或馬克斯、約翰·杜威、托瑪斯·阿奎那斯都應一視同仁，都要受到客觀的質疑和批評。但我們要明瞭，沒有確切的事物，質疑是不可能的。沒有可接受的標準，批評是毫無價值的。我們的確切的事物和標準就是基督教的信仰。這所大學並不是過去大陸 13 所教會大學的翻版，因此它需要有不同的特質。」

芳衛廉博士於 1953 年 6 月再度來臺，與有關人士擬訂實際的發展計畫。彼此一致同意，創辦一所學校，「不能倉促集合教員學生就算了事，應予審慎計畫，俾使新創之學校，既非爲過去基督教會大學之翻版，亦非平淡的維持現有情況，而必須是有創造性的，並能展望美好的未來。」同年 10 月，聯合董事會致函當時教育部程天放部長，申言此一計畫中的大學將「永遠屬於臺灣的教育資產」，函中並表示：

吾人亦欣然一致認爲：計畫中的大學不應依照昔日的模型，而應建立自己的模型，以獨特而適當的方式爲臺灣的需要服務，……。吾人相信此一大學並非應有盡有，而應選擇其特殊的範圍，並特別注重依照當地的需要，以及創辦此教會大學的特殊目的。

無庸贅言，吾人所構思者爲一所中國的大學：取得政府的認可，校長爲中國人，大部分的教職員亦爲中國人。吾人希望諸位董事及行政部門能保持一種國際性，本會與各宣教會將同心協力以促其實現。

吾人無意設立一大型的大學：反之，它是一小型的大學，而以高度之學術水準及其所注重之特質著稱。

對以上各項原則，程天放部長覆函表示同意。但如所週知，該時期由於政府遷臺未久，百廢待舉，各項政策有待重新釐訂者正多。因此，新設大專學校及擬在臺復校，一律均從緩議。

1953 年 10 月，剛好美國基督教聯合長老教會的代表李伯博士(Dr. Charles Tudor Leber, 1898–1959)¹³也來到台灣台北，與台灣長老教會南、北分會領袖會談、瞭解與關心。因此 1953 年，歷經基督長老教會牧師、美國負責美援機構的亞洲基督教聯合董事會與中央政府有關人士大力奔走，洽商協調，終獲政府批准創設此一新而富有理想的大學。

一、黃武東牧師的貢獻

1. 參加美國兩個董事會

1953 年 5 月，黃武東牧師倉促離英赴美，首先參加「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UBCCC)」¹⁴。同月，再參加「南京金陵神學院基金董事會」(Nanking Board of Founders)。談到參加這兩個基金會的原因，就要提到私立東海大學創校的經緯。

原來美國各教會在中國大陸所建設的 13 所基督教大學，已遭到了中國大陸染色收編，負責這些基督教大學資金籌措及其他事宜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迫於時勢，乃將資金凍結。時任臺南神學院院長的黃彰輝牧師眼見這些資金無法利用，即興起與聯董會磋商在臺灣設立基督教大學之議，並曾多次向董事長范杜森(Dr. Van Dusen, Henry Pitney, 1897-1975)¹⁴及總幹事芳

¹³ 李伯博士出生於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他進入了巴爾的摩城市學院求學，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完成學士學位。而後他獲得了他在普林斯頓神學院學習下 J. 羅斯史蒂文斯神學博士。他出任第一次在新澤西特倫頓，並在 1923 年被任命為在巴爾的摩長老會教堂部長。同一年他也娶他的妻子 nee Eloise Heath。不久之後於 1924 年他們協調搬回巴爾的摩，成為森林公園長老教會的牧師。1936 年，他被稱為外國使團長老會董事會，為日本、韓國、菲律賓和泰國擔任秘書。之後 1952 年他開始服務於美國外交委員會，他擔任作為外交使團委員會的長老會教堂的總書記。在他任職期間與外國使團的董事會。在他任職期間與他的外國使團委員會進行全球三次參觀許多在歐洲、非洲、亞洲以及北、中部和南美洲國家。

¹⁴ 他出生於 1897 年，費城的律師 George P. Van Dusen 與 Katherine J. Pitney 的兒子。他原本打算跟隨父親成為律師，但是在普林斯頓作為一個大學生，他變成深度介入青年會(YMCA)和學生教會活動，在那裡他獲得了他的文學士學位。在 1919 年後，在 1924 年從紐約協和神學院接受他的神學學位，他克服了挑戰，他的協調由長老大會保守的司法委員會時，他也不肯定的處女生育文字的信念。於 1926 年他加入了紐

衛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談論此事。

到了美國聯董會開會時，遭到聯合長老教會的代表李伯博士(Dr. Charles Tudor Leber, 1898-1959)極力反對。他主張：「除非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主動來申請外，不應由本董事會自動在臺建校」，此建議獲董事會通過。

黃彰輝牧師努力不懈，乃在總會中推動此事，於是在第二屆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中作成如下的決議：

第七十七條：議決准黃武東做代表去赴在美國五月中要開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

第七十八條：議決用下記之決議文向基督教大學聯董會表示臺灣總會對於在台灣建設大學的關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有絕大的關心與歡迎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所計劃將建設大學於臺灣之事，同時總會願表示絕大的協力來幫忙到這個目的達成。」

第七十九條：准黃武東牧師出席五月中要在美國召開的南京金陵神學院基金董事會，以便向他們請安，並商量有關南、北兩神學院的幫忙事宜。

根據這個決議，黃武東牧師在英國的進修結束後，即於 1953 年 5 月 19 日，搭船抵紐約，蒙美國聯合長老教會的代表 Mr. Comb 到碼頭迎接，並帶黃牧師到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 Guest House 下榻，旋趕赴參加美國聯董會(UBCCC)。

在會議中，黃武東牧師代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向聯董會(UBCCC)提出前述第二屆總會第七十七及第七十八條決議，經討論後獲得聯董會(UBCCC)接受，並議決在臺設校，且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為 Co-Founder。

那次會中黃武東牧師記憶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初見到 Dr. Van Dusen，在談話中他告訴黃武東牧師說：「我在遠東見到一位很聰明的人。」這個人就是黃彰輝牧師。

參加這兩次會議，以及這一趟的美國之行中，結識許多美國的教會領袖，也是黃牧師此行的一大收穫。

會後，聯董會(UBCCC)並邀請黃牧師至肯塔基州參觀一所平民大學(Folk school)。這所學校設在山區(Berea)，創校目的在提供住在山區、沒有機會進

約協和神學院的教職員，只留下足夠長的時間，於 1932 年讓他從愛丁堡大學獲得神學的博士學位，在 1945 年他被任命為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校長，並服務直到他於 1963 年退休。

入大學者深造的機會。蓋當時聯董會(UBCCC)已同意在臺設立大學，但原先目的亦是要模仿這所學校，意欲提供臺灣人之中有類似情況者就學。主張「通才教育」、「重質不重量」，因此才派黃武東牧師到這個偏遠學校參觀，沒想到當初苦心以基督教的精神籌設的東海大學，演變至今，其當初創設的宗旨已喪失殆盡。

2. 參加美國聯合長老教會總會

1953年5月27日，赴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斯市，參加美國聯合長老教會總會年會，代表臺灣教會在會中致詞。

這屆總會議長是普林斯頓神學院院長 Dr. John Alexander Mackay(1889 - 1983)。他們兩位已在西德 Willingen 開會的時候見過面。那次會中最受矚目的是韓國代表，因為韓戰剛結束，自北韓湧去不少難民。

爲了協助處理難民問題，美國聯合長老教會議決贈送一筆鉅款(確實數目黃牧師已忘了)，應達百萬元以上。

3. 訪問加拿大，參加加拿大長老教會總會

1953年6月2日，黃武東牧師由這個雙城的聖保羅機場搭機至加拿大多倫多。當天正逢英國女皇伊利莎白二世戴冠的佳辰，又是英國登山隊，亦即人類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成功的好日子，當時機上的旅客也沾染這些喜氣，享受了一頓難忘的「戴冠盛宴」(Coronation Dinner)。

黃武東牧師抵多倫多，主要是要訪問加拿大母會及爲參加6月間在那兒召開的加拿大長老教會總會，並代表臺灣總會在會中致詞請安。

會期中有一個晚上稱謂「海外宣道會之夜」(Overseas Mission Eve)，黃武東牧師在會中應邀爲特別講員，講加拿大在臺灣宣教的成果，及臺灣宣教的機會，受到很大的喝采。在臺灣宣教42年的劉忠堅牧師(Rev. Dr. Duncan Macleod, 1872-1957)，帶著在台灣出生的千金劉路得小姐(Miss Ruth Macleod)，時正在加拿大渡假中也前去聽演講，講畢他非常高興，特別跑來告訴黃牧師說，他感動得忍不住流淚，許多聽衆亦來與黃牧師握手道賀。

第二天一大早，劉牧師打電話給黃牧師，說當地的報紙登載了黃牧師的演說，他認爲如此可以讓更多的加拿大人了解海外宣道的情形及必要性，是非常好的事。黃牧師找來報紙一看，心中卻大感不快。

原來黃武東牧師一看到標題，竟說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怕中共到臺灣。黃武東牧師再看內容，倒無什麼出入，只是標題太爲敏感，使黃武東

牧師這長住臺灣的人，一看便覺不妙。黃武東牧師乃打電話予加拿大海外宣道會總幹事約翰遜博士(Dr. Deane L. Johnson, MD)告以此事，約翰遜博士認為這事無所謂，他說，這不過是報社編輯喜歡引起讀者注意的做法而已，勸黃武東牧師不必多慮。

其實黃武東牧師那晚的演講，只是引用美國聖公會主教 Bishop Stephen Niel，戰後訪問東南亞後，在他所著的《Across Asia》書中所說的一句話：「我想在今日的世界上，宣教的機會，沒有一個地方比臺灣更好。」黃武東牧師說，不但是他，凡走遍過世界的人都有同感。戰後的臺灣的確有很好的宣教機會，這一方面是因為人民的心理上有歡迎歐美事物的趨向，另一方面是國家領袖及許多有識人士是基督徒之故。無論是一般社會、政府的機關，甚至軍隊裡，傳教者都能自由傳道，而且受到歡迎。

黃武東牧師引用《約翰福音》第九章第四節耶穌的話：

趁著白日，我們要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

黃武東牧師說，現在大陸已遭染色，宣教師多數撤離。臺灣和大陸僅咫尺之隔，沒有人知道中共何時來犯，因此，我們要趁著白日加緊作工，這有賴加拿大母會在精神及物質方面的協助，大家共同努力。

這事因無從要求訂正，黃武東牧師雖感不快，也只有順其自然。隨後黃武東牧師又赴夢翠鷗(Montreal)、渥太華等處訪問神學校及教會，致詞，然後乘火車橫貫加國，經過漫長的旅途，始抵溫哥華(Vancouver)，不久取道日本返回臺灣。

黃武東牧師前面提到旅美期間，曾代表台灣基督教長老總會參加「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邀請在臺建設一所基督教大學，聯董會(UBCCC)乃同意接納臺灣總會的邀請，以總會為 Co-Founder (共同創辦人)，並派總幹事 Dr. William P. Fenn 來臺考察。

(1)組織籌備委員會，任籌備委員

1953年創立基督教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由聯合董事會(UBCCC)，台灣長老教會總會，及臺灣地方人士三方面各派代表三人組成，前教育部長杭立武先生擔任主席。總會所派的委員是黃彰輝院長、陳明清律師，及黃武東牧師。

(2)選定校地

聯合董事會同意在台設大學的消息傳出去，全台各地，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均紛紛爭取未來的大學在各自的地方設校，其中台中表示願意提供大肚山(後改名大度山)山麓八十多甲山坡地，高雄則提供大貝湖(後改

名澄清湖)土地，籌備委員以台北、台南、高雄均已有大學或學院，惟台中當時只有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其他並無一所大學；復以這所籌備中的大學係平民大學的性質，乃選定大肚山麓為校址。並經多次討論，決定命名為「東海大學」。

隨後，籌備會前赴台中勘察校地，當時的中港路還是崎嶇不平的石子路，遠非今日寬敞的台中港路，交通很不方便。八十餘甲土地當中，有大約三分之一被占耕，其餘全是一片荒涼的草地。黃牧師記得初到現場時，眼見這塊不毛之地，即是建造象牙之塔的地方，內心不禁自問：

「這是否在做夢？」

(3)開墾建校及破土

設校工作，適得當時亦屬美援機構的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為今「中國農村發展委員會」，簡稱「農發會」之前身)之助，鑿了二口大井，開闢水源，並種植草木，綠化校園。

1953年11月11日，趁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先生訪台之便，邀請其蒞臨主持破土典禮。

(4)申請立案一度受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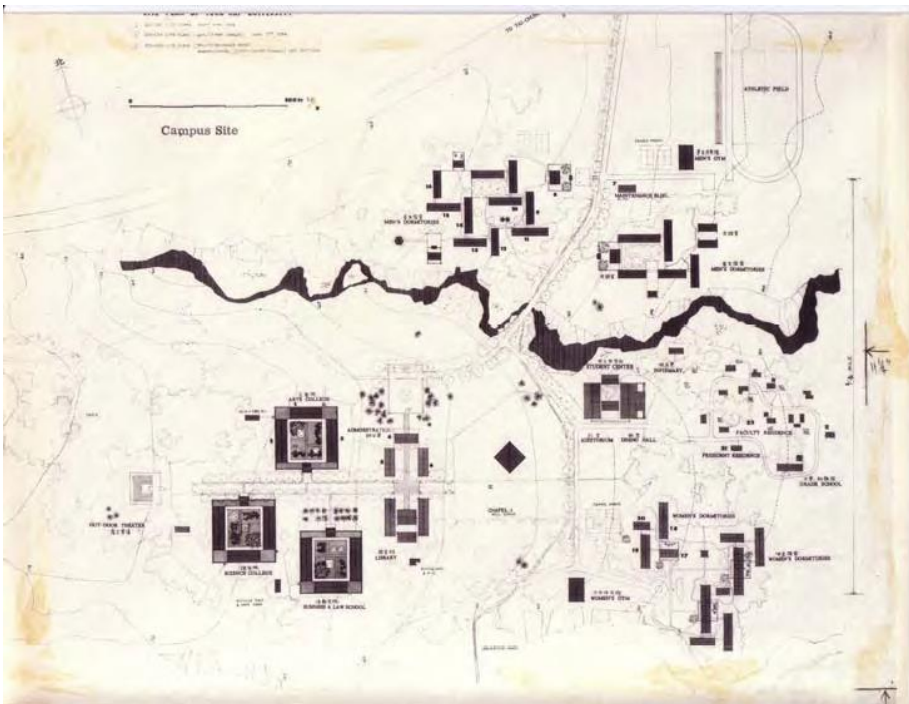
起初，籌備工作一直順利進行。到了向教育部申請立案時，事情卻發生變化。申請的案件遲遲未獲批准，幾度向教育部探詢，亦不得要領，籌備會為此幾乎每週開會，當時黃武東董事遠在台南，為了這事每星期赴台北開會，實在不勝其苦。最後，好不容易才得到若干傳聞，說道這事情決定權是仍在最高決策者手中，教育部不敢做主。

其實這件事，當時籌備處杭立武主任心裡有數，但當時各位董事都被蒙在鼓裡。據說：因政府某機關人士(國防部與空軍總部)反對，其理由，是認為東海大學是一所外國人出資興建的學校，設在某軍事基地(指台中水湳軍事機場)鄰近大肚山上，事關國防機密與安全，不應核准。

籌備處開會為此甚覺困擾，進度陷於膠着。最後，根據文獻記載，是瑞典籍的宣教士魏德光(Rev. Dr. Arne Sovik)委員心生妙計，建議設法請蔣夫人協助。由於當時臺灣尚未退出聯合國，而且還接受美援，籌備會以「該校已經請友邦副元首(指尼克森)破土，且木已成舟，萬一設校不成，無以向盟國政府及聯董會(UBCCC)屬下的美國基督長老教會交待」為由，透過蔣夫人的管道，才得以獲核准。

(5)大興土木

設校之事爲此一拖二年，至 1955 年 11 月始正式建校，校舍是由美籍華裔名建築師貝聿銘所設計，隨即由大陸工程公司大興土木，興建辦公大廈、學生及教職員宿舍等，爲中西合璧式的建築。教堂是由美國一位長老教會亨利·魯斯所捐贈，也是貝聿銘設計，四片兩組互對黃色成雙曲拋物面牆的鋼筋水泥建築爲其主要結構，隱含有少女祈禱--即「合掌祈禱」與神祇呵護之意。這些校舍及教堂等建築，大家初看時覺得不過爾爾，但建成之後，卻大受國內外社會人士的特加贊賞，教堂的建築更爲若干地方所模仿，如菲律賓大學教堂，及紐約甘迺迪機場教堂均和它相仿。



(6)功成身退

1955 年 3 月 26 日，籌備會禮聘曾約農教授爲東海大學首任校長，並約定兩年爲限，待學校開學，校務一切就緒時，須准其辭職(但實際上是延聘至當學年結束 1957 年 7 月 31 日)。

原來籌備會起初擔心學校成立後師資難求，乃思藉曾約農先生之聲望與才幹，可解決此一問題。曾先生首肯後，這些困難終獲解決。第一年先成立文、理學院，共招新生二百名，一律住校。籌備委員全部聘任爲第一屆董事。

兩年後，曾約農先生辭職，黃武東牧師也以總幹事工作繁忙，辭去董事

職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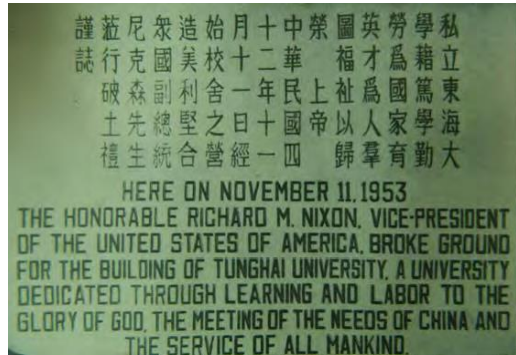
二、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奠基破土典禮

董事會鑒於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將於 1953 年 11 月 8 日間訪華，由美籍狄寶賽夫婦特敦請其於 11 月 11 日蒞臨臺中大度山校地，爲此一新設置的大學舉行奠基破土典禮，以象徵中美兩國間之合作。該項典禮於是日上午 10 時 15 分隆重舉行，到場有教育部程天放部長、美國駐華藍欽(Karl L. Rankin)大使、中部五縣市首長、總統府、外交部官員及各界人士一千餘人。

奠基典禮的地點即目前的男生宿舍靠近校門口附近。那時的大度山，除雜草與蔗田外，真是滿目荒涼！若與今日的校園相比，實不可同日而語。典禮就在大風、黃沙撲面飛舞中舉行。但與會的一千多人，仍感滿心愉悅，尼克森副總統在破土之前，曾發表深具意義的演說(請見「參、東海大學籌辦董事與創辦董事」的「(3)狄寶賽夫人」單元已全部引用)。



副總統尼克森先生蒞臨破土典禮致詞



尼克森致詞完畢，即由蔡培火董事代表董事會敦請尼克森爲建校破土，並樹立中英文紀念碑。中文碑文說

私立東海大學藉篤學勤勞，爲國家育英才，爲人群圖福祉，以歸榮上帝。中華民國 42 年 11 月 11 日經始校舍之營造，美利堅合衆國副總統尼克森先生蒞行破土禮謹誌。

英文碑文爲：

Here on November 11, 1953. The Honorable Richard M. Nixon Vice-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roke Ground For The Building of Tunghai University, A University Dedicated Through Learning And Labor to The Glory of God, The Meeting of The Needs of China And The Service of All

Mankind.

典禮中，教育部程天放部長亦曾致詞。程部長表示：

東海大學是自由中國唯一的私立大學。它的創立，不僅是為自由中國增加了一所學府，而且在中美兩國傳統友誼上豎了一塊里程碑。兩個民族的友誼，如果能夠建築在教育文化的基礎上，那末彼此能夠互相了解、互相尊重。這個友誼，一定可以歷久不渝，發揚光大。

中國有句古語：「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今天我們在破土典禮中，所看到的不過是一片田野，絲毫沒有學術氣氛。但是明年今日我們就要看見許多新校舍和數以百計的青年男女，在此地接受高等教育。五年、十年以後，我們更將看見許多青年由東海大學畢業出來，擔任中國的建設工作。所以由今天的簡單破土典禮開始，它將來對中國的貢獻將很偉大，並且是無法以數目字衡量的。

藉著這次隆重的破土典禮，東海大學就在國內外人士的祝福與期待中，建立了她的新而理想的形象。

三、筆路藍縷的校地經過

東海的創辦既經政府批准，聯合董事會旋於 1953 年 6 月派美國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前神學院院長葛蘭翰博士(Dr. Thomas W. Graham)為聯董會代表，偕同該會執行秘書芳衛廉博士抵達臺北。與國內教育家杭立武博士接觸，討論籌備建校及籌組董事會事宜，並撥款美金五萬元作為籌備費用。

6 月中旬正式成立基督教大學籌備處，由杭立武先生擔任籌備處主任。葛蘭翰、蔡一諤為籌備委員。嗣即擴大組織，加聘蔡培火、黃彰輝、誠恩慈、美籍狄寶賽夫人(Mrs. Constance S. de Beausset)、加籍牧師明有德博士(Dr. Hugh MacMillan)、英籍安慕理(Boris Anderson)及美籍牧師魏德光(Rev. Arne Sovik)等為籌備委員。籌備處設於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七巷二號，由徐可燦教授擔任執行秘書，隨即展開籌備工作，並決定先行籌設文、理兩學院。

籌備工作首要之任務，厥為選擇校地。當建校消息公布後，各界期望均極為殷切，臺灣的北、中、南各縣市紛紛志願提供建校用地。杭氏為此曾會同聯合董事會代表葛蘭翰及若干籌備委員數次前往各地接洽並作實地勘察。幾經奔波與考慮，始決定接受台中市政府之邀請，於 6 月 27 日由杭氏宣布在台中市西屯區大度山上建校。台中市政府表示願意撥地 143 甲作為建校用地，

並一再表示所需校地可以完全贈送，東海不必負擔任何費用。這筆 143 甲的土地中，市有地 50 餘甲，由台中市政府於收回放領地後，致贈東海，國有地 80 餘甲，台中市政府於收回放領地後，租賃東海使用，並允諾豁免租金，以示優待(但事後本校不但付出巨額補償費及租金，且出鉅資購買國有地)。惟此議尚須由台中市政府報經省政府核准，時地政處認為面積過大，且有農地在內，有意核減，經杭氏與俞鴻鈞主席及浦薛鳳秘書長兩度商洽，杭氏表示將來可設農學院或至少設置農場，方獲台灣省政府同意。

台中市為中部首善之區，地處於最重要的樞紐位置，位於台灣中部的台中盆地裡，東、西有大坑山、大肚山橫互，素有文化城之名，擁有豐富人文資源、歷史文化、自然景觀、獨特產業、遊樂設施，還有交通便利、氣候宜人。大肚山地勢稍高，但坡度不峻。俯望台中市景，歷歷在目。山光雲彩，景色絕佳。創校於此，十分適宜。

校地決定後，即為校名之擬定。是年 8 月 11 日，籌備處曾以海東、玉山、協和、聖保羅、成功等名稱，致函教育文化界人士徵求意見，最後杭氏邀請在台中故宮博物院清點文物之羅家倫、凌純聲二氏察勘校址。杭氏見該地適在海之東側，傾向用海東兩字，羅氏謂不如「東海」，並請凌氏作一番研究，凌氏函告適宜，杭氏遂據以提出籌備會決議通過。

校地、校名既定，籌備處乃向教育部呈請設立大學。經教育部核准後，於 10 月 2 日依法成立董事會，設董事 15 人，原則上為 35 制，即由國內各長老教會推選董事 5 人，曾經從事教育工作者 5 人，外籍(長老教會)人士 5 人。董事會成立後，隨即一致推選杭立武博士為首任董事長，蔡一諤、蔡培火、彌迪理(Harry Daniel Beeby，英籍)為常務董事。為推展各項工作，分設提名、建築、財務、校址、圖書設備等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由魏德光(Arne Sovik，美國籍，召集人)、高天成、誠恩慈組成。建築委員會由杭立武(召集人)、葛蘭翰、蔡一諤、蔡培火、彌迪理、狄寶賽夫人組成。財務委員會由黃武東(召集人)、蔡一諤、蔡培火、張靜愚、明有德組成。校址委員會由陳明清(召集人)、蔡培火、張靜愚組成。圖書設備委員會由安慕理(召集人)、曾寶蓀、狄寶賽夫人、高天成、黃彰輝組成。另聘毛子水、屈萬里、孔德成為顧問。並於 10 月 14 日向教育部呈請立案，呈文謂：「自今夏聘請籌備委員會開始籌備以來，經數月之努力，已在台中勘定校址，由台中市政府撥地 143 甲現正設計建築，預定明秋開學。茲籌備委員會已告結束，並聘定校董成立董事會。」11 月 13 日教育部正式核准立案。

四、籌辦期的代理校長

1. 陳錫恩校長個人經歷

陳錫恩先生(1902-1991)，男，福建福州人，漢族，博士，教授，著名的教育家。1922年畢業於福建協和大學教育學系，得教育學士學位。1922-1924年在福州英華中學任教員。1924年秋赴美國紐約，入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專攻教育學。1928年獲得教育碩士學位後回到福州，出任協和大學教授、教務長兼教育學院院長。1937年攜家眷再度赴美，入南加里福利亞大學繼續研究文科教育，先任該校遠東問題講師，後任該校暑期學校比較教育講師。1939年獲得教育博士學位，旋應聘為該校教育學院教授兼亞洲文化學系主任。抗日戰爭勝利後再回福州，出任協和大學代理校長和校長(1947年3-6月)之職。1947年6月辭職赴滬第三次赴美，出任南加州大學東方文化學系主任兼教育學教授，一直執教達三十餘年。1974年，南加州大學授予他榮譽博士銜。同年退休後，仍擔任南加州中國協會會長，美國華學教師學會會長等職。1991年5月7日在美國病逝。

陳錫恩博士出任福建協和大學校長(1946-1947)，是時代賦予他的使命，卻沒有賦予他大有作為的時運。擔任校長之職不到一年，就因時局變幻莫測而被迫赴美。這是他的一個痛點，也是協大的一個令人遺憾的插曲。¹⁵

¹⁵ 1946年8月，從三藩市直航上海的美國林尼克斯海軍號客船上，乘載著福建協和大學的代理校長陳錫恩的一家人，以及十餘位協和大學教職員。他們之中有中國人也有美國人，中國人多是從美國進修後返校的，而美國人則是回美休假期滿返校的，包括美以美會派來的代替克立鵠夫婦倆教授農學和畜牧學的威廉·奧維霍爾特先生和夫人，來校教授英語的唐納德·麥金尼斯夫婦，美國公理會代表的徐光榮一家，尤妮絲·湯瑪斯小姐和李奧娜·伯爾小姐；繼續充任出納員兼會計的愛娃·阿舍小姐。同時還有兩個基督教協會(即英國聖公會、歸正教會)，分別派人來協和大學參與工作的，這在過去許多年未曾有過的現象。其中英國聖公會傳教會派出了湯瑪斯·威爾金森牧師和夫人。威爾金森牧師來任學校教士，他的夫人任英文教師；歸正教會派來了戈登·範懷克和夫人教授歷史。

赴任途中的陳錫恩先生情緒十分高漲，在海船上組織召開了幾次教職員會議，討論福建協和大學的發展問題。陳錫恩慷慨激昂的演講，很能激發大家的熱情，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校歌，歌聲在太平洋上空飛揚。此外大家還在海船上舉行集會，表演京劇與歌舞，儼然不失協和大學的大家庭精神。1946年9月2日，海船終於抵達閩江的協和大學碼頭，碼頭上早已是人頭攢動，歡聲如潮，協和大學師生熱烈地迎接海外歸來的校友與校長。這個令人激動的情景，讓闊別協和大學多年的陳錫恩

校長的眼眶濕潤了。「母校，我回來了！」陳錫恩校長念叨著，在眾人的簇擁下，拾級而上，一步一步地朝校長辦公樓走去。

陳錫恩校長到任的第二天，就召開了教授會議，第三天學生就註冊上課了。許多外籍教師回到了學校。陳錫恩校長讓徐光榮出任文學院院長，其夫人徐克麗繼任音樂系主任，李來榮出任農學院院長，鄭作新出任理學院院長兼學校教務長。

所有這些果斷的言行，都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陳錫恩校長當時比中國的其他人更懂得高等教育。他原在南加州大學攻讀博士時撰寫的有關美國高等教育的論文，有了更新的進展，也找到了協和大學這塊用武之地。他持有的許多觀點都將運用於恢復協和大學的教學與科學研究中。當然，其過程需要與學校狀態的恢復一道取得進展。

遺憾的是，福建協和大學的情況不如人意，更出乎陳校長的最差的意料。這些窘境使陳錫恩校長，本應該致力協和大學教學科學研究的雄心壯志，變成了為了協和大學的生計和學生運動的繁瑣應對之中。本末倒置，真乃時事弄人！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雖然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戰爭給中國社會的破壞後果嚴重。其中戰後的物資供應特別緊張，就是這種破壞後果的集中表現。學生開學時交了整個學期的膳費，卻因為通貨膨脹，米價昂貴，而使學校食堂無法供應，有時供給的牛奶、麥片不夠分配，大家只好抓鬮。因此，陳錫恩校長整天地為學校的物質供給而忙碌，常常到省政府申請平價米。有一次他去美援機構(UNRRA)申請援助物質，主管的人指著一輛大卡車說：這是今天剛到的，你要就開走吧。陳錫恩校長雖會開車，但沒有開過卡車，他硬著頭皮將車開回了學校。此事傳遍了校園，大家都來圍觀校長開回來的卡車，校長成了了不起的英雄。後來該卡車改裝後，就成了協和大學的校車。校車每天開到福州城一趟，中途設立幾個小站，週末還增加班次，大大便利了學校師生。後來，在陳錫恩校長的周旋下，美國托事部及美國紐約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捐贈了許多物品，在相關的校舍和迴廊安裝了電燈、電話、各建築的窗戶紗、玻璃，有的地方被油漆刷新。同時又發動師生修復了足球場等運動場所，修整了校園內的幾條主幹道路。學校還接受了英國基督教聯合委員會捐贈的汽船一艘，用於學校與福州市區的交通，與陸路校車一起構成了協和大學本部至福州市的水陸兩大交通線。凡此種種都極大地改善了協和大學的辦學環境，使學校得以順利地完成這個學期的全部工作。

然而，1947年卻成為多事之年。1946年12月24日的「沈崇事件」，激起了中國人民對於美軍暴行和美蔣勾結挑起內戰的憤怒，像全國其他學校一樣，福建協和大學校園也是人聲鼎沸，掀起了反對美軍暴行的各項活動。學生們召開全體大會，決定罷課三天，並和福州其他學校聯合舉行遊行。校園內到處是「打倒美帝」、「美軍滾出去」、「為沈崇報仇」的標語口號。學生們租好一隻大船，分水陸兩道同時入城參加遊行。1947年5月，全國學界爆發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協和大學師生也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舉行了大遊行，有力地配合了中國人民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與全國上下出現的糧食風潮並行而起的，是罷課和遊行為主要行動的學生運動，遍及各校，尤其上海、天津兩地學生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而釀成的(1947年5月)「五·二」慘案，更加激發了學生反美反蔣的怒潮。為了鎮壓學生的愛國運動，國民黨政府於5月30日宣佈全國戒嚴令，並密令各地政府於6月2日進行全國性的大逮捕。但是，福建的逮捕行動提前了。1947年5月31日傍晚，陳錫恩校長一家正在吃晚飯，(國民政府)福建省教育廳長突然登門，訴說是福建省政府主席劉建緒請

陳錫恩先生不僅僅是以校長的身份遠離協和大學而去，更是一位教育家的離去，也是一位學者的離去。陳錫恩博士在福建協和大學任教期間，開設有《教育史》、《教育哲學》、《比較教育》等課程。終生勤奮，發表教育方面論文 120 多篇，著有《美國大學課程》等 9 部著作，美國 5 種「百科全書」上都有他的文章。陳錫恩先生在 1991 年逝世後，其妻鐘文惠為其設立「陳氏獎學基金」，除了每年撥付四萬元外，還接受各界捐贈，陳錫恩頗有人緣，喜歡他及尊敬他的人還真不少。Dr. Carl Franklin(Dr. Carl Franklin，系南加里福利

客，車子已在山下等候。陳錫恩校長只好放下筷子匆匆赴宴去。到了省政府，飯後，劉建緒才單刀直入正題，說接到消息，6 月 1 日福州全市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和商人罷市，協和大學的學生是三罷的領導者。劉建緒給了陳錫恩校長一份名單，建議他將名單上的學生請到校長家裡，以便軍警一網打盡。陳錫恩校長事先一無所知，更無心理準備，他回答說：「我回母校來是為了辦教育，我不問政治，你若問我哪一個同學功課好，我可以叫教務長把名單給你，但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員，誰是國民黨員。這名單我也不必看。協和大學是中國領土，你們有行動權，但是對不起，這事我不能幫忙。」一時場面十分尷尬。接著省主席和教育廳長都藉故走了，留下秘書陪著陳錫恩校長。一會兒秘書說汽車來了，請陳校長上車。陳校長以為送他回學校，誰知道車子一停，卻到了警備司令部。陳校長知道自己被軟禁了，儘管他一再要求送他回學校，但是沒有人答應他，在他的一再堅持下，直到下半夜一點才有人開車送他回學校。當天夜裡，即 6 月 1 日凌晨二時，大批軍警包圍了協和大學校園，並突襲了學生宿舍逮捕激進學生。學生們敲擊臉盆相告，投擲墨水瓶反抗，有的學生乘機逃脫。由於那天是星期日，許多同學進城了，因此黑名單上共 32 人，只被捕了 12 人，其中 5 人是共產黨員，包括一名女生。第二天被捕學生的家長也來了，陳錫恩與鄭作新到省政府交涉保釋被捕學生，卻沒有結果。為了防止事態擴大，6 月 3 日下午，陳錫恩主持召開校務會議，會議決定於當日下午 5 點關閉校門，不進行考試，提前放暑假。

經此風波，陳錫恩再無意留任校長之職了，「回閩一年，談不上辦教育，做的是替教員和學生去美援機構乞求，去省政府乞求。現在置身國共的鬥爭中，若做下去，必定被他們的戰火打得焦頭爛額，只有回美國去」。「臨行那天，沒有想到協和大學師生們租了一隻大船來送行。大船上載滿了人。船上掛著橫幅：『歡送陳錫恩校長赴美！福建協和大學』。聲勢雄壯。船駛離時，大家情緒都挺好，唱著校歌，好像不是送別，而是一起去旅遊。船靠大船時，陳錫恩夫婦跟所有人握手道別，並向他們致謝。」

陳錫恩校長深愛著他的母校--福建協和大學，協和大學校歌就是他在任協和大學教務長時譜的曲。他像莊才偉、高智和林景潤等前任校長一樣，也是一位為協和大學的發展和盛譽做出傑出貢獻的協和大學人。他人格高尚，精神可嘉，正如其妻鐘文惠所言：「錫恩不是一位平凡的人，他有超人的天資，對無謂的禮儀有革新的抱負。雖然受了身體的限制，還是有驚人的成就。我為他而驕傲，也分享了他的光榮。他的生活，不求奢侈，只求舒服，更不要與別人比較，競尚時髦。他不效法一些重物質生活的人，生活清白，自奉節儉，肯幫助年青人求學上進，這也表示他與別人不同。」

亞大學副校長(陳氏獎學基金的捐款的受託人)「對陳夫人說,也對別人說過,簡直不能相信,錢一直都是源源不斷而來,而且是從世界各地寄到南加里福利亞大學來的。這也可以說明錫恩是桃李滿天下,敬愛他的人很多。現在接到的捐款已經超過了 15000 美元」。陳氏獎學基金的其中一項重要決定,就是自 1991 年起每年幫助一名由中國官方選派的福州籍的優秀學生來南加里福利亞大學研究院留學。

2.籌辦中的代理校長陳錫恩博士

美國紐約的中國基督教基金委員會於 1953 年創辦東海大學。先前曾在大陸創辦 13 所大學。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2 年內所有教會學校的校產都被沒收,燕京大學變成北京大學。協和大學變成了製藥廠。所以美國紐約的中國基督教基金委員會,擬在台灣設一所基督教大學,即東海大學。受美國聯董會芳衛廉秘書長之託,於 1954 年 2 月,陳錫恩博士向南加州大學(U.S.C.)告假一學期,並由美赴台協助籌辦東海大學事宜。

這是陳錫恩夫婦第一次到台灣台北,所住的是日本式的房子,樓上樓下各有一臥室,有客廳、飯廳、廚房,也有工人房。屋內有個抽水馬桶,洗澡房是日本式,從外面燒熱水,大家用個杓子,在浴缸內取水倒木盆內,初洗後,再往浴缸內浸。當時 2 月的台灣,天氣相當冷,陳博士穿著大衣吃了早點,打算到台北東海辦公處上班,但覺得小巷道有風,心想要把門關緊些,只因日本式門窗都是木框及紙糊的,沒想到一扇門在他手上,可以領悟到推過來或推過去特色。陳錫恩夫婦住在台北的中山北路二條通,陳博士每天走去中山北路辦公,當時台北辦公處有吳德耀博士,還有英漢書記。

東海大學籌備初期,紐約中國基督教基金委負會派 Dr. Thomas W. Graham 擔任代表,葛蘭翰博士到台月餘後因故回美,中國基督教基金委員會派陳錫恩繼續籌備。那時負責的董事人選已選定 15 人,學校地點也已定在台中大肚山,然而因一部份土地屬於私有,需多方交涉。甚至到陳錫恩博士離台時都尚未完全收回。在此其間,於 1954 年 5 月 8 日第 7 次董事會議上,曾議決延請陳錫恩博士擔任代理校長。其實陳博士到台後,向他求職者頗不乏人,但他不打算擔任校長,所以不要把自己的人安插在東海大學任職。當時台灣社會大眾都希望東海大學能即日開學。所以陳錫恩博士認為東海大學,必須有一個教務長具有博士學位(一級主管)。因此他舉薦福州所認識的唐守謙先生,他是一位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師範教育碩士,在福州及台灣都曾在教育部工作。

因要在大學工作，由陳錫恩安排他到美國愛沃華州一個小的高等學府晨邊學院(Morningside college, Iowa)取得榮譽博士學位，以便擔任東海教務長。因此唐守謙先生從籌備期間(1954)，就參加了東海的工作，直至退休(1971)。

紐約中國基督教基金委員會秘書長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乃是陳錫恩博士的好友，芳秘書長請陳錫恩教授到台灣的時候，陳教授曾問芳秘書長：「會不會把校長之職放到我肩上？」芳秘書長說會派吳德耀博士同去，早就預備安排吳博士當校長。吳德耀博士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乃芳秘書長之高徒。芳秘書長在金陵大學是擔任英文教師。吳德耀先生又具有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教育背景當然合格。人家反對他，是因為他太年輕，也是新加坡華僑背景，在美時是在聯合國工作，而非辦教育。陳博士到台後，一直表示他不要做校長。在台灣，東海大學校長是個好職務，想要做的人還不少，人家不相信他是真的不做。直到 8 月 16 日第 13 次董事會議，才正式提議聘請陳博士擔任校長。可是因教育主管當局認為陳博士為美方代表且具雙重國籍，最好另行物色，而陳博士亦竭力謙辭，此議遂予擱置。

其實，董事中有一人極表示要做校長，據陳錫恩夫婦看，他是個相當能幹的人，陳博士也支持他。但很多人來告訴陳錫恩夫婦，說他家庭私德有問題。陳博士那時剛 52 歲，教育學博士，也曾做過福建協和大學校長，是基督徒，私德沒問題。董事會想來想去，就是他合格，曾經三次選陳博士做校長，但他都堅辭(東海校史，民國 44 年至 69 年 p.50)。那時期欲做東海校長的人卻編造了個罪狀，加到陳博士頭上，說陳博士「反共不徹底」，拿出陳博士在南加大時寫的文章(1950 與 1953)為證，從教育部向校董會施加壓力。當時氛圍是在台工作的人，也許是必須徹底反共，但陳博士是以學術的眼光研究中共，評論有說它好也說它壞，與反共或親共並無多大關係。反對陳博士的人，當時是以台灣島上反叛加罪於陳博士。因此有一天陳博士從他的辦公室回家，就告訴他的夫人說，今天好辛苦，好不容易才把范哲明(Paul P. Wiant, 1887-1973)建築師勸住，現在他已經不辭職了。范哲明是東海大學的建築師(1953-1957)，最初校園的藍圖是由他擬好的。他聽說有些人攻擊陳博士，就十分不高興，為陳博士打抱不平，所以要辭職。當時就是由范哲明告訴陳博士，有關於反共不徹底的風波。其實范哲明以前在福州專門替教會作建築工作，所以才會認識陳博士。有一些在福州的美國人對陳博士十分愛戴，認為他不會做錯事，而且由一個美國建築師，看反共不徹底，也不是大罪惡的事情。

據陳博士的記憶，反共不徹底的風波之後，雖然校董會第三次再舉陳博

士做校長，但陳博士仍又再請辭。理由是，陳博士向南加州大學請假只有半年，有個人信用問題，必須回校。校董會本來要設法派代表與南加州大學商量，但後來因陳錫恩於 1954 年 8 月 20 日就離職，所以校董會就沒有進行。陳博士雖然不做校長，但東海大學仍承認他的貢獻很大，因為他為東海大學擬定了行政及教育方針，提倡設立工讀制度，注重通才教育等。¹⁶

五、孕育本校首任校長的歷程

1954 年 10 月 15 日，再度提名董顯光博士，但因中央政府將另有任務派任，亦未能成事。10 月 22 日，美國《時報周刊》創辦人亨利魯斯令妹穆爾夫人(Elizabeth Luce Moore, 1904-2002)來臺時，對學校校長人選遲遲未決，表示極大關切。因穆爾夫人與蔣夫人(1898-2003)同是美國維斯里學院(Wellesley College)的學姊妹，晉見蔣夫人、狄寶賽夫人與曾寶蓀董事瞭解了校長人選之事。到了 12 月 20 日的第 18 次董事會議，由提名委員會建議聘請台灣大學教授曾約農先生(並非受洗基督徒)擔任校長。經過董事會與曾教授的多方溝通瞭解之後，終於在 1955 年 3 月 26 日第 20 次董事會議中，一致通過選聘曾約農先生為校長，並推請杭董事長及魏德光董事代表致聘。

1. 曾約農校長個人經歷

曾約農(1893-1986)，湖南湘鄉人，中國教育家。生於清光緒 19 年農曆 10 月 17 日(西元 1893 年 11 月 24 日)。為清朝名臣曾國藩嫡系曾孫。自幼博通經史，卓爾不群。弱冠考取第一屆庚子賠款赴英留學，在倫敦大學攻讀礦冶。1916 年畢業後，旋入劍橋皇家礦冶學院研究，歸國後創辦藝芳女校於長沙。1925 年任湖南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參與籌建省立湖南大學。對日抗戰勝利後，創辦湖南克強學院。1949 年避難香港，隨後轉赴台灣，受聘為台灣大學教授，後於 1955 年被東海大學董事會推舉為首任校長，為期二年。1956 年，中華民國政府派其為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席代表，以其博識宏論蜚聲國際論壇。1956 年起被聘為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

1957 年 3 月底，曾約農先生任期屆滿退休。1973 年，東海大學為紀念曾約農先生對東海的貢獻，遂將校門口連接到教學區的主要道路命名為約農路。

¹⁶ 參見《東海校史，民國 44 年至 69 年》pp38-40。

1986年12月31日，因多種老年人疾病的併發症，逝世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壽95歲。

2. 曾約農先生艱辛過程中出任首任校長

雖然於1954年5月8日第7次董事會議上，曾議決延請陳錫恩博士擔任代理校長，直至1954年8月16日第13次董事會議，正式提議聘請陳博士擔任校長。但因教育主管當局以陳氏為美方代表並具雙重國籍，另因發表文章起爭議，建請東海大學最好另行物色，適逢陳氏亦竭力謙辭，並於8月20日離台返美。因此，董事會只好重新找尋具有學術崇高地位並且是社會賢達人士，來擔負此重責大任。

物色校長人選為董事會最需要慎重決定的一個重要問題。因董事會懍於創業維艱，希望為大學選任一位在學術上既極具造詣，在行政上亦頗富經驗之士膺此重任，為東海未來的發展樹立良好楷模。因此，董事會由先前已成立的提名委員會，包括魏德光、林宗義、誠恩慈等，迭次開會討論可能人選，包括梁少初博士、浦迪生博士、董顯光博士外，並接受各方推薦，然遲遲無法決定。

當時的校長人選亟須考慮，要有國際觀、豐富行政資歷及國、內外良好的人脈關係，以便聘請優秀師資、行政人員。聯董會芳秘書長就把此責任，交由學校董事會全權處理。1954年12月20日的第18次董事會議，提名委員會建議聘請曾約農先生擔任校長。經過董事會的多方瞭解及多方聯繫，終於在1955年3月26日第20次董事會議中，一致通過選聘曾約農先生為校長，並推請杭董事長及魏德光董事代表學校董事會致上校長聘書。

曾約農先生於接獲聘書後，同日致函杭董事長，縷陳其對此一大學的構想。他認為大學的主要目的，在於保存與培養文化，不應囿於淺近的功利觀念；同時，基督教育與其他性質之訓練相同，實有賴於知識與經驗。根據第一點，他認為各種課程之選訂，務使能建立一種包括古風之文化環境。然後在此環境之中，培育職業與技術專才。同時對東西文化、古今文化，亦必須互相溝通，彼此配合。根據第二點，則：

1. 學校方面應使教職員學生公私生活，均能維持高度標準。
2. 校內團體生活，應受基督教條之管制，對耶穌必須虔誠崇敬。
3. 校內教友，務望以熱忱與精誠，切實做到信仰、博愛、寬恕。
4. 全體學生並宜深切了解，禮拜與聖經研讀，應為其正規教育之一部份。

5.學校當局應與政府合作，並遵照其法令。關於信仰自由一層，董事會應授權校長，作正確之解釋。遇有國家憲法規定所不及而需要維護者，亦由校長負責處理。此一原則，不論後果如何，必須先行確立。

關於行政方面，曾校長亦提出下列指導原則：

- 1.董事會、校長、教職員及學生，應群策群力，使東海成為第一流大學。
- 2.校內人員之聘用，應以資歷為主；經費之支配，亦應以是否值得為據。先後次序，更應從全體著眼，既不宜有固定之比例，亦不宜分系科之區殊。
- 3.為求普遍宗教訓練起見，原定非教友人員之比例，應予取消，以廣佈道之旨。
- 4.員工之待遇，固宜使其足夠生活，但應與一般社會同分艱苦，力求簡樸，勿稍奢侈，董事會對此一主張，必須予以支持。
- 5.學生對學校行政，應有發言之權，其辦法另行妥訂。
- 6.校長應秉承董事會之方針及政策，竭誠執行，所有一切決定事項，亦當隨時向董事會報告。

7.董事會亦宜信任校長，給予一切處理之全權。

8.為使校長負起行政全責，所有人員之管理，應給予全權。目前已聘人員，由校長斟酌後重行加聘，或予調整。最後，約農先生表示，如董事會同意照辦，則願應聘；並就設立工學院一事，請董事會再行考慮。

董事會乃於 1955 年 4 月 6 日召開常務董事會與提名委員會聯席會議，討論曾約農先生所提各點，於 4 月 7 日復函表示同意支持，並謂「各董事對先生信仰之誠篤，及理想之崇高，咸不勝欽佩之至。深信在先生賢明領導之下，必能達到創辦人所懸之目的與方針，使東海在臺成為一完善之教會大學。」

4 月 19 日，約農先生復函應聘，擔任東海首任校長。函中表示：「雙方須有下述之瞭解：關於大體政策，校長應尊重董事會之職權，在大體政策範圍以內之行政事宜，董事會應尊重校長之職權。遇雙方職權有疑義時，依國家教育法令解釋之。」並定 4 月 21 日開始接事。

1955 年 4 月 25 日，曾校長首次參加第 21 次董事會議，會中致詞時略謂：

承各董事歡迎，至為榮幸，尤其在此極度困難及國際局勢緊張之際，美國教友們竟能同心協力在臺灣創辦此一教會大學，令人更覺感奮。此次得獲機會為上帝、為國家服務，撫心自問，實亦義不容辭，但望董事會能視為試用，在此試用期間，願將學校籌辦成立，並將基督理想，求其實現。深信有董事會及聯合董事會之共同支持，此項理想定

能實現。

曾校長最後除再向董事會表示謝意外，並堅決聲明當夙夜匪懈，努力以赴。此外，會中曾校長並再度闡述其個人對教育的主張，及對教會大學的理想，也重提設置工學院之事，建議董事會暫以兩院開始，一為文學院、一為理工學院。俟相當時期再分三院，所有法商學院的科目可納入於文學院內。經各董事詳加討論後，決定如不及籌辦第三學院，則先設置文、理兩院。所有理學院應設科目可根據第三學院之討論，酌為包容。

曾校長於接事後，即積極著手擬訂制度，計畫招生，聘請教職員。並蒙先總統蔣公召見，先總統對本校董事會工作頗表滿意。此外，亦曾走訪教育、財政、經濟三部部長，徵求意見。且於 5 月間，由吳德耀博士隨行赴美一趟，曾與紐約聯合董事會各主要人員及台灣東海籌辦委員會各委員晤談，商洽校務。並沿道參訪美國推行勞作及通識教育有關多所大學，並親自拜訪為東海校園規畫及教堂設計的貝聿銘建築師，同時也順便帶回貝聿銘的東海校園設計圖，轉交給學校董事會。曾校長謂此行「得一極深刻之印象，即東海之未來，極為光明，但一切有待吾人之共同努力。」

至 1955 年 6 月 13 日的第 22 次董事會議，對學院的設置作成了最後決議。決定先辦文、理兩院，文學院包括人文科學及社會科學，理學院包括理論科學及應用科學。文學院暫設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歷史學系。理學院暫設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化學工程學系，兩院共七個學系。同時修正通過本校暫行組織規程。其後不久，本校行政主管亦已確定：教務長唐守謙博士、文學院院長吳德耀博士、理學院院長伊禮克博士、會計長畢律斯女士、總務長丁陳威先生。至此，本校規模已大致確立，並於 7 月呈請立案，9 月 27 日，獲教育部正式核准。

1955 年 7 月 15 日下午 2 時，董事會假台中市政府大禮堂舉行座談會。由杭立武董事長正式介紹曾約農校長與各界人士見面，並報告過去兩年來籌備情形及今後教育方針。曾校長在會中宣布，定 8 月 9、10 兩日在台北、台中兩地舉行入學考試。為期兩年的籌備工作，終告一段落。

從 1955 年 7 月 1 日到 10 月 31 日這段期間，本校的主要工作為辦理招生及籌備開學。前者大部分責任由唐守謙教務長主持，後者由畢律斯女士負責，均井井有條，故進度甚速。

在招考新生方面，由鄭得安先生負責，於 1955 年 6 月 10 日開始籌備，7 月 15、16、18、19 日分別在台北、台中、台南三區辦理報名。8 月 9、10 兩

日分台北、台中兩區同時舉行考試，9月5日放榜。計報名 5,742 人，到考 5,125 人，考試合格者 1,300 人，錄取正取 200 人，一般成績，均甚優良。9月中旬於台北、台中辦理新生報到及註冊，第一次正取生 200 人只來 64 人報到，由備取生第一次補 190 人，只來 44 人報到，繼續辦理第二次補 175 人，只來 59 人報到及第三次補 34 人，來了 28 人報到，總共有 195 人完成註冊手續。後因校舍未及竣工，決定延至 10 月 31 日開學。

9 月底台北市辦公處撤銷，台中市辦公處亦於 10 月底結束。本校行政中心遷入校園，暫借男生宿舍作為辦公室。會計長畢律斯女士於 10 月 10 日首先進駐東海。當時一切物質條件十分惡劣，新校園裡，沒有水電，沒有直通的公路。由台中赴校區，必需穿過鄉村的蔗田，汽車在崎嶇的山路上搖拽前進。一直到 10 月 28 日，本校自鑿的井水還無法抽送校區。「只聞馬達響，不見水上山」，那種困境，可想而知。因為距離開學只有 2 天，200 多人的生活成了極大的問題。幸好到開學的前一天，水來了，電也通了。可惜颱風又把宿舍的門鎖，暫留在日本，因此在困難的生活中，又不得不設法抵抗有名的「東海風」(即自 11 月刮起的大風)。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是 7 名新生，在開學前就志願加入籌備工作。他們每天由台中來校，和美國奧柏林學院的 3 個代表，亦即本校的新英文教員，合力清掃房間，搬運傢具。男女生宿舍就在這種精神下，安排就緒，這可以說是本校學生勞作開創的第一頁。

1955 年 10 月 31 日，第一屆學生正式入學，計註冊入學者共 195 人，男生 149 人，女生 46 人。用省籍來分：本省籍 90 人，外省籍 105 人。用宗教來分：基督徒 39 人，非基督徒 158 人。以這些優秀的學生，作為東海的基幹，對創辦人來說，確是值得感到欣慰。11 月 1 日辦理選課手續，2 日上午 11 時，在臨時大禮堂(原為臨時倉庫，位於現約農路路牌之對面，早已拆除)舉行創校始業典禮。台中市長、市黨部主任委員及教育部官員應邀參加。典禮由校牧穆藹仁牧師主持，建築物呈獻儀式，則由董事長杭立武博士主持。他代表董事會將本校付託於曾約農校長，希望本校今後的措施，都能符合董事會所宣示的設置目的和方針。繼由曾校長發表簡短演講，第一屆中文系學生蕭欣義代表全體學生致詞答謝。西屯區區民並致贈本校「有教無類」扁額一方(現懸掛於行政大樓)。典禮完畢即行正式上課，教室、圖書館、實驗室均暫借男生宿舍。東海大學於焉正式誕生，並定是日為校慶日。勞作教育也在這天開始實施，蕭查禮博士(Dr. Charles N. Shutt) 拿著雞毛毯子和掃帚，向同學們講解勞動的意義，隨即分組開始勞作。

在勞作制度方面，曾校長以身作則，與學生共同參與，並撰文表明勞作與傳統儒家精神間的關係，奠下勞作制度的哲學基礎。通才教育，更為中國教育制度革新之一種試探，曾校長對此教育方式之哲學觀念，明顯地表達在「宏通教育淺釋」一文中。他認為「課程之問題小，哲學之問題大，心理之問題尤大。」宏通教育，若論方法則重理性主義(rationalism)，若論宗旨則重人文主義(humanism)。因而強調「宏則無所不包，通則無所不達」的「求真之學」--「大學教育，當以求真為前提。既窺其全，復扼其要。得全則宏，扼要則通。既宏且通，教育以成。」由此可知，東海教育精神的奠立，端賴曾校長之垂規立範。

3. 曾校長留別東海

曾校長掌領東海 2 年 4 個月，受師生愛戴的程度，實屬罕見，對學生而言，曾校長生活、處事的點滴，才是深深感動他們，進而激勵自己、改造自己者。例如，他素性節儉，平常總是一襲長衫，遇有典禮，則加馬褂；他不穿西裝，偶而到美國開會，也是如此。曾校長有語言天才，國語講得很標準，也會說廣東話；他英文造詣深，英語極流利，出語優美典雅，每逢重要宣示，在中文闡述之後，往往即席譯作英語，以使在場的外籍教師瞭解。董事會所訂東海校長薪水相當高，曾校長不肯接受，後來還是照他的意思降低了。他替東海大學請教員，總是先拜訪後送聘書，要真正做到「尊師重道」。他為了處理公事或草擬方案，往往忙到午夜 12 點後，有時更晚至 1、2 點。

1957 年 7 月 31 日，曾校長任期 2 年屆滿後退休，全校學生盡力慰留，甚至有絕食、靜坐抗議之舉；經曾校長再三勸勉，學生們才無奈地服從董事會的決議。董事會為感謝曾校長開創奠基之功，特聘為終身榮譽校長。臨別前，曾校長賦有「留別東海」一詩抒懷：

兩載桃畦手自栽	橫渠孤負叩鐘來
武城弦誦慚宗緒	沂水風雩愜素懷
借得寒鶴耽落拓	非關雞肋委塵埃
相期東海鯨吹浪	一為中原洗劫灰

4. 曾約農密聞

民國時期，曾約農與堂姐曾寶蓀在長沙一起創辦了長沙藝芳女子中學，經費全由曾家支出。因其名氣，許多學校爭先禮聘前往授課，也藉此取得貼

補藝芳部份所需。藝芳曾邀請杜威、羅素等國際知名學者到湖南演講，曾校長的同步翻譯，贏得在場所有聽眾的敬佩。這些都是膾炙人口的事蹟。¹⁷

¹⁷ 看網上八卦，說一家著名的外語培訓機構，有個擁有無數粉絲的麻辣教師，他最新潮的行為，除上課跳艷舞，還帶著條上萬元的哈巴狗陪教，引得那些「沒見過世面」的孩子嗷嗷直叫酷！其實，這算什麼，帶條哈巴狗一點都不刺激，如帶條大狼狗那才叫真的叫酷！別說沒這樣的事，70 多年前民國時期，長沙的曾約農就這麼玩過。說到底，現在的一些新潮法，都是他們玩剩下的！

抽時間到處去「走穴」，貼補自己的學校曾約農

曾國藩二兒子曾紀澤的長孫，自小由祖母郭筠督課經書，在家鄉雙峰縣富厚堂度過了愉快的童年，受到了良好的曾氏家教訓練。不久跟著祖父出使英、法兩國，小小年紀，在英國生活了 6 年，學了一口純正的倫敦腔。回國後，長到 16 歲又去英國，直至 1916 年在倫敦皇家礦冶學院畢業回到長沙，幫助堂姐曾寶蓀在曾家的私家花園創辦長沙藝芳女子中學。

在這所學校，堂姐是校長，兼教英語和生物兩門課。曾先生則是教務主任，兼教英語和數學。200-300 人的寄宿制學校，沒有幾個專職的行政、後勤人員，校長和教務主任的工作繁重可想而知。但像曾先生這樣熱愛教育工作，有教學經驗，英語又呱呱叫的老師，在那樣的年代想不成為「香餽餽」都不行，所以，被別的學校聘請去上課是常有的事。曾先生也樂得抽時間到處去「走穴」，賺點外快貼補自己學校辦學的不足。

說起來是瓔珞之家，外人看起來，以為他們一天到晚如何鐘鳴鼎食，其實完全不是。曾家到三、四代後，信守先祖的家訓，遠離官場。大家只在各自專業上幹著本分職業，並沒有揮金如土的本錢，還樂善好施、熱心公益，手頭經常拮据。比如藝芳中學時期的曾家姐弟，穿的是棉布衣，吃的是臘八豆、青辣椒炒肉之類的湘菜，一派樸實、淡泊。

無錢包車，帶著外表剽悍的狼狗步行上課

上世紀 30 年代，在長沙當一名中學教師，那是相當體面的，特別是有點名氣的，經常被各個學校請來請去。請的學校多了，收入多了，他們就可以自己包一輛黃包車(即人拉的膠皮車)，在一所學校上完課，由車夫拉著飛奔到另一所學校，黃包車車頭前的小銅鈴叮鈴叮鈴地一路響過去，比現在的一些教師自己駕著私家車神氣多了。

但曾約農沒有這樣的經濟實力，估計湘雅醫院董事長、湖南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的職位，沒有給他帶來什麼經濟上的好處。大概是 1935 年，曾約農在長沙明德中學兼職教高三班的英語。那時，明德位於長沙市城北的泰安，藝芳位於城北的局關祠，兩校雖不很遠，但並非近在咫尺。曾約農經常在上完藝芳的課後，匆匆徒步趕往明德。

曾約農沒有黃包車，但他有條外表剽悍的狼狗。曾老師每次去明德中學上課就帶著它。一路上，這條狗跟在曾先生身後，他快步走，狼狗也快步走，他跑，狼狗也跑。到了學校進了教室，講課時，狼狗就蹲伏在講堂旁，對著學生一動也不動，宛如寺院裡的文殊、普賢法座前蹲伏著的獅與虎。等曾先生上完課收拾好講義，它又屁顛屁顛地跟著回去。這個逸事，在民國時期的長沙教育界可是一段美談呵！

蓬頭垢面、一副鄉巴佬樣子做羅素的翻譯

1920 年，長沙藝芳女子中學曾舉辦過一次文化盛事，那就是杜威、羅素等國際知名學者和章太炎、蔡元培、張東蓀等國內一流學術大師來長沙講學。那時記者的

5.六十年前的第一堂課

其實，1955年10月31日是第一屆東海大學學生正式入學，計註冊入學者共195人；11月1日辦理選課手續，2日上午11時，在工地倉庫充當臨時

報導用了「萬人空巷，聽者如潮」這樣的詞語。後人不禁好奇，市民空巷去聽什麼，大家能聽懂嗎？羅素的哲學思想那麼深奧，有合適的翻譯人選把它從英語轉換為通俗易懂的中文嗎？否則，這些學術交流豈不是自娛自樂！

湖南學界的組織者想到的翻譯人就是曾約農。第一場報告開始，羅素隆重出場，西裝革履，紳士派頭，叼著根很大的煙斗，含混不清的英文單詞在他的喉嚨裡滾動。英國人天生的傲慢態度真有點令人望而生畏。接著，曾翻譯出來了，不到30歲的樣子，個子不高，雖然樸素無華，藹然謙遜，但一件灰布長衫裡土氣，尤其是蓬著頭，鬍子也沒剃。觀眾開始竊竊私語：「這樣的鄉巴佬，如何能當羅素的翻譯？」

不料，接下來約農先生的同步翻譯沈著淡然，理明詞達，使滿座的專業和非專業人士都不得不驚服！羅素在長沙做了四場學術報告，他的學術觀點和思想得到了很好的傳播，引起了強烈反響。臨走時，他感慨地說，他很驚奇地發現，原來落後的中國竟然有一批世界上最有教養的文明人。

曾約農怎麼會蓬著頭，留著鬍鬚呢？原來曾先生的母親剛剛去世，按照中國傳統的居喪制度，父母去世期間，兒子要守制，即不得任官、不得應考、不得嫁娶、不得娛樂，要在家守孝三年。民國後，守制做了些改變，時間沒有限制，幾個「不得」變通為「不得剃鬍鬚」。

還有個故事要補充，羅素演講時，在台下作記錄的人恰是時為《大公報》的特約記者毛澤東。當然羅素或其他學術大師都不會留意青年毛澤東，但毛澤東把這位西方大哲的每句話都詳細記了下來，並在以後的歲月作了深入思考。

在教會做英語輔導，成為長沙的「英語培訓名師」

上世紀30-40年代，抗日戰爭爆發前，長沙的年輕人有個很不錯的去處，那就是位於西牌樓的長沙基督教青年會。一進這個會所的大門，左邊是綠茵滿地、樹木蔥蘢的花園，右邊是露天電影場。再往前走，就是一座巍然矗立的大廈，正中嵌著青年會的會徽，兩端分別有譚延闓直書的「長沙基督教成人部」及「長沙基督教青年會童子部」兩塊金字招牌。會所內的牆上，掛了許多國內當代書畫名家的字畫，最引人注目的有孫中山先生書寫的「博愛」和「禮記大同篇」，梁啟超先生寫的「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齊白石畫的葫蘆瓜，上面寫著「葫蘆瓜，葫蘆瓜，葫蘆開口笑哈哈，自從結蕊繫新蒂，會向人間鬥歲華」。

說了半天，它和曾約農有關係嗎？有，這裡經常組織宗教活動，外國人經常來布道，曾先生就是翻譯。外國人不來，也有曾先生的英語輔導。那時，聽者趨之若鶩。來的人大多數不是教會的，他們只是想學地道英語的青年。所以，青年會不像一個宗教機構，倒像一個英語培訓機構，曾約農則是長沙的「英語培訓名師」。大家到這裡來，一是學語言，二是勵志，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以後到郵政、海關這些福利好的單位工作，比現在考公務員強多了。

順便講點歷史，這個長沙基督教青年會在抗戰期間及以後，起了很好作用，他們後來組織活動，請徐特立先生演講，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心；邀請美國進步女記者史沫特萊做報告，了解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形勢；還組織市民救護隊協助安置難民等。1949年8月，長沙和平起義，當時的總幹事聯合雅禮、福湘等長沙教會中學的校長簽名，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城。

大禮堂(早已拆除)，舉行創校首屆的始業式典禮。



1955年11月2日開學日，首屆開學典禮由校牧穆藹仁牧師主持，建築物奉獻儀式則由董事長杭立武博士主持，繼由曾約農校長發表簡短演講，第一屆中文系學生蕭欣義代表全體學生致詞答謝；西屯區區民並致贈本校「有教無類」匾額一方。典禮完畢即行正式上課，教室、圖書館、實驗室均暫借男生宿舍--東海大學正式誕生，並定是日為校慶日。



勞作教育也在這天開始實施，蕭查理博士拿著雞毛撻子和掃帚向同學們講解勞動的意義，隨即分組勞作；曾校長被分在第十三組，蕭查禮博士發給他一枝雞毛撻子。

會計長畢律斯女士致聯董會的函件中，詳細地描述這個值得紀念的一天。這一天，陽光普照，並不冷，反而有點熱。午後，有名的風開始刮起，使天空中蒙上一片黃色的塵埃。每個人都辛勤地工作，使倉庫還看得過去；講壇是用松木作成的，著上了灰色，擺上一束乳黃色的劍蘭。由於認為這是學校的聚會，所以沒有家長，也沒有旗幟。這一天的開端是早上七點鐘的早餐，

七點四十五分舉行升旗典禮，然後學生進入倉庫練習始業典禮中要唱的詩歌。典禮在十一時開始，簡單、隆重，而且富有宗教氣氛。

在拍攝一張大照片後，全體共進午餐，師生都吃的十分簡樸，因為曾校長要讓來賓知道東海人是怎麼生活。畢律斯女士說：

整體的印象是，我們已在一個非常高的水準上開學了，一切都那麼隆重。我感覺到學生們會有更深刻的印象，他們以真誠的心靈齊頌聖歌，並且溶入其中。

曾校長在致聯董會的函件中亦感性地說道：

這真是美好的一天，風刮著，這使我在內心中稱呼我們的校園為森林神(Zephyrs)。但是來賓及學生並不在意。事實上，臨時禮堂太過擁擠，所以我們更歡迎風的吹拂。

1955年11月14日，《時代週刊》(Time)，以「拓荒者」為題，專題報導本校的開學，並特別強調本校所進行的是「十分前進的革新」的教育計畫。並引述曾校長的一句話：「開創將是我們的格言(Pioneering will be our watch word)。」東海大學就這樣開始了開創性的教育事業。

伍、後記

一、什麼是美援

「美援」意指美國對外援助的簡稱，其實「美援」也就是指美國政府透過設立的機構與計畫，對他國政府進行的軍事與經濟援助。事實上，「美援」的項目非常龐雜，包括電力、交通、肥料、水泥、製糖、造紙等，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皆是受援單位，其中交通運輸被列為優先發展的項目，包括鐵路設備的擴充、公路修建、港口改良、民航的改善以及電訊的擴充...等(請見東海大學誕生的故事(中)的狄寶賽個人資料)。「美援」常以「援助」為名，而把有些隱含侵略意圖伸向資本主義世界，各個角落的一種資本輸出。其實「援助」的同意詞彙是「支援」，以出錢、出力或出主意以及提供精神上支援等方式相助別人，為某一個人或集體提供支援和協助。它也有些意涵美國，意想消滅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可借「美援」而進行侵略，顛覆、控制別的國家，建立世界霸權的一個重要工具。

其實，美援的分類包括直接有：軍事援助，技術援助，經濟援助等三類。

1.軍事援助是美國藉由直接軍事援助，向受援國推銷陳舊和積壓的軍事裝備，可提供武器給一些國家的反動派，扶植它們當美國的力量，把受援助國拖進美國拼湊的軍事集團，監督、訓練它們的軍隊，並在它們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

2.經濟援助是美國有一種變相的軍援，其中有些是用來奪取美國所缺乏的戰略物資，而有些則用於在某些受援國的國內，興建為美國可掌握資本利益服務的、戰略性的鐵路、公路、港口；另外，還通過援助向它們大量傾銷美國的剩餘商品，為私人企業資本輸出開闢道路，可以摧殘和窒息受援國的民族經濟。

3.技術援助，實際上是美國可藉由派遣專家(或隱含包括有特務或間諜)在受援國勘察資源(兼搜集情報)。美國有可能迫使受援國接受美援的勞役性條款，如要受援國承擔軍事義務，提供人力、資源給美國，可取消美國貨品進口限額，減少進口關稅，放鬆外匯限制，降低美國資本開辦企業貿易的稅率，放棄「國有化」等等。

總之，其結果美國不僅可控制了許多受援國的經濟命脈，把本國的經濟危機轉嫁給它們，阻礙它們民族經濟的發展，而且可破壞受援國的主權，干涉、控制它們的內政和外交。藉由「援助」管道，美國還向舊殖民地國家取得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甚至使這些國家本身也變成美國的附屬國家。美國藉由「美援」進行對外擴張勢力，推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暴行，使帝國主義的基本矛盾日益增加。

二、美援運用

其實，美援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華民國與日本作戰時便已出現，國共內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在南京成立了美援運用委員會。1948年12月30日，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台灣辦事處成立；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美援運用委員會也隨之遷台，並且由陳誠先生擔任主任委員。

美國總統艾森豪於1960年6月18日訪問臺灣台北時與蔣介石總統搭敞篷車前往圓山行館途中接受熱情群眾夾道歡迎。蔣總統夫婦親至松山機場迎接，艾森豪總統並於傍晚在總統府前廣場對50萬群眾發表演說。兩國總統發表聯合公報，穩固邦誼，譴責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隔日砲擊之惡行，也依《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繼續保衛台澎。艾森豪與蔣中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分別擔任歐洲及中國戰區的盟軍統帥。

從1951年到1965年，台灣每年自美國得到大約一億美元的貸款；1951年，第一批的美援物資就已運往台灣。美援的內容，除包括民生物資與戰略物資之外，也包括基礎建設所需的物資，台中市德基水庫便是美援之下的產品。其實德基水庫，原稱為達見水庫，位於台灣台中市和平區大甲溪上游，即台8線中橫公路62公里處，係隸屬於台灣電力公司的一個高山型水庫。德基水庫於1969年12月8日開工興建，1973年12月水庫開始蓄水，1973年6月26日達到首期發電初步需求，1974年9月全部完成。

另外，美國除實質上的物資援助台灣之外，各種技術合作與開發亦廣泛的進行，同時，美方亦鼓勵台灣的大學與美國大學進行學術合作與人才交流，更以實際資金來協助台灣的大學興建校舍。另外戰後美國對台灣傾注的大量援助，解決了當時台灣外匯資金不足的發展問題。

1959年，美國對台的金援開始次第減少；1962年後，美國認為臺灣經濟開發程度已高、不再適用防衛資助，美援方式大部分改為貸款，以貸款後的第

11 年起，分 30 年無息償還。1965 年 7 月，華府停止對中華民國進行的援助貸款。中華民國自從 1951 年到 1965 年總計 15 年間，接受美國經濟支援達 14.8 億美元，加上冷戰時期美國對中華民國的軍事援助約 42.2 億美元(大多是二戰裁減下的船艦及新開發待驗證的噴射機)，而台灣積欠美方的貸款也在 2004 年 1 月已經全部清償完畢。

雖然美援促進了台灣的整體經濟成長，控制台灣戰後的通貨膨脹，減緩了外匯短缺的困境，並且促進台灣的穩定與資本形成；由於美援的支持，台灣得以推動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的進口替代工業，促進產業轉型，但是美援也的確造成台灣對美國的依賴，有所謂的「美國夢」。不可諱言的，比較其他同樣接受美援的國家，台灣也是最早結束美援而有所經濟成就者之一。¹⁸

¹⁸ (一)、480 公法。台美軍事協防，關係建立前，美國從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起，就引用 480 公法(Public Law 480)，提供台灣援助。美援以贈與專款基金，或對台貸款等方式，透過軍經援助，支撐台灣，降低台海風險，1954 年，台美雙方軍事協防關係建立之後，美國依協防條約，有系統的提供大量美援，用以執行軍事合作，促使台灣經濟成長，最終目標，在達成台灣自立。美國扶持台灣，意在有效協防反共。甚至配合生產，提供美國需求的低價商品，作為美國解決剩餘農產品的出口市場。總計，從 1949 年到 1963 年底，美國提供了 36 億美援，其中 22 億是軍援，其餘款項用於對台貸款，農工、教育，社會醫療等不同項目，援助關係也使美國成為台灣最大外資來源國，與進出口貿易對象。前外交部長錢復說：「我們的外匯沒有，是靠美援，那個發放(Grant)援助，讓我們能夠外匯不致於短缺，我們的預算不能平衡，是美援幫我們，把收與支平衡，所以說，如果沒有 1950 年到 1965 年，那個 15 年的美國經濟援助，大概平均每年 1 億美金左右，15 年 15 億美金，今天提 15 億美金，沒有人看得起，那個時候是好大好大的數目，我們是靠那一個，才能夠自立自強站起來。」

軍事合作，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讓美國維持了往後 30 年的對台軍援，以 1954-1960 年為例，台灣僅次於法國，為美國第二大軍事受援國。美國對台軍援，由駐台美軍顧問團統籌在全台進行整軍、建軍，與軍事基地部署，街市常見，美國軍官與士兵的蹤跡。台中市長胡志強說：「那麼在這個年代當中，我記得因為越戰是高峰，所以台中的清泉崗(公館)基地，就變成美國在亞洲地區，很重要的一個軍事據點，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有兩個最大的軍事基地，一個在清泉崗，一個在菲律賓的馬尼拉克拉克，聽說清泉崗比克拉克還要大，我們因為住在台中市的北區，所以是大雅路邊上，往清泉崗走很方便，所以在大雅路附近，有些民房當中，就有美國人，散居在這些地方。」

(二)、美援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華民國與日軍作戰時，便已出現類似美援的租借法案。1948 年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在首都南京市，成立了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美國則在上海成立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1948 年 12 月 30 日，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台灣辦事處成立；1949 年國民政府播遷台灣之後，美援運用委員會也隨之遷往台灣，並且由陳誠擔任主任委員，同年停止援助，直到韓戰爆發才繼續。美援計

三、東海大學美援建築傑作

在美援的分類當中，教會在台灣興建學校也包括在內。其實，狄寶賽夫婦與蔡培火為創辦東海大學而努力，加上美國紐約聯合董事會的期盼，使美援用於教育事業最顯著的案例，就是長老教會在台灣所設立的第一所大學--台中東海大學。其建校經費來自美國政經界所支持的「在華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簡稱聯董會），這也是廣義的美援機構之一。

東海建校籌備處在 1953 年 6 月成立，由曾任教育部長(1949)的杭立武擔任主任，並選擇大肚山作為校址，同年 11 月 8 日，美國新任副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台，由狄寶賽夫婦安排於 11 月 11 日上午 10 點 15 分在台中東海大學校門口主持破土典禮。

美國紐約聯董會芳衛廉秘書長(William P. Fenn, 1902 -1993)，邀請華裔美籍的知名建築設計師貝聿銘先生，進行台中東海大學校園規劃。貝聿銘在 1953 年底，先來台中東海大學實地勘察校地後，回美國紐約建築事務所，其設計工作就在紐約的澤肯多夫的韋伯·納普建築公司下的建築事務所進行。

畫由台美雙方聘請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擔任審查，懷特公司並派出經理狄寶賽(V. S. De Beausset)於 1949 年來臺，擔任負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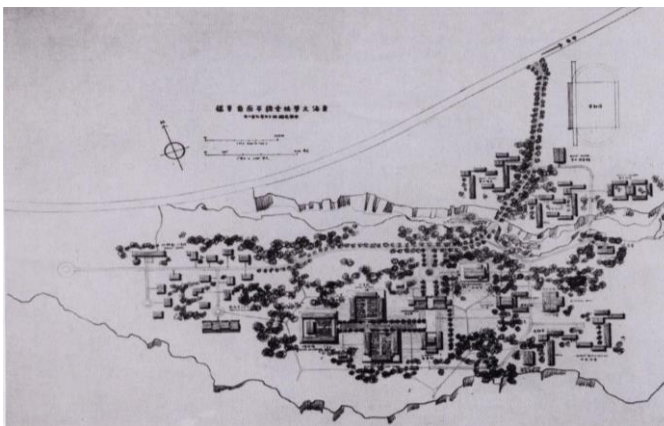
從 1951 年到 1965 年，中華民國每年自華府得到大約一億美元的貸款；1951 年，因中國共產黨勢力擴張引發韓戰，在這背景下第一批的美援物資運往台灣。1954 年，中華民國與美國簽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援的內容除包括民生物資與戰略物資之外，也包括基礎建設所需的物資，例如建築道路、橋樑、堤壩、電廠及天然資源的開發等，台中縣(今台中市)德基水庫便是美援貸款之下的產品。另外，美方除實質上的物資援助中華民國之外，各種技術合作與開發亦廣泛的進行，同時，華府亦鼓勵台灣的大學與美國境內的大學，進行學術合作與人才交流，更以實際資金來協助中華民國的大學興建校舍。另外，戰後美國對中華民國傾注的大量貸款，解決了當時中華民國外匯資金不足的發展問題。

1957 年，美援由原本的贈與性質，改為贈與及貸款並行，美國設立了開發貸款基金，與原本主持援外事項的國際合作總署並行；其中，贈與性質的援助款由國際合作總署主管，而生產性的經濟開發計畫，則改由開發貸款基金貸款。美國總統艾森豪於 1960 年 6 月 18 日訪問台灣台北時，與蔣介石總統搭敞篷車前往圓山行館途中，接受熱情群眾夾道歡迎。蔣總統夫婦親至松山機場迎接，艾森豪總統並於傍晚在總統府前廣場，對 50 萬群眾發表演說。兩國總統發表聯合公報，穩固相互邦誼，譴責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隔日砲擊之惡行，也依《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繼續保衛台、澎。艾森豪與蔣中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分別擔任歐洲及中國戰區的盟軍統帥。

1954 年 1 月，聯合董事會秘書長芳衛廉博士正式決定委託並邀請在紐約的華裔建築師貝聿銘先生，為東海大學進行整體校園規劃。隔月，貝聿銘建築師與秘書長芳衛廉博士立即來台，實地瞭解並勘查東海大學校地。1954 年 1 月 12 日，本校董事會議討論校地接收、建築計畫、興建教堂及校長公館、聘請教職員人選；並討論公開徵求校園建築設計圖樣辦法，而後公開公布徵求，其截止日期是 2 月 12 日。於 1954 年 2 月底邀請貝聿銘來台參與 27 日的董事會議所報告校園徵圖結果，並參加聯董會所邀請的美國芝加哥郝綏(Harry Hussey, 1880-???)建築師共同評審參加東海校園設計圖 22 人之應徵資料，其審查結果並無一人合格。

返回美國後，因無人手可協助，貝聿銘先生只好把這一件事告訴哈佛大學設計學院院長格羅佩斯恩師，經格羅佩斯同意推薦其 TAC(The Architectural Corporation)手下二位建築師--張肇康(1922-1992)先生與陳其寬(1921-2007)先生來協助貝氏所接受的委託案。於是貝氏就先用電話與這兩位建築師連繫，並於 4 月時邀請兩位年輕建築師加入，參與設計，負責整個校園的細部規畫和工程的興建。初期的設計工作都在紐約澤肯多夫的韋伯·納普建築公司執行。當時聯董會構想中的是如何呈現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一所大學，又可具有基督教大學精神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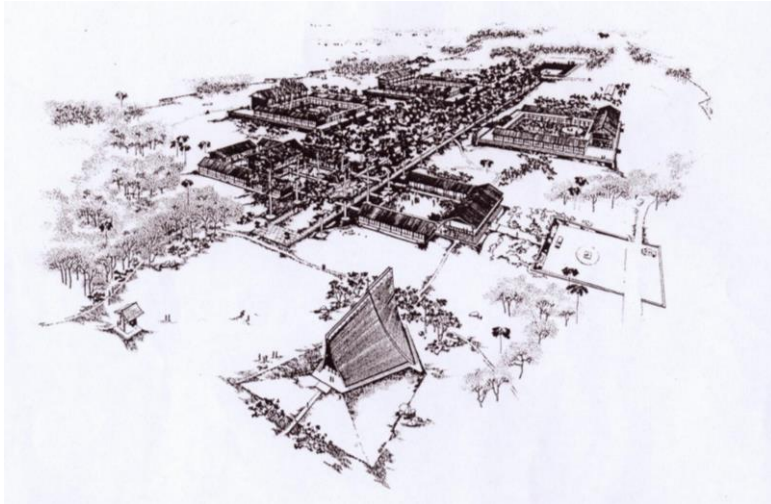
1954 年 5 月，陳其寬先生還沒有造訪過台灣東海大學前，就按建築師貝聿銘先生所攜回的東海校園資料與初步規劃進行校園設計，製出一幅東海大學校園全景的水墨畫，並以此畫向聯董會作簡報。



1954 年 7 月 1 日東海大學校舍總平面圖

1954 年 8 月，初步設計都在美國紐約進行。後來他們了解，在台灣一個大學至少要三個學院，每一學院至少要三個系。就根據這個前提，提出一個

計劃需求，如幾個學院、幾個系、多少個學生。計算出有八百個學生左右，再由此算出教職員有多少、宿舍需要幾棟。再根據這個需求做一份報告，這設計要有中國意涵，獲取大家的共識。他們採用中國唐代三合院來表達中國式的大學，而在校園中還有一個教堂，旁邊有個鐘塔，就是利用這元素來表達東海大學是個基督教大學。全部草案決定後，於該年 11 月寄回台灣，獲東海大學籌備處通過，並付之執行建造。



取自《貝聿銘全集》

雖然董事會本希望是西式的高層樓房，而較不喜歡中式建築，但經由聯董會所聘請兩位建築師顧問--王大閔與狄寶賽的審查認同，終於勉強接受。並於 1955 年 4 月中旬，由本校范哲明建築師與香港楊介眉建築師共同負責監督施工，而由林澍民建築師負責製作建築施工圖，國內大陸工程公司的榆華營造廠承包東海校園的營造工程，並開始動工興建男女宿舍。張肇康先生負責較早期的男女宿舍一期、男女生餐廳、文學院、理學院、行政大樓、圖書館與體育館的設計。他在現代建築中擷取中式民房的黑瓦、紅磚牆、卵石台基、木門窗與素色木迴廊等傳統建築的意象，融入西式的鋼筋混凝土結構體中。1960 年代，由陳其寬接替張肇康進行東海校舍設計，他以現代主義為主的設計，使校園建築風貌有了巨大的轉向。在 1954~1962 年貝聿銘為首與張肇康、陳其寬所設計建造的路思義教堂，深受當時流行的雙曲拋物面薄殼牆結構趨勢所影響，極具美感。

東海校舍的興建主要由吳良宗的光源營造廠承接，光源自 1956 年起以 17 年的時間，興建了 70 餘棟校舍。由貝聿銘為首與張肇康、陳其寬所設計的路

思義教堂，經結構工程師鳳後三先生精心設計格子樑構造，再透過光源營造廠修築，成為矗立於東海大學校園，最具現代性的建築。

其主體工程由畢業於日治時期台北工業學校的技師紀錦坤、陳新登負責。經過嚴格控管混凝土配比、灌漿程序、架模板、貼琉璃瓦等連串精密的工序，當模板拆除後，不僅結構安全無虞。甚至於清水混凝土表面也未見任何坑洞、水泥點。優秀的工藝著實讓人嘆為觀止。建築師吳明修在接受訪談時認為，這項工程最重要貢獻在於使清水混凝土的運用在臺灣獲得驗證。

四、本校董事的演化

一場基督教在台宣教百年大會上，原本應是宣揚各教派合一精神的婚禮，或至少是記念宣教師腳蹤、歸榮耀給上帝的週年生日慶典，但因著政治勢力的介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卻與打著護教反共旗幟的黨國基督徒之間，演變成兄弟鬩牆的局面，長老教會更是成了遭弟兄們聯手陷害的約瑟……。從 1953 年開始到 1970 年為止，這段時期極其複雜的歷史是特別值得注意，因這段期間國內外基督教界有出現的某些關係緊張的相關人士，竟然也出現在一些共同的組織或場合中。事實上，基督教的圈子很小，各種重大的組織和活動，出現同樣一群人的機會非常高，但是如果是在神學或政治立場上存在著矛盾，這就有許多的故事可敘述了。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東海大學創辦早期，1954 年進入的黨國基督教領導護教反共人士的張靜愚，與敵對陣營、屬於普世教協一方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士黃彰輝、黃武東、彌迪理等，一同在董事會的名單之中，其中還包括 1958 年進入比較親近長老教會陣營的周聯華，這些人在反共意識形態正好形成了兩個不同的陣營：黨國基督徒(無教派背景)與自由派基督徒(具普世教協背景)。這樣的董事會，勢必將會擦出一些火花。

自 1949 年後，基督教大學全面從中國大陸撤退，在海外成立一個由共同基金組成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簡稱「聯董會」)，這個董事會與普世教協是有關係的。根據黃彰輝和黃武東的說法，成立東海大學的案子主要是由長老教會向國外有關單位提議，因為只有長老教會具普世教協的會員身分，所以應由他們提出是比較合適的。也因為這樣，相關的單位還曾提議將原本已有的台南神學院併入東海大學的整體規劃中。

據《黃武東回憶錄》細述了東海大學的由來，主要是由第二屆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總會通過決議，向聯董會提出申請。黃武東是與美方接觸的關鍵人士，1953年5月，他就拿著總會的決議文到紐約報告，表明長老教會全力促成於台灣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學。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有絕大的關心與歡迎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所計劃將建設大學於台灣之事，同時董事長 Dr. Van Dusen, Henry Pitney 與美國基督教聯合長老教會總會的代表 Dr. Charles Tudor Leber 願意表示最大的協力來幫忙到這個目的達成。依台灣長老教會總會決議文第七十七條與七十八條，經討論後獲得聯董會(UBCCC)接受，並議決在臺設校，且邀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與美國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為共同創設者(Co-Founder)。

1953年，基督教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在籌備過程中採用三三制，並協調由三組人馬組成：外國人士(聯董會代表)、教會人士(主要以長老教會為代表)、官方人士(具有基督徒背景的黨政代表)，其中，又以前任教育部部長杭立武為籌備組主任。這樣的安排恐怕與中華民國建國以來「收回教育權」的結果有關，畢竟這是一個具有「外國勢力」的教育機構，當然更與當時的政治和外交氛圍有關。雖然途中確實有些阻力，甚至可能胎死腹中，最後還請到了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說情才獲准，這也許可以說明何以東海大學的校地有一部分歸屬於中華婦女祈禱會。

於1953年10月2日依法成立董事會，設董事15人，原則上以35制產生，即由南、北各長老教會推選董事5人(牧師)，曾經從事教育工作者5人，外籍人士5人，共15人組成。1953年10月14日向教育部呈請立案。1953年11月13日教育廳正式核准立案，並公布私立東海大學董事會章程。後來15位董事的任期，採取抽籤方式決定：任期一年有五位(狄寶賽夫人、高天成、黃彰輝、蔡培火、明有德)；任期二年有五位(安慕理、張靜愚、蔡一諤、曾寶蓀、黃武東)；任期三年有五位(杭立武、誠恩慈、魏德光、彌迪理、陳明清)，每年10月改選五位。

到1956年私立東海大學董事會3月15日召開第26次董事會議程，由曾校長提出修改組織15人的提名類別由原35制修改為53制：甲、由本身基督教長老會提名3人；乙、由差會及本省其他教會提名3人；丙、由聯合董事會代表創辦人提名3人；丁、由本校畢業生協會提名3人(協會為成立時暫由聯合董事會提名)；戊、由本會有關聯合董事會特約人員提名3人，上列合計15人，由1955年起逐漸調整之，到1959年將可完成。另建議當年財務委員會由蔡培火(召集人)、蔡一諤、黃武東；建築委員會由蔡一諤(召集人)、陳

明清、張靜愚；提名委員會由張靜愚(召集人)、曾寶蓀、誠恩慈、林宗義。

在東海大學的歷任董事會(1953~1970)名單上，上述兩派的關鍵人物擔任董事的時間分別為：

張靜愚 1953~1967 年(1957~ 1959 年擔任董事長)；

周聯華 1958~1977 年(1960~1961 年、1970~1971 年擔任董事長)；

黃彰輝 1953~1965 年(成立東海大學籌備委員之一)；

黃武東 1953~1957 年(成立東海大學籌備委員之一)；

彌迪理 1953~1955 年；

陳明清 1953~1963 年；

林宗義 1955~1956 年，1958~ 1963 年，1965 年；

宋泉盛 1966~1970 年(接替黃彰輝)。

本校開辦時的首屆三位董事黃彰輝、黃武東、彌迪理曾參與過 1970 年〈國是聲明〉的起草，並於 1972 年 3 月被國民黨政府驅逐出境。這三位與林宗義和宋泉盛都是長老教會代表，屬於普世教協這一方，周聯華牧師也可以算是靠向普世教協，但肯定並不屬於黨國基督徒代表。其他代表有曾寶蓀、高天成、蔡一諤、蔡培火、誠恩慈、狄寶賽夫人、明有德牧師、安慕理牧師、魏德光牧師等，除了高天成任職台大醫學院屬於學界背景，也具有長老教會背景，其他的都是官派色彩極重的基督徒。

其中，張靜愚的角色較為特別，因為他同時也是中原理工學院的董事(中原理工學院創立較晚於東海大學一年)，又是護教反共的領頭人，所以在這種結構中形成了一個較為突出的角色。事實上，他並不具備有任何基督教教派或組織相關的身分，從來他就是以一位忠誠的國民黨員及官方人員的身分出現在本校的董事會人員舞台。1965 年之後，張靜愚更是在護教反共的立場上與黃武東、黃彰輝等人形成相互對立，因此他既具有中原理工學院的董事身分，又被安排在東海大學的董事會中，其政治意義也就格外的顯著。

正因張靜愚擔任董事之際，兩年後即參與創立「私立中原理工學院」董事之事宜(1980 年升格作「中原大學」)，同時毫不避嫌的身兼兩校的董事，還在本校當了兩年的董事長，因 1959 年私立中原理工學院也聘之為董事長，才退下本校董事長一職，但仍在董事會的名單之中，一直到 1967 年才離開。1967 年的東海大學董事會結構中，長老教會的代表基本上已經全面退出，宋泉盛接替黃彰輝，做到 1970 年，這一年長老教會最後退出了普世教協。

1970 年後，黨政官方基督徒已逐漸掌握了東海大學的董事會，而這一年也是周聯華二度擔任董事長之際。繼之，1971 年美國聯董會芳衛廉秘書長退休，造成新成立的亞洲基督宗教大學協會(ACUCA)無法再繼續對本校的經費補助(快速下降)，也使本校吳德耀校長因恩師的退休而出走，只好離開曾經付出 15 年心血的東海大學而到南洋大學任教。之後，1972 年本校經費將進入獨立自主的年代，而董事會也將進入到查良鑑博士和梅可望博士的新一時代。

五、反共題材介入首任校長之爭

事實上，成立東海大學真正的推手是黃彰輝、黃武東、彌迪理等三位牧師，長老教會可謂居功厥偉。絕大部分具有長老教會背景的代表都止步於 1965 年，黃武東最早離開，高天成 1965 年逝世，黃彰輝和林宗義也只做到 1965 年。黃彰輝、黃武東和張靜愚在東海大學開始籌備之初就已名列於委員會，黃彰輝更和張靜愚在董事會裡共事長達 12 年之久，這兩個人正是護教反共時期站在對立面的頭號人士，周聯華牧師是於 1958 年在張靜愚任董事長時才加入。

張靜愚董事於 1957 至 1959 年間擔任東海大學董事長，他之所以御下董事長一職，其原因是中原大學於 1955 年成立後，他自 1959 年起擔任該校的董事長一職。雖然東海、中原兩所大學均標榜「基督教大學」，但從東海大學的董事會名單結構可以看到「黨國基督徒」與「自由派基督徒」的政治有所分野，而中原大學則是清一色的「黨國基督徒」，再加上幾位外國宣教士牧師。

東海大學的籌設，一開始就極其不平靜，充斥一些意識形態的角力，包括本校是一所小的人文學院或是一所大學，另外是與堅持反共立場問題有關。尤其東海大學的校長資格問題，出現了誰是教育部合格首任校長之爭的問題上，給了官方政府有了更多介入的機會。美國聯董會芳衛廉秘書長雖已邀請在美國南加州大學任教的陳錫恩博士，1954 年 2 月由美來台負責東海大學的開辦事宜，當時陳博士也是芳秘書長心目中的首任校長。

依據美國聯董會的代表陳錫恩博士向聯董會所提交的報告，特別指出籌辦東海大學的困難主要是來自於國民黨政府的政治監控。陳錫恩在籌組董事會、任命教務長、訓導長、院長和校長時，建議以基督徒為首要考慮的條件，以保持該校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免受政治影響。他還提出堅持東海大學仍會是一所反映基督教獨特教育理念的大學，並以通才教育為其辦學首要的主張，著重實踐而非功利的目標，強調高學術水平，並指明來自美國的辦學資

金不是無限的，因而必須謹慎地運用。陳錫恩博士不但總結了建校的原則，也提出東海大學的發展方向。

根據陳鍾文惠女士所撰《陳錫恩傳》中敘述，陳錫恩一直表示不會出任校長，其主因是具有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雙重國籍，可是仍被反對者以「反共不徹底」為由加以攻擊，然而本校董事會並沒有特別理會此事，繼續邀請陳錫恩出任創校校長。陳鍾文惠女士並指出，「反共不徹底」實為一場不小的風波，主要就是有人想阻擋陳錫恩當校長，當然關鍵即在於此人對這個位子也感興趣。東海大學的成立，一開始就是黨國基督徒與長老教會背景的基督徒之間的角力，加上「反共不徹底」之指控形成了校長位子之爭，當然也同樣可以將「反共不徹底」的理由，加諸在具有普世教協會員身分的長老教會代表上。因此，也造成陳博士於 1954 年 8 月 20 日返回美國南加州大學工作崗位任教，而後才有曾約農校長的出任。

誌謝：特別感謝吳福助老師的建議與謝鶯興組員的協助

陸、主要參考資料

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編著，臺南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年。
2. 《黃武東回憶錄》，黃武東著，新台灣文庫 6，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8年。
3. 《保衛大台灣的美援(1949~1957)》，林炳炎著，臺北市：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會資料中心，2004年。
4. 《台灣營造業百年史》，曾淑正主編，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5. 《貝聿銘：現代主義泰斗》，麥可·坎奈爾(Michael Cannell)著，蕭美惠譯，台北市：智庫出版，1996年。
6. 《貝聿銘全集》，菲力浦·裘蒂狄歐(Philip Jodidio)，珍妮特·亞當斯·斯特朗(Janet Adams Strong)，李佳潔、鄭小東譯，臺北市：積木文化出版社，2012。
7. 《東海大學校史(民國 44 年~69 年)》，東海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輯，台中市：東海大學，1970年。
8. 《東海風：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年特刊》，東海大學創校四十週年特刊編輯委員會編，台中市：東海大學，1995年。
9. 《東海大學五十年校史(1955~2005)》，東海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編輯，台中市：東海大學出版社，2006年。
10. 《陳錫恩傳》，陳鍾文惠著，台北市：個人出版，1992年。
11. 《曾寶蓀回憶錄》，曾寶蓀著，湖南省：岳麓書社，1986年。
12. 有關東海大學董事(1953~1955)個人的網站。

東海大學誕生的故事

發行人/ 東海大學圖書館

作者/ 梁碧峯

出版者/ 東海大學圖書館

電子書設計製作/東海大學圖書館 王鑫一

地址/ 407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電話/ (04)2359-0121

傳真/ (04)2359-2622

網址/ www.lib.thu.edu.tw/

電子郵件/ libedb@thu.edu.tw

出版日期/ 2015 年 12 月

I S B N : 978-986-599-087-9(PDF)

電子書檔案格式/ PDF

播放軟體/ Adobe Reader

其他類型版本/ 原刊於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 166-168 期